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热线/QQ: 95321800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zhongjia.net>

著名财经作家严行方最新力作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人破产而出名，
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为“开放社会”的捍卫者。

——乔治·索罗斯

世间再无索罗斯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严行方◎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通过系统阐述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精准判断市场、全力做空股市、永远比对手早平仓。全方位介绍了他如何捕捉投资信息、屡屡成功预测股市并逃顶，最终斩获暴利的。索罗斯被称为“股神”甚至“魔鬼”，其操作手法对所有投资者都不无启迪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世间再无索罗斯：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 严行方著.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064-8607-1

I. ①世… II. ①严… III. ①股票投资—经验—美国
IV. ①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4043号

策划编辑：于磊岚 责任印制：陈 涛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东直门南大街6号 邮政编码：100027

邮购电话：010—64168110 传真：010—6416823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 faxing@c-textilep.com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5

字数：173千字 定价：29.8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序 Preface

“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

82 周岁的索罗斯开口说话时，全球投资者乃至各国政府都在听。

索罗斯在全球是一个颇有争议并具破坏力的人物。许多人对他恨得要死，可是他自己却感觉良好，一脸满不在乎，觉得自己并不亏欠别人什么。在更多人眼里，索罗斯很神秘，他以一己之力狙击英镑、掀起亚洲金融风暴并大获全胜，实在了不起，于是莫名其妙地就崇拜他。

正因如此，索罗斯虽然和巴菲特一样被誉为“股神”、拥有众多拥趸，可是要比巴菲特背负更多骂名——在“全球最成功的投资家”、“慈善家”等尊称背后，更有一系列诸如“金融大鳄”、“投机分子”、“贪婪”、“自私”等标签。为了投机赚钱，他不惜破坏金融秩序。最典型的是 1992 年他全力做空英镑，英国中央银行因此被迫破产，而他却带着 20 亿美元获利拍拍屁股潇洒走人；更有甚者，1997 年他引爆亚洲金融危机，使得许多亚洲国家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一笔勾销，长期缓不过气来。

与其他顶尖投资家相比，索罗斯在构建投资理论上颇有建树，尤其是他运用一套自己发明的哲学理论（“反身性”原理），多次准确预测到金融危机会在什么时候爆发、股市会在什么时候见顶，然后提前空仓，从从容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容达到“少输大赢”（输时迅速止损、赢时加大赌注）的目的。2007 年他因为做空次贷类证券获利 29 亿美元，2008 年又因为做空股市获利 11 亿美元（同年巴菲特手下的伯克希尔公司股价则暴跌 40% 以上）。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资技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量子基金在 1969 年至 2011 年间的年复合收益率超过 20%，总回报率高达 1020 倍，与巴菲特有得一比。他因此被誉为美国华尔街“金融大鳄”中的“真正王者”。

索罗斯在我国家喻户晓，是从他 1997 年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几乎全是照着索罗斯说的在行事，更让全球对他既肃然起敬，又增添神秘。

索罗斯最自信、最令人惧怕的是他成功投资的“三板斧”，本书把它归纳为：一是精准判断市场，二是全力做空股市，三是永远比对手早平仓。

他的这三板斧隐隐约约地体现在他的著作中，可实事求是地说，这位老兄的理论很少有人看得懂，更谈不上在实践中运用了；甚至，因为他的操作手法与流行理论背道而驰，从来就没有受到过应有的重视。实际上，索罗斯的真正炼金术在于他具有洞悉全球政治经济时局变化的能力，说穿了就是，索罗斯作为全球宏观对冲基金领域的标杆式人物，长期研究资本主义体系缺陷，最擅长从中寻找规则漏洞，一旦看到重大漏洞，就会全力以赴发动攻击，斩获巨额暴利。索罗斯自称拥有“比对手早三分钟平仓”的逃生秘籍。所有这些，又岂是他人随随便便能学到手的！

正因如此，全球投资界包括各国政府，对索罗斯都是防备有加，生怕有一天被他抓到什么把柄，被戳个遍体鳞伤。他 2010 年把触角伸到我国

香港和内地，被外界解读为已经嗅到中国金融体系的漏洞；他 2011 年 7 月宣布金盆洗手，也被人怀疑不是谢幕是烟幕。因为他早在 2000 年时就已经宣布过退休的，但最终还是退而不休，到处“发挥余热”。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索罗斯（这样的人）了；也有人说，学习索罗斯的投资秘诀，难度要比学巴菲特至少大 10 倍，因为他总是那样捉摸不定。其实，索罗斯既然是人，不是神，那么他的炼金术就是可以加以提炼和总结的。这正是本书要和读者具体探讨的内容。

空前绝后的索罗斯，他的这些本领哪怕只被你掌握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会非常有助于你在以后的金融投资中稳操胜券！

方行

2012 年 3 月 10 日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人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为“开放社会”的捍卫者。

——乔治·索罗斯

| 目录 |
Contents

索罗斯的第一板斧
精准判断市场

索罗斯的第一板斧，在于对全球市场的精准判断力。他与多国政要有来往，具有非常灵敏的政治嗅觉；再加上他超乎常人的市场直觉，使得他每每能嗅到别人察觉不到的投资良机 and 趋势转折点。一旦逮住漏洞、拼命撕咬，总能满载而归。

1. 从政治角度看经济时局	/003
2. 众人皆醉我独醒	/008
3. 用供需关系撬动市场	/014
4. 抓住信息不对称漏洞	/018
5. 计划非常周密	/028
6. 对直觉充满自信	/033
7. 从长链条中捕捉机会	/039
8. 寻找市场趋势转折点	/044
9. 耐心等待机会出现	/050
10. 片言只语就能得到启发	/057
11. 等待老虎打盹的时候	/061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12. 认定日本是金融危机源头	/064
13. 地震来临前嗅觉特别灵	/068
14. 退而不休，半退半休	/073
15. 未来看好中国市场	/082

索罗斯的第二板斧
全力做空股市

索罗斯的第二板斧，在于全力做空市场。他最擅长唱空和做空，通过制造市场恐慌，引发大量抛盘涌出合力砸盘，他则在一旁“没事偷着乐”。索罗斯曾经在一个月內就沽空 70 亿美元英镑，净赚 15 亿美元，这样的杀伤力和获利可谓举世无双。

1. 市场投机并不违法	/095
2. 看准了就要全力以赴	/103
3. 别太顾忌良心道德	/114
4. 把量子基金玩到滚瓜烂熟	/121
5. 从最薄弱处撕开缺口	/128
6. 除了做空还是做空	/137
7. 心狠手辣是逼出来的	/142
8. 意外学到的思维方式	/150
9. 换个角度坏事也是好事	/156
10. 从现在开始匍匐在香港	/162
1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66

索罗斯的第三板斧
永远比对手早平仓

索罗斯的第三板斧，在于“逃命要紧”。他不打无准备之仗，每次出手必定追求大获全胜。为了策划大行情，他可以蛰伏三年精心准备，一旦市场判断错误，撒腿就跑，自称拥有“永远比对手早三分钟平仓”的本领，并因此“小输大赢”。

1. 紧急情况下保命第一	/175
2. 一旦判断错误撒腿就跑	/183
3. 对冲就是要跑得快	/188
4. 残酷无情是资本天性	/194
5. 在不稳定状态中乱中取胜	/199
6. 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204
7. 永远保持一份警惕	/210
8. 比别人更了解美国	/214
9. 吃透美元就吃透未来	/218
附录 乔治·索罗斯年谱	/224

索罗斯的第一板斧

精准判断市场



George Soros

索罗斯的第一板斧，在于对全球市场的精准判断力。他与多国政要有来往，具有非常灵敏的政治嗅觉；再加上他超乎常人的市场直觉，使得他每每能嗅到别人察觉不到的投资良机 and 趋势转折点。一旦逮住漏洞、拼命撕咬，总能满载而归。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

从政治角度看经济时局

索罗斯最大的投资秘诀之一，在于善于从全球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时局，所以他比别人看得更远、看得更深、看得更透，因而更能抓住本质。

例如索罗斯在引爆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是同样承认亚洲经济发展奇迹的，但他事后并没有轻易用经济分析方式总结他和这场危机之间的关系。读者从以下这段讲话中，就能看出索罗斯是如何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时局的。

亚洲模式是一个极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并在商业界受到广泛赞誉。亚洲模式使亚洲生活水平获得迅速提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年增长5.5%——这是有历史记录以来从未有过的在同一时期里超过任何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因此，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仍然坚持认为亚洲的价值观优于西方。他们甚至挑战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宣言》。李光耀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是堕落的；马哈蒂尔始终对西方殖民主义传统耿耿于怀；苏哈托则颂扬“裙带关系”的优越性。199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接受缅甸为其成员国——这是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直接挑战，因为缅甸的专制政府在政治和人道上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也许正因为公开谴责东盟这一举动激怒了马哈蒂尔，促使他对我进行攻击。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在这里，索罗斯说得已经非常清楚了。而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99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质疑当时到处传颂的所谓“亚洲奇迹”，并且与20世纪30～50年代苏联的所谓“经济奇迹”相提并论——这些经济发展的基础都是对资源的过分占用而不是高效利用，所以将来必定无法持续下去。

根据克鲁格曼的研究，过去150年间全球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成就主要是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之上的。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罗斯的著名论断：美国国民平均所得的长期提升，80%来自科技进步，20%来自资本投入。克鲁格曼依据这一点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亚洲国家（日本除外）的经济增长，都不是依靠科技发展取得的，所以这种经济增长都是“纸老虎”。

克鲁格曼认为，正因如此，当年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会议上脱下皮鞋猛敲桌子说“我们终将埋葬你们”时，虽然也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感到大为震惊，但却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认为，这种大话并不可信。因为无论前苏联还是其他国家，如果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重视劳力、忽视脑力投入基础之上的，最终都必将导致失败。

在这些有识之士中，索罗斯是其中之一。虽然在许多人看来索罗斯成心想打垮亚洲经济，可实际上无论他是不是这样想，如果亚洲经济发展不是存在着这种致命弊端，索罗斯就必定无计可施。而现在好了，他既有这样的认识，也有这样的实力，又能抓住最佳攻击时机，不出手才怪呢！

仍然从政治角度来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开始积极扶持东南亚一些小国来遏止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经过美国的长期培育，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大大超过美国的预期，以至于成为美国的一种担忧。至少在现实上，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和美国的冲突已经在不断增多，令美国感到稍有不快。

而恰好这时候，美国在全球的主要对手苏联在 1991 年解体，分裂成俄罗斯等 10 多个国家，美国一下子在这个地区失去了竞争对手，再也不需要依靠东南亚这些小国来联手遏止苏联和中国了。

在这关键时刻，索罗斯可以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巧妙利用这一时机，把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结合起来，给予致命一击。

说到底，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索罗斯手上掌握着几百亿美元的巨额资本，他必须让这些资本发挥最大效应、攫取最大利润。

在苏联解体的政治背景下，美国对这些东南亚小国的兴趣爱好和任务已经发生变化，可是这些国家却依旧浑然不知，或者根本就不愿意放弃过去的经济发展，仍然依赖于过去的那种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制，这就给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国家经济创造了一个极好机会。

索罗斯首先从泰国开刀，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些国家的经济链条中，泰国是最薄弱的环节。事实恰好也证明了这一点。索罗斯从打压泰国泰铢，造成泰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出现危机，最终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轻易地撕开了这些国家经济崩溃的一个缺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风暴战火迅即烧遍东南亚。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单靠索罗斯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掀起亚洲金融风暴。他很好地利用了借力打力，看得出他在这方面非常精明。

试想，索罗斯如果在苏联解体之前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前景会如何？他可能想也不会去想这样一种假设，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看，对他都是不利的。

要知道，20 世纪 80 年代末，索罗斯就企图说服当时的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支持一项欧洲复兴计划，并且希望能与撒切尔夫人当面讨论一项援助苏联的计划，通过援助促使苏联变为“开放社会”。

为了促成这个计划，财大气粗的索罗斯煞费苦心地给这个计划起名叫“撒切尔计划”，马屁功夫可谓一流。可是当时的索罗斯因为没名气，所以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撒切尔夫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这个计划当然也就石沉大海了，索罗斯还因此受到人们的讥笑。

这时候的索罗斯切身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微言轻”。他想，必须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然后才有可能在社会舞台上发挥作用，在政治上受到重视。

这件事情可以说给索罗斯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 2009 年 6 月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演讲时还似乎耿耿于怀地说：“我认为（2007 年爆发的）次贷危机的根源，其实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显现了，那还是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当政的时期。当时的主流人士相信市场有能力进行自我调整，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我把这种理论称为‘市场基础资本主义’（market fundamental capitalism）。 ”

索罗斯认为，“当时美英两国的很多企业，其三分之一企业利润来源于金融性投资”，正是这种缺乏监管的“市场基础资本主义”潮流，导致政府放松监管，无限制地使用金融创新工具，促使金融泡沫在三十年时间里无限膨胀，最终爆发了所有人“有生之年经历的最猛烈的金融危机”。

上面提到的索罗斯促成在苏联乃至全球建立“开放社会”，是索罗斯的一大“人生目标”，这当然是从政治角度而言的了，本书后面会经常提到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索罗斯心目中的“开放社会”呢？

他在 1998 年出版的《开放社会》一书中认为：开放社会是指没有人能够垄断事实，人人可以拥有不同见解和利益的社会；因此，需要有某些机构出面保障人人和平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广义地说，开放社会的特征是有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凡事依靠法律来裁决，属于多种多样和朝气蓬勃的文明社会，并且尊重少数派和少数人的意见。

索罗斯认为，凡是人类设计的制度总会存在缺陷，所以在开放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和政治安全的改进、文化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前景无比广阔。

也正因如此，当他听到美国前总统布什 2003 年决定攻打伊拉克时，便强烈反对。后来他说：“当听到布什‘不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恐怖分子那边’的霸权逻辑时，我就想起了德国纳粹，想起自己在纳粹魔爪下颠沛流离的童年！”所以这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在美国总统竞选时为布什下台做点什么的了。他断言：“在布什统治下，美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的威胁！”

由此可见，索罗斯虽然是个金融家，但他十分关心政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直到后来撒切尔夫人下台后她才想起当初的事，于是向人打听索罗斯究竟是何人。当从别人嘴里得知他的有关情况后，撒切尔夫人礼貌地与索罗斯通了一次电话，以示给索罗斯留一点面子。

让索罗斯气愤的不仅仅是撒切尔夫人，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是这样对待索罗斯的。

当时索罗斯想出钱资助苏联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以便于他们能安心在国内工作，不至于因为经济贫困而外流，所以提出想见见戈尔巴乔夫。可是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整天忙于接见外国政要，索罗斯在他眼里并不成气候，根本就排不上档，这让索罗斯更加感到要赚钱、要扩大影响。

难能可贵的是，这时候的索罗斯不但没有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冷落而垂头丧气，相反却加大力度资助苏联科学家，以便促使这个他讨厌的政权尽早解体。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10 多年后的 2003 年格鲁吉亚发生的“玫瑰革命”就与索罗斯拿出 250 万到 300 万美元活动经费资助有关。还有 2004 年乌克兰爆发的“橙色革命”、2005 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柠檬革命”等等，都与索罗斯的资助有关。

2

众人皆醉我独醒

都说投资需要清醒的头脑，最难能可贵的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在全球纷杂的投资环境面前，索罗斯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不人云亦云。

接着前面的话题，当时索罗斯因为撒切尔夫人的不理不睬受到众人讥笑后，他决心要给英镑点颜色看看。恰好在这时候，1989年11月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统一了，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被全球各国看做一件大好事，因为德国统一后将会很快带动原民主德国地区的经济复兴和繁荣。

可是索罗斯不这么看。他认为，德国统一后为了重建原民主德国，整个德国必将会经历一段经济非常拮据的时期，德国将会更加关注国内经济，而无力帮助其他欧洲国家渡过经济难关。所以从德国方面来看这是好事，可是换个角度从其他欧洲国家方面看，实际上是一件坏事。

很快地，1992年2月7日欧洲联盟12个成员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志着一个“大欧洲”概念即将形成。就在大家感到欢欣鼓舞时，索罗斯更加清醒地看到德国统一后对其他欧洲国家所造成的影响。

事情果然像索罗斯预料的那样发展。该条约签订不到一年时间，这些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就开始显得难以协调。

当时的英国经济很不景气，并且这种经济不景气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英国在经济政策方面不可能维持高利率。要想刺激经济发展，

唯一的选择是降低利率。可是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仍然在强调要维持英镑利率，以保持英镑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虚张声势可以骗骗其他人，却骗不过索罗斯，所以这时候的索罗斯已经在暗中准备狙击英镑的前期工作了。

后来的事情正如读者知道的那样，英镑被索罗斯攻击得遍体鳞伤。索罗斯带领国际上的一些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在市场上大肆抛售欧洲货币，使得这些本身并没有捏成团的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投入巨资支撑货币价值。在这场战争中，索罗斯一个人就动用 100 亿美元资金，理所当然成为这个阵营中的中坚力量。

1992 年 8 月 28 日，英国财政大臣在财政部大楼前发表措辞严厉的演讲，被外界看做是对金融投机家的最后通牒。他说：“为了明确英国的立场，我认为英镑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我们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政策的核心。”

英国财政大臣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在做出这项承诺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行动。就在讲话当天，英国中央银行在市场上买入 33 亿英镑，以显示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

而这时候的索罗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来不轻易相信政治人物承诺的他，这时候更关注的是德国的态度。也就是说，索罗斯认为这时候德国的政治态度，具体地表现为德国中央银行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效果，而不能单单看英国的动作。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德国刚刚实现统一不久，全球各国都纷纷看好它会变得日益强大、繁荣，所以它在欧洲的地位举足轻重，以后的欧洲需要依靠德国来走向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融合，最终融为一体。而在刚刚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就能明显看到德国在欧洲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加强。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出现经济萧条和货币贬值，德国必须承担更多的职责，宁可牺牲自身利益也要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稳定。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几乎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上述结论是理所当然而顺理成章的。换句话说就是，当时全球所有看好英镑的投资者都有一种幻想，认为英镑一旦受到狙击，德国一定会出面帮助英国，不会坐视英镑汇率在剧烈波动中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但从政治角度考虑的索罗斯显然不这么想。索罗斯认为，如果英镑汇率下跌，德国会更希望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因为这种动荡的汇率会对欧洲经济一体化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动摇整个欧洲货币体系。德国不会为了维持英镑汇率稳定而牺牲自身利益，这是一笔不合算的买卖。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护英镑汇率稳定，更多地要看英国中央银行以后究竟还能拿出多少钱来用于维稳，而不是仅仅看眼下投入的 33 亿英镑。

不用说，过去 300 年来从来没人敢挑战英格兰银行的至高权威；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出现之前，英格兰银行一直是全球最强大的中央银行，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索罗斯很快就发现其中一个细节，那就是英国财政大臣发表上述演讲的同一天，在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的一篇简短演讲谈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行动。”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索罗斯看来，这就意味着欧洲共同体内部出现了分歧，表明强大的英国中央银行已经是“此一时彼一时”了。只要各国之间不再统一行动，英镑汇率的剧烈波动就是必然的。

接下来索罗斯注意到，1992 年 9 月初英国财政大臣宣布，英国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价值 75 亿英镑的外汇用于维护汇率稳定，这等于是给索罗斯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英国政府之前宣布的维护汇率稳定的措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英国政府在维护汇率稳定方面已经力不从心了。

索罗斯盘算：这 75 亿英镑的弹药虽然不少，可是与国际热钱的几百亿英镑规模相比完全是小菜一碟。也就是说，虽然英国政府借入这些英镑希望能用它来维护汇率稳定，但实际上能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更多地还取决于索罗斯等国际炒家。

1992年9月10日，英国首相梅杰在英格兰英国工业联盟的演讲中坚定地表示：“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在我看，是在此刻背叛我们的未来。我可以十分明白地告诉你们，那不是政府的政策。”话音刚落，一些国际炒家觉得接下来应该没有多少戏唱了，于是纷纷开始获利了结。这时候的英镑汇率与年初相比贬值了差不多6%，虽然利润不丰，但毕竟小有斩获，所以他们见好就收了。

而这时候的索罗斯分析认为，在这种看似坚定的表态背后，英国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看清德国已经抛弃英国的现实。只要德国放弃对英国的保护，英镑汇率就必然会继续下跌，而不是到此为止。所以他想，这时候他需要做的应该是逆流而上增加赌注，而不是像其他炒家那样撤退。

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对德国中央银行的一篇访谈录，其中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虽然文章中并没有提到这“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但显而易见的是，其实这些就是指英国和英镑。

综合以上分析，索罗斯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出手的时候到了。如果再晚一步，英国政府赖以救命的75亿英镑援助资金就要到位，这时候再出手就会增添许多麻烦。不如“先下手为强”。

就这样，索罗斯在1992年9月15日高声宣布卖空英镑。应声之下，英镑兑德国马克的比价一路狂跌，虽然英国政府出面相救及时买入30亿美元的英镑，可是这30亿美元与国际炒家的来势汹汹相比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当天傍晚收市时，英镑兑马克的汇率已经下跌到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所以只好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据说英国政府为了对付索罗斯狙击英镑，共动用269亿美元外汇储备，最终仍然以失败告终，所以历史上英国人称1992年9月16日为“黑色星期三”。

与此相似，随后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特也开始大幅度贬值，并宣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告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从此，这位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以当年个人净赚 6.5 亿美元的业绩荣登《金融世界》杂志“华尔街收入排名表”榜首，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尚未有人打破。当年（1992 年），索罗斯基金业绩增长 67.5%。

稍事休息后，索罗斯又故伎重演，把目标瞄准东南亚，掀起一场亚洲金融风暴。此事另作叙述，这里按下不表。

从历史上看，最早正是狙击英镑一役，使得索罗斯名声大噪，同时为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照片登上全球各主要媒体头版、封面。在此之后，韩国总统甚至专门邀请他去韩国访问，以非正式顾问之名，对韩国进行的巨额投资进行可行性评估。可以说，如果索罗斯没有这样一段经历，根本就不会受到一国政府如此高度重视。

附带一提的是，上述从政治角度来对待的德国地位，在索罗斯看来目前依然如此。

2011 年 8 月 19 日出版的瑞士 *L'Hebdo* 杂志报道说，索罗斯在接受该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欧元崩溃完全有可能再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一场完全失控的银行业危机，从而导致一场新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他说，遗憾的是“在我看来，一些人还不明白欧元崩溃的后果”。他认为，欧洲的未来依然取决于德国，所以德国应当提出针对欧元区问题的解决方案来。

与此同时，索罗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杂志采访时同样表示，2011 年下半年欧元区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仍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延续，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并且还远远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回顾三年前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时，欧元区财政部长正确选择了用国家信用代替崩溃的金融系统，表示不允许其他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倒闭。可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却说这种支持只能由欧盟各成员国单独执行，不能由欧盟来执行，这就不对了。索罗斯认为，欧盟必须采取统一行动，通过发行欧元债券，从总体上用国家信用来履行财

政义务，而不是每个国家单独行动。在这其中，德国仍然应当起带头作用。
索罗斯形容说：

欧元区的未来取决于德国，打个比方，德国就像是司机，他要带好一车的人，因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国家，而且拥有最好的信用等级和长期顺差。在危机中，债权人总是发号施令，当然，这不是德国或是其总理默克尔曾经期望的位置，他们不愿意接受它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是，德国人现在处于使唤欧洲人解决欧元区危机的位置。

索罗斯警告说，如果德国人允许欧元土崩瓦解，将是灾难性的结果。

至此读者不会忘记，索罗斯 1992 年狙击英镑时就是因为德国拒绝配合英国银行利率的持续高升，从而使得英国在货币市场中持续下挫，索罗斯基于这样的判断才大笔买入 60 亿美元马克，卖出 70 亿美元英镑，最终在一个月之内净赚 15 亿美元；而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中央银行则一共损失了 60 亿美元，英镑汇率在一个月之内下挫 20%。

联想到这一点，索罗斯会不会再次利用德国及其马克这块跳板，再次发动对英镑或其他货币的猛烈攻击呢？善于从政治角度看待经济时局的索罗斯完全有可能这样做，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3

用供需关系撬动市场

用供需关系撬动市场，是索罗斯经常算的一笔账，就好像他胸中有一本关于全球政治、经济账似的。从这样的高度来看问题，当然不是一般投资者能望其项背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看不懂索罗斯投资策略的原因之一。因为你和他站的高度不一样，思考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一样。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总体上看亚洲经济属于一种虚假繁荣，货币供给过多，可是资产质量并不高。虽然索罗斯如果对此不加任何干涉，资产价格也会慢慢地跌下去，可是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他这个国际炒家所能发挥的作用。

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只要能做空亚洲金融市场上的任何一种资产，打破这种供需平衡关系，就不但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而且能确保狠狠地赚上一把，又何乐而不为呢？

为此，他精心准备前期工作，首先收集泰铢筹码，然后作为用来打击泰国的子弹。他相信，当他筹集到了足够的筹码后一旦集中放空，必定会引发原来就不稳定的泰国金融市场动荡，这样他就可以浑水摸鱼了。

1997年3月，索罗斯派出先头部队在前方打探道路，没想到被泰国政府杀了回来。泰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稳定汇率，使得索罗斯虽然抛售了泰铢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还造成了亏损，因为泰铢汇率没有贬值。这一仗，索罗斯损失了约3亿美元。

按照索罗斯的处事原则，一旦他认为自己做错了会马上掉头的。但这一次不同，因为这3亿美元本来就是他的探路经费，所以他眼睛眨也没眨，就权当交学费了。他坐下来细细分析形势，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索罗斯一番分析后发现，当时泰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有300亿美元，如果要想在国际上拆借，能够借到的外汇应该很有限。根据这样的“供”关系与索罗斯所能承受的“需”关系相对照，索罗斯认为，要想打破这种平衡关系并不是一件难事，甚至可以说他胜券在握。

1997年6月，索罗斯开始抛售国债，对泰国泰铢再次发动进攻。由于泰国资产本身定价过高，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所以在索罗斯的进攻下泰铢很快就开始下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更重要的是，索罗斯的这次“示范”动作引发了其他金融机构跟风抛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索罗斯要想做空泰铢，就说明泰铢根本不值这么多钱，于是“墙倒众人推”，你抛我也抛，泰国政府再出面托盘也无济于事了。因为就在泰铢狂跌的同时，泰国的其他资产也都纷纷下跌到非理性程度，哪怕是基本面再好的企业这时候也已经没人继续看好了。

就这样，泰铢很快就崩溃了，从而引发了整个亚洲金融市场资产定价体系的崩溃。也就是说，这些资产仍然是原来的资产，可是价格却已经下跌到面目全非的地步，都变成了“青菜萝卜价”。

在这里，从技术角度看，索罗斯的操作要领其实并不高深，只不过是狠狠地破坏了原有的“供需平衡”关系。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读者知道，资产的“价格”会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索罗斯深深懂得这一点，并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就股市、外汇投资来说，索罗斯并不能创造股票和外汇，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股票和外汇供需关系，从而扰动其价格，制造恐慌局面，让这些资产（股票或外汇）价格暴跌，以便浑水摸鱼。

稍微展开一步说，在股市投资中过多地分析基本面，认为该股票的价

格与价值相比究竟是否具有投资价值，从长期角度看似乎有道理，可是从短期角度看价值并不大。古今中外股市的价格运行规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是索罗斯投资不遵循这些规则照样能取得丰厚回报的原因。

也就是说，无论这个企业和国家的基本面如何，只要索罗斯动用大量资金破坏这种资产供需关系，马上就可以改变其价值。

如果不信，看看金融危机前后各种资产的价格变动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许多股票或企业的价格不是下跌一两成，而是动不动就下跌一半以上，甚至只剩个零头。实际上，这就是做空盘大量抛出的缘故，与股票内在价值没有多大关系。所以炒股老手知道，这时候买入股票不用过多考虑个股，买什么股票都能赚，所不同的只是捂在手里的时间长短而已。

具体到索罗斯来说，索罗斯可以说既尊重基本面又尊重市场技术。他当时面对的最大基本面是，无论 1992 年的英镑崩溃还是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不是索罗斯导演的，他在这其中只是根据基本面做出判断，在加速金融体系崩溃方面起到了助推器作用。虽然索罗斯对许多国家造成了伤害，但其本质不在于索罗斯，而是金融体系有问题。

这里重点来看看索罗斯在这其中是如何进行技术分析的。众所周知，在资产价格越来越虚高的背景下，投资者买入股票的行为会越来越谨慎，做空股票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时无论是做多还是做空的投资者，心理都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大盘异动。索罗斯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力做空股市，制造市场恐慌，引发市场抛盘涌出，合力砸盘。

通常的规律是，在一开始股市下跌时所有人会越跌越买，认为股市越是下跌离底部就越近。殊不知，股市的底部究竟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当股市下跌幅度越来越大时，原来看多的投资者就会反过来看空，同时做空股票，在市场恐慌气氛下加入到做空行列中来。

索罗斯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在一开始规划时就要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和股票筹码，至少要能挺到原来看多的投资者反过来看空时为止。只

有这样，他才能实现引蛇出洞的效果，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那么，索罗斯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呢？一方面是他在此之前已经根据市场基本面进行了详细筹划，如果没有十分把握，完全可以等待时机，而一旦觉得时机已到，这时候进行操作也就意味着对市场运作有把握了。另一方面，索罗斯手中拥有巨额资金，这种级别的资金规模本身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全球市场。也就是说，索罗斯的资金规模使得他本身就可以成为市场领导者，而不必像其他技术分析派那样看股市庄家（市场领导者）的眼色行事。

就好比说，我们平常在生活中经常会对人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实际上，需要别人考虑自己感受的都是相对弱者，强者是不需要别人顾及自己感受的。

用在投资市场上就是：市场主力与散户的操作方式完全不一样——散户需要通过技术分析来捕捉主力的蛛丝马迹，从而找到运行规律，而市场主力考虑更多的是自身规模和运作策略，怎样画出真真假假的蛛丝马迹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必混为一谈。

不用说，索罗斯手下的量子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索罗斯依靠这样的“巨无霸”，本身就是一个超级主力，无论在打破还是左右市场供需关系方面，往往都是可以说了算的。

4

抓住信息不对称漏洞

投资信息之于投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任何信息及其传播都是不对称的，谁要是能抓住其中的主动权，谁就能确保投资盈利万无一失。

深知信息重要性的索罗斯，为了达到投资安全的目的，对信息的掌握可谓具体入微。众所周知，他 1994 年 9 月就向我国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2500 万美元，从而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虽然他直到 2005 年 10 月 15 日才第一次踏上海南岛，为海南航空公司组建我国第四大航空公司大新华航空再次注资 2500 万美元，但实际上，索罗斯的航空顾问罗德·德莱克（Ronald Drake）每年都会来海南一趟实地考察经营情况；而海南航空公司则每个月都要向他做一次书面汇报。这次索罗斯亲自来海南航空公司实地考察，他更要求所有人要用英文与他交流，他听得还相当认真，不时地会做些记录。由此可见，他对这样的“小投资”也不是漫不经心的。

这种认真和严谨，全球都看得很清楚。就在 2004 年初外界对海南航空公司负债率、资金链颇多质疑时，一看到 2004 年 1 月 30 日索罗斯拥有的 1.08 亿股非上市外资股允许在沪市 B 股流通时并没有立刻套现，几乎所有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索罗斯对海南航空公司的内部信息掌握得最多，至少这时候的索罗斯是看好海南航空的！当天，海南航空 B 股应声涨停。

那么，索罗斯又是如何掌握海南航空公司信息的呢？除了上面所述以

外，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说明问题。该公司 1989 年成立之初只有省政府拨给的 1000 万元人民币，等到两年后几经周折拿到航空运输经营许可证时，这些钱差不多已用光了。1993 年该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成为国内首家股份制民航企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该公司 1994 年到 1995 年间 10 次奔赴美国华尔街，与索罗斯控股的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谈判。

为了让对方放心，该公司重金聘请全球著名的中信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编制财务报表，把所有涉外合同交给美国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把关，并且聘请美国最权威的民航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安排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专家组在海南进行两个多月的经营和财务考察。最终，美国民航业评估机构认为海南航空公司很有发展前途，值得投资，而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也认为，这是一家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才于 1995 年 9 月 27 日与海南航空公司签署合同，以每股 0.2449 美元的价格认购总股本 25% 的股份，这已经是我国政府允许外资参股民航业的上限了。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索罗斯控股的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虽然是第一股东，可是在公司董事会的 9 个席位中一直只占 2 个，并且没有介入海南航空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只负责每年参与分红就放心了；并且，公司董事长和总裁也由中方担任。

一向善于抓住信息不对称漏洞的索罗斯，正因为在与海南航空公司的合作中完全掌握了信息主动权，所以表现得非常“乖”。

当然，海南航空公司给索罗斯的回报也绝对不薄。从 1995 年到 2005 年这 10 年间的^①数据看，包括现金和红股在内，年综合投资回报率超过 30%，更不用说，索罗斯还可以从中得到更加可观的资本收益了！

在信息市场不对称中掌握主动权，这样的优势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索罗斯勤奋学习的结果。

例如，1973 年索罗斯和罗杰斯组建索罗斯基金时，索罗斯比罗杰斯大

12岁，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两人都属马，并且正好相差一轮。

当时，公司里订阅了30多种杂志和报纸，收集了1500多家美国和外国公司的金融财务记录。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要研究二三十份财务年报，从中寻找投资信息，尤其注重从杂志封面上寻找有价值的信息和内容。一旦发现投资机会，两人就一起商量，如果意见一致马上就行动；如果意见不一，就立刻放弃。

与此同时，他们与美国国内的几百家企业、国外的上千家企业有业务往来，平时关心的话题也不仅仅局限于投资方面，还包括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方面，所以他们掌握的信息要比其他投资者包括基金公司多得多，很容易获知别人看不到的内部行情和潜在信息。

罗杰斯事后回忆说：

如果我们的意见出现冲突的话，我们便不会贸然行动。当然有时也会有例外发生。如果某一项计划谁特别想去做的话，便可以行动。在交易完成的时候对与错就自然分出来了。然后我们会总结一些经验，会达成一致的看法。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有着独立的思考，不然的话情况会比较的糟糕。

这种独立思考也是在信息不对称中掌握主动权的主要途径之一，另外它能更加全面、客观、辩证地掌握信息，带来切切实实的投资利益。因为如此这般一段时间下来，回过头来就能很清晰地看出原来的哪些决策是正确的，哪些决策是失误的。但毋庸置疑，这种双方的独立思考也是后来两人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因为意见无法统一。

不过话说回来，在索罗斯和罗杰斯合作的10年中，没有哪一年是失败的，他们成为美国华尔街上的“梦幻组合”。为此，1975年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还重点报道他们两人的事迹，文章这样写道：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在购买股票方面，索罗斯和罗杰斯这对黄金搭档表现出了过人之处，他们在股票不受大众青睐的时候买入，而在股票涨到高点时卖出。他们一般不理睬共同基金、银行信托部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普遍持有的股票，除非进行卖空交易！

索罗斯和罗杰斯为什么会“不理睬”主流观点呢？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通过阅读掌握了更多的有用信息，在投资中掌握着主动权。这一点，几乎是所有顶尖投资者的共同秘诀。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等投资大师，无一不是如此。

由于掌握了不对称信息中的有利一面，所以索罗斯最喜欢寻找市场规则漏洞，也能够找到市场规则漏洞，一旦找到，就从中撕开缺口。毫无疑问，任何市场规则都有漏洞，哪怕法律再健全，在监管机构方面也会有漏洞，只要做个有心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完备的法律是一回事，法律监管机构是否愿意尽心尽力去监管又是一回事，更不用说监管效果了。

从全球发展趋势看，通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监管，尤其是对对冲基金的监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格，这就使得全球对冲基金开始纷纷从西方发达国家迁移到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两大亚洲金融中心。

专家预测，2011年至2012年内，亚洲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资产规模（不包括日本）增长速度将达到70%，全球有一半以上的基金公司资产规模会加速增长。

正如法国EDHEC风险和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管Lionel Martellini所说，在欧洲加强了对对冲基金的审查后，德国和法国的对冲基金颇为灰溜溜的。虽然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引起的，可是德国和法国各界也对他们的这个行业颇多指责，使得它们纷纷想外流。而对冲基金管理公司Man Investments亚太地区董事总经理Tim Rainsford表示，全球各国对新兴市

场关注度的日益提升，客观上在推动对冲基金转移到亚洲方面起关键作用。

这两方面一推一拉能看到，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是亚洲；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中国以及亚洲货币对全球贸易的日益重要性，都在吸引着它们奔赴亚洲来冒险。

作为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了如指掌的索罗斯，对这些又岂能体会不深？所以这时候，索罗斯利用他的信息优势精准判断市场是很自然的，2010年他在香港设立办事机构，就可以看做是对上述信息利用的最好诠释。

从过去的经历看，索罗斯紧紧抓住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弱点，牢牢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是一大重要特点和秘诀。

信息战在任何战争中都至关重要。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就会两眼一抹黑，被动挨打。索罗斯深知这个道理，并把它用得炉火纯青。

具体到金融攻击来看，金融系统在经济系统中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系统运作主要靠资金流动。在正常情况下，富余的资金应当从储户经过银行流向生产性投资领域。虽然其中也会有一些非流动因素存在，并且保持多元平衡，但这是主流。也就是说，从整个社会来看，多余的钱应当主要流向生产领域，而不是其他如投机领域。否则，这种金融体系（经济体系）必定要出问题。

不用说，在这种正常流动过程中，银行之所以会赚钱，主要利用的也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流出资金的一方（储户）与吸纳资金的一方（企业）双方信息是不对称的，否则它们双方就有可能会跳过银行中介直接进行交易。这种信息不对称有可能导致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但总体来说是可控并允许存在的。如果双方信息完全对称，银行的运作空间也就被大大压缩了。

而现在，引爆金融危机的原理也正是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严重到一定程度，单靠金融体系本身已经无法解决；或者说，全社会的富余资金已经无法正常流到生产领域继续创造价值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这种问题的恶化，可以从金融资产负债表上得到体现。从历史上看，

每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相关国家中央银行的金融负债状况都很不好看，具体表现为国家信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 GDP 增长速度。这说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信贷规模扩张出现了畸形增长；而这种畸形增长必然会因为信贷规模增长速度过快产生风险，留下将来造成贷款损失的隐患。

而进一步探讨这些国家信用扩张速度加快的原因，又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实行金融自由化，导致国外资本流入规模猛增；另一方面是，这些资金流入后一定要寻找出处，所以国内相应地会放松利率管制和借款类型限制，也就是说，本来属于正常的金融管制放松了。两者结合，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很容易出问题，也很容易遭攻击。

例如，索罗斯在引爆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当时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后，已经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过度风险，可是这些国家依然浑然不知并盲目自信，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专家的忠告，不屑一顾，这从某个角度激起了索罗斯要教训他们一下的念头。

索罗斯看到的这种过度风险其实一点也不神秘，普通读者也能观察得到。更具体一点，索罗斯看到的上面两个症状表现为：

一是随着金融自由化程度加大，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管理随之放松，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从主观上看，金融机构没有认识到这种风险管理放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从客观上看，金融机构在风险评估系统、放贷员缺乏专业训练。

二是金融体系的规章制度不健全，而这不仅包括银行系统，也包括政府部门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从而使得这种金融体系中的不安全因素越来越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看到经济发展速度快而沾沾自喜，自觉不自觉地放松了这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资本多是从国外流入的，流出国政府和金融机构会对流入国政府施加某种压力和蛊惑，诱使贷款流入国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放松监管要求。

可以说，以上两点在各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都很典型，也很突出，关

键是政府和银行体系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有没有力量及时加以解决。如果两者都不具备，发生危机是迟早的事。

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看，1993年到1996年间每年的资本流入量高达500亿到1000亿美元。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出现了明显膨胀，银行资产负债状况急剧恶化，银行贷款损失急剧上升，这一比例一般要占到15%至35%。

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系统为了阻止负债状况进一步恶化，必然会限制贷款范围，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个过程如果调节得不好，就可能直接导致全面爆发银行危机，促使许多银行无法偿还债务，反过来进一步削减金融系统的贷款能力，形成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伴随着银行负债状况恶化的是货币危机。这时候如果一旦遇到国际游资冲击，中央银行必然会提高利率水平来吸纳资金流动性，捍卫汇率水平。可是这样做，又很容易因为资金到期日不一致或发生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大原有的银行信贷风险。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合约期限通常很短，并且通常是用外汇计价的。政府为了应付随时到期的债务合约，以及因为提高利率增大债务规模，常常会弄得筋疲力尽。而越是出现这样的慌乱，就越是会加重原有的信息不对称，致使错误百出。

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呢，又很难维持原有汇率。如果汇率维持不了，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离爆发金融危机就不远了。因为在汇率下跌的冲击下，卖空本国货币的预期获利非常吸引人；这种获利预期会进一步诱使更多国际游资加入，造成金融体系崩溃。

索罗斯等人正是抓住这一要害，从以下三方面来把握进攻时机的。因为以下三方面会更加加剧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漏洞变得更大：

一是货币贬值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造成的影响

当货币贬值（汇率下跌）时，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合约必定会加重企业

债务负担，这一点藏也藏不住。与此同时，由于这是货币贬值增加的债务负担，所以实际上这时候并没有增加企业资产，从企业净资产角度看，企业的净资产是减少的。这样就加重了上面所说的这种逆向选择。也就是说，这时候企业净资产的减少会相应降低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企业运行风险越来越大，从而降低企业投资规模和经济活动水平。

例如在 1995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印度尼西亚货币卢比在短时间就贬值 75%，这时候用外汇计价的债务就相当于在原来基础上增加 3 倍，这对企业的打击是致命性的。仅仅因为这一点，许多企业包括资产负债表良好的企业，也会走向倒闭或濒临倒闭的边缘。

这时候索罗斯们进行攻击，能起到墙倒众人推的作用，变得相对容易。

二是货币贬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般来说，货币贬值会推高通货膨胀，这是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但货币贬值在推高通货膨胀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国家金融政策的开放程度和外汇储备多少。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体系是否牢固，是否值得信赖，是否经得起冲击，便于确定什么时候发动攻击才是最佳时机。

例如墨西哥 1994 年发生金融危机后，1995 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50%，这就意味着几乎什么东西的价值都是“拦腰一半”。这还只是一种现实的通货膨胀，潜在的通货膨胀预期有多大更是难以预测。

所以，借用这种现实通货膨胀和预期通货膨胀的相互作用，趁此发动金融攻击，很容易动摇民心，从而乱中取胜。

从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加剧，必然抬高银行利率；而银行利率的抬高，又会使得企业因为短期债务和利率上升的交互作用大幅度增加利息支出，彻底压缩流动资金、恶化资产负债表。从全社会来看，这时候的银行

信贷和经济活动都会大幅度减少，表现为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货币贬值对银行业危机的影响

如果说上面所述的货币贬值还只是从企业角度而言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必定会传导给银行业，触发银行业的大面积危机。不用说，银行业危机与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更密切，甚至可以说是浑然一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银行业危机的发生时间和轨迹对发动金融攻击的影响更大。

原因在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这种传导都是基于同一点：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债务。企业中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债务，从整个国家角度看，实际上就体现为这个国家银行体系中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债务。当发生货币贬值，企业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债务规模大大增加了，也就意味着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上这一块大大增加了，这样就势必会严重压缩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降低银行资产净值。如果问题比较严重，许多银行就会因为资产状况恶化被迫关门，而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崩溃即将到来。

综合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必然存在的，谁能真正掌握其中有利的一面，谁就会占据先机；这时候如果有足够的实力发动攻击兴风作浪，从中获得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你面临的毕竟不是某一家公司或某个行业，而是某个具体国家的财富。

这就是我们看到索罗斯几次挑动金融危机的操作路径之一。

顺便说句题外话，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呢？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对策来堵塞索罗斯的漏洞：一是政府在必要时必须干预金融市场，确保金融系统相对稳定，经得起国际游资冲击；二是外汇管制虽然对抵抗金融危机有帮助，但这不是根本原因，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开放是主流、是必要的；三是保持适当的汇率弹性，不要轻易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盯住汇率更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四是政府要注重发展实业经济，合理地把社会富有资金引导到产业中去，避免投资和资产领域经济泡

沫过重，否则容易给国际游资炒作创造良机。

在这其中，尤其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短期债务多是以外币计价的，容易受制于人；并且，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应付金融危机时缺乏应有对策和措施，甚至没有起码的能够确保抵御国际游资炒作的外汇储备实力，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复苏过程更长。

5

计划非常周密

古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充分的事先准备，盲目从事、仓促应战，很难确保成功。

不用说，对于索罗斯动辄几十上百亿美元的大投入来说，这样的金融战役必定会有非常周密的作战计划；并且还不止一套计划，有多种预案。为了达到成功的目的，这样的计划常常要准备好多年。例如，1992年索罗斯狙击英镑，就是在精心准备了三年之久后才开始发动总攻的。

这里，本书通过索罗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攻击过程来具体分析这一点。

索罗斯基金高级管理人员之一的德里·琼斯，在索罗斯引爆亚洲金融风暴时是最主要的操盘手之一，所以他对相关内幕情况了如指掌。2007年他在接受我国《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就详细回顾了1997年索罗斯是如何引爆亚洲金融风暴的。

他介绍说，1997年7月2日索罗斯根据琼斯等人的侦察报告和计划，带领量子基金和其他对冲基金一起发动了对泰铢的猛烈冲击。当天泰铢兑美元汇率下跌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同时这也标志着亚洲金融危机序幕正式拉开。

在此以前，琼斯已经以香港为中心，深入到东南亚等地认真调查研究了一番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和数据。随后，他

们向索罗斯提供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具体地说，琼斯 1996 年时虽然驻扎在香港，但大部分时间在走访周边国家和地区，为索罗斯寻找进攻突破口。

为了了解房地产市场行情，他们直接与开发商见面，与银行和记者交流，了解情况。他的感觉是，当时泰国的股市虽然低迷，但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非常多，部分开发商连支付利息都出现了困难。但这时候还是有很多美元流入房地产市场，开发商只要找到银行，就总有办法弄到贷款。

综合以上情形，琼斯分析认为，泰国的这种房地产形势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完全可以通过沽空泰铢来打压泰国经济，从而乱中取胜。而为了沽空泰铢，索罗斯提前 6 个月就开始准备建立沽空仓位了。

这一过程完成后，索罗斯于 1997 年 1 月联合其他对冲基金发动了对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攻击。当然，首先就是大量抛售泰铢，致使泰铢汇率直线下跌。在遭到泰国政府入市干预后，索罗斯慢慢地消耗对方的实力，折磨对方的耐心。

1997 年 6 月，索罗斯估计泰国政府该用的手段都已经用上了，可以动用的 300 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索罗斯已经看到了泰国中央银行干预市场的“底”，于是再次向泰铢发起猛烈攻击，转守为攻。6 月 30 日泰国总理还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保证“泰铢不会贬值”、一定要“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云云，可是仅仅两天后，仓促应战的泰国中央银行就在索罗斯的精密部署、精准打击下败下阵来，不得不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现浮动汇率。泰铢全面崩溃了。

琼斯回忆说，与此同时索罗斯基金还对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新加坡元等东南亚货币一一发动攻击，致使对方一一失手，操作手法大同小异。

在这其中，索罗斯在发动对印尼盾的攻击中遭到了一些损失。有意思的是，索罗斯之所以会造成损失，主要是因为高估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承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受能力，因而空仓建得太保守了些；接下来，真正的失误在于对香港特区政府的估计不足，错误地认为香港特区政府会“挺不过去”。

琼斯说，根据当时他们的研究评估，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中泡沫也不少。1984年到1997年间，香港的主要物业价格上涨了12倍，直接导致经济过热、股市飙升。仅仅1997年上半年，香港恒生指数就从12000多点飙升到16800点；1997年7月，香港恒生指数更是在一个月内就11次创出历史新高，股市泡沫显而易见。但总体上看香港的基本面要比泰国好一些，正因如此他们才把香港放在泰国后面，作为第二波进攻的主战场。

众所周知，香港本身就是个金融帝国，房地产股票和银行股票在股市中占重要地位，如果这两大块泡沫破灭，香港股市随时会出现崩盘。在索罗斯他们看来，这时候香港要想维持住联系汇率制度成本实在太高，香港特区政府很可能会挺不过去，于是随后发起了对港元的进攻。

接下来，索罗斯在汇市、股市、期货市场上联合对港元发动立体式进攻。首先大量卖空港元现汇，换成美元，同时卖空港元期货，然后在股市上卖空股票现货，辅之以在香港期货市场上卖空期货指数合约。并且在时机选择上，精心选择1998年1月和6月印尼盾和日元暴跌之时，企图借力打力，置港元以死地。

出人意料的是，索罗斯的这三次进攻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这时候不甘心失败的索罗斯只好休养生息、等待时机。果不其然，进入1998年8月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香港外汇市场上炒卖气氛浓郁、谣言四起，市场信心岌岌可危。这时候索罗斯做好了随时准备出击的前期工作。8月5日美国股市暴跌、日元汇率重挫，索罗斯从内心感到机会来了，于是发动了对港元的第四次冲击，结果，同样遭到香港特区政府的重拳回击。

从具体金额看，全球对冲基金在8月5日至7日的三天之内，就抛售港元460亿元，迫使香港特区政府紧急动用外汇储备吃进240亿港元，同时又发动其他银行接盘46亿港元。其中，索罗斯们5日当天就抛出200

多亿港元，只是没想到全部被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吸收掉了，汇率最终稳定在1美元兑7.75港元的水平上，令索罗斯们大失所望。6日，索罗斯们又继续抛售港元200多亿港元，不仅仍然被全部吸纳，并且还被香港特区政府旋即放回银行体系内，这样一来又大大缓解了银行同业拆借利息的飙升，对保持港元及利率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要知道，香港金融管理局承接的这300亿至400亿港元，远远超过当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年度预算赤字214亿的规模，从一个角度显示出了香港特区政府捍卫金融市场的坚强决心和信心。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6日所表示的那样：“我们绝对有能力和决心维持联系汇率，我们一定做得到。”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且派出两位副行长坐镇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援香港特区政府护盘行动，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反击索罗斯的坚强后盾。

不得不指出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在应付对冲基金冲击时，暗中也在筹备着对对冲基金的反冲击。8月6日对冲基金猛砸香港股市，当日跌幅将近3%，以全天最低位7254点收盘；到8月13日时香港恒生指数已经跌到6600点，可以说这时候卖空盘的获利已经非常可观了。

而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在8月10日到13日的四天中已经搜集到了960亿美元的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用来全力反击对冲基金。可以说，这几乎是香港特区政府多年来的所有积蓄了，完全可以说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孤注一掷。也正因如此，香港特区政府在酝酿这场反击战时格外小心和谨慎。

8月14日，过去一直对索罗斯逆来顺受的香港特区政府终于发起反攻，一举反败为胜，掌握主动权。

尤其是，香港特区政府选择8月14日的时机非常令人佩服。因为当天是星期五，香港股市已经连续一个星期狂跌，13日收盘指数已经接近6500点，是五年来的最低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人都在猜想14日的指

数还会创下什么样的新低。而接下来一连三天都是休市，两天是周末，一天是抗战胜利纪念日。

14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证监会、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就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取得一致意见。

就这样，从当天中午开始，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出手干预下，香港恒生指数、期货指数开始大幅度攀升。至收盘时香港恒生指数全天上涨 564 点，涨幅高达 8.47%，是当年的第二大涨幅，成交额是平时的 2 倍。外界估计，当天香港特区政府动用的资金至少有 40 亿港元。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大幅度提高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使得对冲基金无法在短期内补充子弹。

经过三天的休市，香港股市再开盘时美国股市已经大幅度回升，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干预下逐步趋稳，亚洲股市开始反弹。这些有利因素都促使香港股市继续展开强劲反弹，港元汇率开始恢复稳定。

事后资料表明，8 月 14 日至 28 日两周时间内香港特区政府共吃进股票 1200 亿港元，占香港股市总值的 7%。后来这些股票全都被交给香港特区政府的“盈富基金”在打理。

多年之后琼斯在回顾索罗斯攻击港元一战时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当时香港特区政府如此干预市场遭到各方批评，认为这样做破坏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但他从内心来说还是非常敬佩对手的，当年香港特区政府对索罗斯的反击措施确实非常到位，如果香港特区政府不是这样强有力地回击，在当时市场信心全面崩溃的条件下，香港市场很可能会全面崩溃。

从以上分析看出，周密的进攻计划和事前准备是成功的必要前提，但却不能反过来说，有了这样的周密计划和事前准备就必定会取得成功。

俗话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决定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周密的事先计划是也只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6

对直觉充满自信

索罗斯非常迷信自己的直觉，并且认为这种直觉在帮助他投机炒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他并不希望别人也学他的直觉，因为归根到底这种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更不用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直觉，也不是每个人的直觉都灵验。即使是他自己，直觉不灵的时候也很多。

据说索罗斯的直觉是疼痛——每当投资前景不妙时，他的身上就会觉得疼痛；而只要他的身体一疼，他就知道自己的投资组合有问题了。更噱头的是，如果疼的地方接近腰部，就表明他的股票买入有问题；如果疼的地方接近肩部，则表明他的股票买卖在资金方面有问题。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可信，这里都表明一点，那就是每个人在股票投资过程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索罗斯亦不例外。尤其是索罗斯这样的超级基金管理者，他所投入的资金动辄几十、上百亿美元，如果说他一点都不在乎，这是不可能的。上述说法与其说是一种神奇的本能，不如理解为这是索罗斯用直觉来解释自己的投资决策，聊以自慰。

索罗斯的直觉并不是自吹的。读者知道，直觉敏感的人多半有精神病，而索罗斯就认为他离精神错乱不远。他说他祖父是偏执狂，他也偶尔幻想自己会发疯。索罗斯的多年好友、摩根士丹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也证明：“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

不用说，索罗斯的直觉不是盲目猜测，而是针对各种经济社会现象做

出的自然反应。他的特长是，在其他人在那里关注某一行业股票时，他会自然而然地结合复杂的国际贸易情况，从全球角度来思考，从而产生直觉。当然，他的这一做法有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在全球各国拥有一大批身居要职的朋友，所以不愁信息来源，并且也不愁足够的权威信息。有了这样的基础，他的宏观经济分析就有了可靠着力点。

索罗斯的直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小时候的经历。这种经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躲避纳粹德国轰炸东躲西藏练就的求生本领，另一部分得益于他小时候所玩的“大富翁”游戏，这实际上就是今天财商教育的一部分。

小时候的索罗斯兴趣十分广泛，对一切充满好奇。他7岁时特别喜欢玩一种匈牙利版的名叫“大富翁”的游戏，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乔治·利特文（George Litwin）当时与他是玩伴中的好搭档。在这种游戏中，玩家常能成为“常胜将军”，索罗斯对此感到很不过瘾，于是自己修改游戏规则、增加难度，从而使游戏变得更加复杂、惊险，充满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小小的索罗斯在其中就增加了“证券交易”内容，显示出他未来出众的投资才能。有意思的是，在增加了游戏难度后，索罗斯依然是“常胜将军”，于是他不断制订新的游戏规则，不断增加游戏难度。

由于当时的索罗斯已经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了（至于他究竟读懂了多少则不得而知），所以后来他干脆把这个游戏命名为“资本家”。这一游戏被索罗斯玩了好多年，对他后来从事投资生涯具有深刻影响。以至于成年后的索罗斯回到故乡，童年伙伴内格尔问他从事什么职业时，索罗斯笑着问他：“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玩的‘资本家’游戏吗？我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算是‘重操旧业’。”

了解到索罗斯的这段背景后，读者就很容易理解索罗斯成为金融家后经常说的一句话了：

我喜欢改变游戏规则，当然，那是在完全掌握了原有的游戏规则之后

才需做的事——那会让我更得心应手。投资也是一种游戏，它的规则也可以是理性的！

在索罗斯小时候，当时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孩子一般要到14岁才能上学，只有有钱人家有条件花高价让孩子提早入学，所以索罗斯是10岁上学的，童年基本上在游戏中度过。

索罗斯整天沉迷于这种投资游戏，不知不觉中练就了一身“投资”本领。虽然这种所谓“投资”只是一种模拟游戏，但毋庸置疑在开启财商方面有很大帮助，这样的孩子要比同龄人早熟得多。俗话说：“实践出真知。”索罗斯在投资领域良好的直觉天性，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此。

除此以外，索罗斯的直觉同样依赖于信息灵通，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他非常善于综合运用各种消息对市场进行判断，在这其中消息灵通是基本前提。凭借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富有经验的索罗斯能够凭直觉感觉到哪些信息是可信的，哪些信息是重要的。

举个例子来说，索罗斯的成名作是狙击英镑一战，当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着重谈到了直觉问题。

“黑色星期三”事件过去后，英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这件事。英国伦敦的《每日电讯》10月双月刊头版的黑色大标题是“由于英镑暴跌，我获利10亿美金”。下面是索罗斯面带微笑、手拿酒杯的照片。照片旁是这样一段导语：“国际投资商从上个月的货币危机中获利近10亿美元。”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英国《泰晤士报》经济编辑安纳托利·凯里斯正在和女儿一起回家，他在一家饭店门口买巧克力时眼睛一瞥看到了杂志封面上的大标题，于是顺手也买了一份看起来。

一小时后他回到家里，正好接到索罗斯打来的电话。凯里斯一听电话里乱糟糟的，连忙问索罗斯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索罗斯告诉他说，他当时正在伦敦，他住的旅馆外面围满了记者，可是他想看网球比赛，怎么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办？希望凯里斯能给他一个建议。

凯里斯赶紧问，今天的《每日电讯》报上刊登的都是真的吗？索罗斯回答：当然。于是凯里斯奉劝他说，你不要与记者接触，如果你想解释自己做过的事情或者还没做过的事情，不如自己写篇文章澄清一下，或者由他去采访索罗斯。索罗斯回答说，他可以考虑这个建议。

大约半个小时后，索罗斯打电话给凯里斯说，接受他的建议，由《泰晤士报》编辑凯里斯采访他确实是个好主意。因为在索罗斯看来，通过《泰晤士报》给自己宣传一下，非常有助于让全球家喻户晓他在东欧国家所做的慈善事业，并且非常有助于以后继续开展这样的慈善事业。

就这样，当天下午两人就见了面。见面后索罗斯把他是如何突然狙击英镑的前因后果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凯里斯。虽然是涉及几百亿美元的大买卖，可是索罗斯在叙述中没有半点激动和兴奋，非常镇定自若，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在这其中，索罗斯就着重谈到了他的直觉。

凯里斯问索罗斯，为什么会把资金用来狙击英镑而不是其他货币如法郎呢？要知道，在过去两百年间，英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最稳定的，英格兰银行的信誉是最好的。索罗斯说，这就要归功于他的直觉了，因为他相信德国希望贬值的货币是英镑和里拉，而不是法郎。他说：

我感觉把赌注下在德国联邦银行上比较安全。联邦银行清楚表明它希望里拉和英镑贬值，而准备保护法郎。最后，联邦银行得分为3：0，投机商们为2：1，我由于坚决站在德国联邦银行一边而比其他商人做得好。

凯里斯问索罗斯，如果英国政府在“黑色星期三”之前提高银行利率是不是会做得更好？索罗斯回答说，直觉告诉他不可能这样做，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会鼓励这些投机炒家加快抛售英镑。而实际上，索罗斯直到周末也并不希望英镑贬值，可是到了星期三银行利率被提升上去时，就感

到坚决不能再等了，必须加快抛售才能占领市场份额。

索罗斯由此总结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系列操作行为，并不是投机的功劳。投机确实有害，尤其是在货币市场上。不过他提醒说：

但是制止这种投机行为的措施，如控制交易，通常更有害。固定汇率制也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们最终会分崩离析。实际上，任何汇率机制都是有缺陷的，它们存在时间越长，缺陷越大。避免投机行为并不是不要汇率机制，而是在欧洲只用一种货币，像在美国一样。这将使我这样的投机商无法经营，但我愿为此做出牺牲。

从直觉方面看，索罗斯最高兴的是他挑战英镑的做法完全是根据他的商业理论来进行的。并且，这种挑战成功本身就说明当时主流观点的错误。因为在此以前，市场主流观念都认为，德国联邦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英镑的，而索罗斯的直觉是相反：不。

正是在德国联邦银行表明它不采纳英格兰银行削减利率的建议，或者说是索罗斯从德国中央银行行长的表态中发现了这种蛛丝马迹，索罗斯才下了这样的赌注。

换句话说就是，索罗斯从中得到的乐趣更多地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表明自己的直觉是灵验的，就像他小时候玩游戏一样感到刺激。

后来，这篇访谈刊登在 1992 年 10 月 26 日的英国《泰晤士报》上。从此，索罗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下子在英国家喻户晓。

文章报道说，索罗斯非常清楚自己从中赚了 10 亿美元。在“黑色星期三”到来之前，索罗斯在市场上投入的资金高达 100 亿美元，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要将来抛售出去的。所以当英国财政大臣表示英国将借贷 150 亿美元捍卫英镑时，索罗斯非常高兴，因为他终于可以不费气力地就寻找到了“下家”。

索罗斯说，稍显遗憾的是，事情的发展有些超过他的预料，即当时索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罗斯还没来得及占领足够大的市场份额，英镑就退出了货币机制。

不过回过头来看，这 10 亿美元获利已经达到他这次炒作的目标。也就是说，量子基金能够获得 10 亿美元回报，基本符合索罗斯的预先设想，在这其中，索罗斯的个人收入约占三分之一。如果再包括量子基金在英国、法国、德国利率市场的长期投资获利，以及在意大利里拉业务上的短期投资获利，最终获利在 20 亿美元左右。

读者需要注意的是，索罗斯的这种直觉并不是随意可以学到的——索罗斯具有特殊的欧洲背景，一开始从事投资生涯接触到的就是套汇，并且他非常刻苦好学，熟识市场大势，尤其是在与全球各国政府领导及高层金融人士打交道过程中所得到的信息来源，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而这种信息渠道，正是他长期以来向各国慷慨慈善行为的结果。正因如此，全球顶级投资家也没有几个感觉能够学得像索罗斯的。与此同时，大多数投资家对索罗斯的这套理论不是不屑一顾就是看不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每个人在遇到重大决策时都会有意无意间寻找某种直觉来帮助决策。虽说这是一种迷信心理，但在促使自己对某种行为下定决心方面的作用不可小看。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你需要做出某种决定时，才能适当利用直觉来帮助分析、判断；绝不能在还没有这种需求时，就完全依据直觉“跟着感觉走”，这种本末倒置往往是要出问题的。

有意思的是，索罗斯的成功使得几乎全球所有避险基金经理人都流行一种“只看总体金融面，不从事证券分析”的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只看大盘、不看个股，因为大盘上涨时多数股票在上涨，大盘下跌时多数股票在下跌。这固然轻松多了，但却忽略了“索罗斯只有一个，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索罗斯”的简单道理。

要知道，索罗斯的经历和遭遇并不是任何人可以模仿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重现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许多直觉是无法学习的，更不用说直觉这东西本来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7

从长链条中捕捉机会

索罗斯从来不相信市场的有效性，相反却认为，市场链条越长其中的漏洞就越多、越容易被逮住投资机会。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他看来，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有缺陷的或者是受到歪曲的。鉴于这一点，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观察和认识也是片面的，有点像通过哈哈镜看到的東西一样。所以，他总是对那些信奉市场有效性的人付之一笑，对那些根据有效市场理论来预测市场走势的人更是不屑一顾。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自己创设的名为“量子基金”的对冲基金上看起来。

比较典型的是，索罗斯 1999 年做空网络股，2000 年又做多网络股，2003 年开始大量投资次贷资产，2008 年做空美国金融股，等等，都让人感到捉摸不定，但最终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成功之处。因为市场流行观点总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市场永远是正确的”，这就难怪别人看不懂索罗斯的许多操作手法了。

初看起来他的这种观点好像有点“怀疑一切”，但有道是“不怀疑不能见真理”。通过这种去伪存真，他比别人发现到了更多市场趋势变幻的蛛丝马迹，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精准判断市场的一个重要基础。

例如，无论 1987 年的大股灾、1992 年的英镑危机还是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都是索罗斯事先找到规则漏洞和目标对象的缺陷后，精心布局“海陆空”立体作战，从而取得战果的。

由于索罗斯在全球拥有众多追随者，所以只要他一开口就会有巨额游资跟风涌入，最终以群鳄方式共同吞噬这些“有裂缝的鸡蛋”。即使索罗斯 2000 年已经宣布金盆洗手后，这种局面也没受到多大影响。

以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看，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在索罗斯看来，金融衍生产品过多以至于掩盖了巨大的银行风险是其中之一。索罗斯认为，只要认清其中存在的问题，就可以在提高获利方面大有裨益。

金融衍生产品多种多样，并不是轻而易举能说得清的。简单地说，传统的做法是，银行放贷出去后就会把贷款记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但与此同时，也会把相应的信用风险留在银行内部。这种信用风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坏账损失”及其“可能性”——如果已经发生坏账，当然就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坏账损失”，如果这种坏账还没有发生，只是一种可能（理论上讲任何放贷行为都是有可能产生坏账损失的），会计上叫“或有损失”，即或者可能会发生损失，或者可能不发生损失。

而现在在金融衍生产品中就有一种产品，专门对这些已经形成坏账或者形成坏账可能性较大的损失进行豪华包装，然后在市场上对外公开出售。这就是爆发次贷危机中的“次贷”（质量不高、收回风险较大的贷款）。

这样做的实质，就是把本来留在银行内部的坏账损失及其可能，从银行分离出来，留给中介机构。而这些中介机构把这些“次贷”包装一番后重新在市场上销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又变成一种冠冕堂皇的“证券”。看得出，这实际上相当于“以次充好”或者干脆叫“废物利用”。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呢，就使得提供这些“次贷”的银行机构轻而易举地就魔术般地消除了账面上原有的抵押贷款资产，变得轻装上阵起来。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皆大欢喜的金融炼金术——想买房的穷人只要付出很少的首付款甚至零首付，就能从银行得到房屋贷款、住上新房；贷款银行不用担心会造成坏账损失，因为这部分抵押贷款资产已经出售给了中介公司，自己已经提前回笼了资金，获利是明摆着的，中介公司不用提供

贷款、不用承担风险，就可以两头赚取服务费；而由这种抵押贷款派生出来的各种五彩缤纷的金融衍生产品，又能很好地满足市场上各种有投资需求的人的爱好和需要，给他们提供一种生财之道。

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2008年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测算是：当时美国市场上的次贷总额约为1.5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规模约为2万亿美元，从中衍生出来的担保债务证券(CDO)约为1万多亿美元，信贷违约掉期(CDS)约为几十万亿美元。

换个角度看，在上述皆大欢喜的背后有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原来银行放贷出去后形成的信用风险并没有消失，最多只是从银行内部转移到了外部。也就是说，这种信用风险仍然在社会上飘荡，随时可能把风险变为现实。

就好比这两年我国冒出的“地沟油”问题。餐饮企业的废水废渣流入阴沟，变成地沟水，构成了对环境的严重污染。而现在被不法分子从中提炼出“地沟油”流向餐桌，实际上这不但没有解决原来的污染问题，相反还形成了新的污染，进一步危害食客身体健康。

回过头来看，金融衍生产品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效率。可是如果一旦这些衍生产品眼花缭乱到让人看不懂的地步，就恰好说明其中蕴涵着的巨大风险已经被人所忽略。这种虚拟经济泡沫越吹越大，一旦脱离实体经济支撑，就会彻底变成投机经济。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市场上原来只有1元钱的金融资产（贷款额度），最后在市场上流通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规模加起来高达十几元、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金融风险被急剧放大了十几倍几十倍。

这时候如果金融监管跟不上（实际上很难跟得上），这种金融创新就会如脱缰之马，一有外力冲击，很容易产生脱节，从而引发金融危机。从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来看，正是如此。

看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可谓严格，但它的监管对象只是商业

银行，并不包括投资银行；负责监管投资银行的机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也是在 2004 年经过艰苦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在这样的夹缝中，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样庞大的金融机构可以无忧无虑地进行金融创新，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并最终失去控制。

在我国读者看来，这种完全相信市场能够自行调节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实在很可笑，可是这却是过去几十年来世界通行的经济理论。索罗斯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例如，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完全不干预主义”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任期为 1981 年至 1989 年）大为赞赏，这种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的经济政策，一度被称为“里根主义”。

但屡屡从政府放任市场自由流动中得到攻击机会甜头的索罗斯，却非常蔑视这种说法。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说：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就好比说，20 世纪 90 年代初英国为了配合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联系汇率制度，把英镑汇率人为固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必然会引发国际游资的高度关注，最终发生灾难一样。

在这些国际游资中，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是最先发难的，它在市场上大规模抛售英镑买入德国马克。这时候的英镑汇率不是高吗？抛售英镑肯定是有利可图的，而转手之间买入价格较低的马克，又不吃亏，索罗斯可谓两头占便宜。

大规模抛售英镑，给市场的信号是“英镑正在贬值，将来会继续贬值”。

为了消除这种贬值预期，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不得不针锋相对：买入英镑、卖出德国马克，同时辅之以提高利率等措施。

可是这种种努力仍然没有斗过量子基金的攻击，最终不得不退出欧洲货币汇率体系，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在短短一个月内英镑汇率就下跌 20%。最多的时候，量子基金一天就从中获利 10 亿美元，声名大振。

类似情形同样发生在量子基金在此后不久攻击意大利货币里拉中。

关于这些，本书后面有更详细的描述。所有这些都表明，量子基金在索罗斯手里已经被玩得炉火纯青，成为打击一国货币的有力武器。而这种破坏作用，又正是各国政府防备有加的，这为索罗斯增添了不少骂名。

可是这能怪索罗斯吗？如果换了别人看到这样的机会，也同样会这样乘虚而入的。只是索罗斯在长长的市场链条中更清楚地看到了漏洞，并且又具备攻击这种漏洞的实力，所以才最先发难的。

这样的市场漏洞不仅过去有，以后还会不断出现。所以，诅咒和谩骂索罗斯根本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堵塞漏洞，所谓“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所以索罗斯们永远不愁没机会。

例如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掀起了一股“太太炒汇热”，并且越来越疯狂。在过去，日本交易界和投资界都由男性把持，成千上万的日本家庭主妇投入网络外汇市场交易后，这些男性嘲笑她们为“穿和服的渡边太太”。可是千万别小看这群“和服炒家”的力量，“蚂蚁扛泰山”可以在市场上形成呼风唤雨的力量。索罗斯甚至认为，2007 年 2 月全球股市一天蒸发 6000 多亿美元市值，就是由这群“和服炒家”实施的，直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包括她们在内的整个日本私人网络外汇交易额日均高达 91 亿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五分之一！

那么，日本政府是怎样来“扎紧篱笆墙”的呢？从 2010 年 8 月起，日本将散户交易者保证金杠杆比例限制在 50 倍以内，2011 年又进一步收缩到 25 倍以内。这种防止市场链条进一步延长的做法，受到索罗斯的好评。

8

寻找市场趋势转折点

索罗斯投资股票取得成功的最关键一点，是他善于认清在什么时候市场开始依靠内在动力发展壮大。不用说，这就是市场的转折点。可以说，无论是谁只要能找到这个转折点就知道该怎么操作，并稳操胜券。

那么，索罗斯是怎样寻找这个重要转折点的呢？他的基本方法如下：

一是这时候的市场趋势还没有被确认，可是一旦被确认，这种趋势就会不断被自我强化。不过由于当时市场趋势尚未得到确认，所以必然会各种观点莫衷一是；显而易见，下一步市场趋势的发展与各种流行观点尤其是偏见都是有联系的，具体地说是偏见的存在会进一步强化和影响市场趋势发展。而实际上这时候，就意味着下一步的市场趋势已经得到基本确立或即将确立了。

二是这种市场趋势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就是说，任何流行观点和偏见虽然会对市场趋势产生影响，但市场趋势的发展方向究竟如何，需要经得起各种外部冲击的反复考验。

三是如果这种市场趋势经受住了考验，也就是说在各种偏见的冲击下依然这样继续下去，那么索罗斯就判断：这时候市场进入了“加速期”。

四是经常会有市场流行趋势与市场发展趋势之间出现很大背离的情形，每当这时候就是特别需要投资者认清真相的时刻。

五是市场最终形成自我强化趋势的外在表现，是连续不停地出现上涨

或下跌。这也就意味着，从这时候开始市场真正开始逆转了。一直逆转到整个市场强化过程停滞不前，市场流行观念开始发生动摇，这时候就到了索罗斯所说的“交叉点”，意味着市场有可能向相反方向发展了。索罗斯据此判断：灾难性的大涨或大跌即将开始。

从投资实践中看，索罗斯的操作手法是公认的“逆向操作”。但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一般投资者所奉行的、股神巴菲特所说的那种“当其他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慌；当其他人恐慌的时候，你要贪婪”，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

所以能看到，索罗斯在大多数时候都会跟着市场趋势进行投资，但他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留意寻找市场趋势转折点，而不是稀里糊涂地随波逐流，这是他的最大特点，也是他的成功秘诀。

他的通常做法是：首先形成一个自我假设，然后建立仓位去不断测试这个假设，等待市场来证明这个假设成立与否。

因为索罗斯的投资规模太大，所以他必须通过这种实验进行检验后才能大规模投入。这是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也反映了他的小心翼翼。

索罗斯小心翼翼的投资风格尤其体现在他的逆向操作中，而这种操作有赖于寻找市场趋势转折点。转折点找到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索罗斯认为，股市投资不能由着性子来，所以，简单照搬照抄上面巴菲特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具体地说，股票投资并不是不可以逆向操作，事实上他正是逆向操作的身体力行者；但这种逆向操作一定要有道理，而不是意气用事，他把这称之为“与大众为敌”。只有建立在对市场趋势转折点的分析判断基础之上，这种“与大众为敌”才可能是头脑清晰的、有意义的。

索罗斯在 2009 年 6 月访问我国时，中央电视台记者就特地向他提到巴菲特的这句有关“贪婪”的名言，然后问他是否也有类似于这种对投资者的忠告要对观众说。

索罗斯摇摇头说，他不但没有这种忠告，并且也不接受巴菲特的这一说法。他说，回过头来看自己过去的许多判断是错误的，总是卖得太早、买得太迟，因为总想精准判断市场，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之所以比别的投资者业绩更好，是因为他总是在不断反省并努力改正错误。

在这里，索罗斯固然有谦虚的成分，但也是一种实话实说。虽说他具有精准判断市场的本领，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的，谁也做不到百分之百。并且，只有当投资者发现自己市场判断不当能够及时修正错误时，才有可能挽回损失，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中可以看出，索罗斯的这种小心翼翼尤其是在逆向操作时的谨慎态度，一方面表明他对这种市场趋势的判断也只是一种假设，没有十分把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反省和思考，及时改正失误。

索罗斯在实战中寻找市场趋势转折点的步骤一般分为以下五步：

一是确认市场混乱

索罗斯认为，投资市场的混乱是永恒的，只有能够确认这种市场混乱并加以把握，才能胜人一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股市运作本来就是建立在一种群体本能基础之上，重要的是能在这种群体本能生效那一刻迅速做出反应。他这样解释说：“我沉迷于混乱，那正是我挣钱的良方，理解金融市场中的革命性进程。”

二是挖掘过度反应

索罗斯认为，投资市场的混乱永恒地体现一点，就是市场中永远存在着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却往往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正可以从这种过度反应中找到投资机会或逃命机会。

在索罗斯看来，产生这种过度反应的原因在于投资者个人情绪对市场所起的推波助澜。由于这是一种情绪反应，所以往往容易走极端，而这正

好为理性投资者把握市场机会创造了条件。

回过头来看索罗斯的投资经历，获利最丰厚的一块正是从市场过度反应中挖掘得到的。他深深知道，金融市场中一旦形成这种过度反应，就会形成一种“自我推进”运动，只要善于把握这种“自我推进”运动规律来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投资差价。

三是善于乱中取胜

乱中取胜人人向往，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这需要高超的技术。

从索罗斯的情况看，他的一项重要能力就是善于从混乱中找到清晰的投资目标。美国华尔街一家长期研究对冲基金业绩的公司认为，索罗斯最善于从全球角度来观察形势，并且非常了解这个市场是如何运作的，非常清楚哪里可以通过杠杆操作来扩大战果。

正如评论家马德瑞克所说：“姑且不论沃伦·巴菲特及索罗斯的个人天赋，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于能在金融市场赚钱特别有利。”意思是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就处于一种动荡之中，尤其是过去20年里全球资金市场出现了戏剧性的混乱扩张。有本事的人都喜欢这样的混乱状态，因为这便于他们乱中取胜。

而索罗斯自己也说过：凡是金融市场都不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就更是如此，市场越乱就越容易赚钱。道理很简单，如果形势变得越糟糕，将来反弹的力度就越大。这就是我国投资者所熟悉的“横有多长，竖有多高”的道理——股市横盘时间越长，将来的反弹力度越大。

四是从历史轨迹中寻找相似点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轨迹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供借鉴。索罗斯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非常善于从历史轨迹中寻找股市未来走势。他成功地预测到1987年的股市崩盘，实际上就得益于这种预测技术。

例如把1987年前后的股市运行轨迹与1929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相对照，索罗斯发现，这两者之间无论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对策（没有注入等量货币，造成货币流动性不足），美国总统在股灾爆发初期的讲话内容，还是每日价格波动，股市累计下跌幅度（36%）等，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为索罗斯的成功预测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会有这种相似之处呢？究其原因在于，任何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必然会有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从而表现出各种蛛丝马迹来。这种蛛丝马迹往往会被粗心大意者所忽略，可是对于索罗斯这种习惯于考察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动的投资大腕来说，就正中下怀了，一逮一个准。

五是化繁为简

影响投资市场的因素太多，如果要从所有影响因素来分析市场走势，可以说没完没了。无论从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气候、产业前景、个股基本面、历史走势图等方面看，都可以列出一大堆理论和资料，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可是在索罗斯看来，投资一定要学会化繁为简，因为归根到底掌握和分析这些资料的目的只有一个：买卖或者不参与买卖，以及参与或退出买卖的时机，如此而已。

所以能看到，索罗斯为什么每天要阅读10多份各种专业刊物，目的就是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精细地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而不是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

为了确保这种化繁为简判断的准确性，索罗斯还亲自在全球范围内了解不动产、农牧业、网络公司、保险公司、金融产品、超级市场等领域的行情，而不只是坐在家里听听建议和汇报。并且，他每天确保有三分之一时间用于思考问题。为什么，就是为了能确保在他的投资生涯中不被各种信息所误导。相比而言，有些投资者总是喜欢四处打听各种消息，尤其

是小道消息，并据此做出判断，其风险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众所周知，索罗斯最早学的是哲学，当他感到自己无法成为哲学家时，才毅然投身于金融市场，并且始终用哲学来指导投资。

所以，索罗斯无论是多次成功预见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是预测市场趋势转折点，都与他的哲学思维不无关系。他自称拥有一套特殊的理论或称哲学，使得他能在泡沫形成时就能清晰地辨别出来。

不得不承认，索罗斯确实具有这样的本领，并从中受益匪浅。要知道，他依据“反身性”原理所做出的判断往往涉及规模几百亿美元的投资，判断方向事关重大，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关心这种方法的正确性。

9

耐心等待机会出现

索罗斯投资股票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严格的原则和规则，看上去颇有一些随心所欲。但这种随心所欲又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更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到的，因为索罗斯特别善于从混乱的市场状态中耐心等待机会的出现。一旦机会来临，他会像猎手一样迅猛出击，把猎物收入囊中。

例如，1972 年索罗斯发现在新一代银行家中有许多是受过高等商业教育的，于是他判断美国银行业将会有新的突破，并为此写下一系列研究报告。这时候银行业股票十分低迷，他力排众议大量买入，显得十分另类。后来的事情发展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不久以后银行业股票价格就开始上涨，索罗斯由此获得了 50% 的投资获利。

同样是在 1972 年，索罗斯从政府部门的一份报告中看到一条信息，说美国的发展过分依赖于外国的能源资源，他就大量收购石油钻井、石油设备、煤炭公司资源的股票。结果仅仅在一年之后就发生石油危机，能源类股票价格飞涨，索罗斯从中大获其利。

类似的情形还有食品危机等，索罗斯在食品危机到来之前提前买入化肥、农场设施、粮食加工类股票，也都获利颇丰。

据说有人曾经问索罗斯：“你的投资风格像什么动物？”索罗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鳄鱼。”于是他就有了“金融大鳄”的称号。

确实，从过去的投资经历看，索罗斯就像一条平时喜欢蛰伏于森林湖泊旁等待猎物出现的鳄鱼一样，夹杂在乱草丛中几乎很难被人发现，可是它却在专心致志地等待猎物出现。

1992年，泰国经济界普遍认为，泰国首都曼谷应该取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从而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至少也要成为第二个香港。

这在外界看来，无疑是大跃进式的不切实际，可是泰国政府却沉浸在这种迷幻之中，一味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以加速这一天的到来。

索罗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开始关注起泰国的金融市场变化来。

1995年索罗斯读到一份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对亚洲7个国家经济状况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后，更加坚定了这方面的认识。

这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着劳动力素质低下、贸易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上扬、经济过热的危险局面，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面临着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债台高筑、严重缺乏高级技术人员等状况，经济发展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成长性衰退”之中。

该报告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陷入了一种“乐观的错误”，这时候如果加快金融市场自由化步伐，会对这种“乐观的错误”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严重加剧这些国家的泡沫经济，从而为索罗斯这样的“金融苍蝇”提供绝好的进攻机会。

索罗斯读到这份报告后，不但没有为其中称他为“金融苍蝇”而生气，相反却暗暗高兴，因为这其中就有他所需要的重要信息。

索罗斯想，既然如此，那么他就等待最后的机会来临吧，说不定还能创造一个类似于击垮英格兰银行式的奇迹来呢。

他一边这样想，一边观察着东南亚各国在这份研究报告出台后的反应，结果没想到，这些沉浸在“东南亚奇迹”梦幻之中的政府好像对此依然无动于衷，这让索罗斯既感到有些失落，又有些兴奋。他想，这样重大的信

息居然没人重视，真是太好了。

而这时候，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以泰国为例，泰国从外国银行取得大量的低息美元贷款后，其中有 30% 投向房地产业。结果自然是，随着房地产业的低迷，银行呆账、坏账规模一下子就上去了，许多贷款根本就收不回来，资产质量严重恶化。

索罗斯是不是很享受“鳄鱼”的称号呢，或许从下面这段插曲中可以看出来。2005 年末，当时的索罗斯正好在我国，记者把一尊中国龙送到他手上作为礼物，他笑着说：“为什么不送我一条鳄鱼呢？”

要知道，在英语的习惯用法里，鳄鱼是一种狡猾可爱的动物，索罗斯过去并不喜欢别人给他的这个称号，甚至可以说有些讨厌。中国记者对索罗斯解释说，按照中国习俗，索罗斯属马，所以现在送他一条龙，是祝愿他永远具有一种“龙马精神”。看得出，索罗斯听了这话后好像有些感动。后来他在返回美国时把其他礼物都留下了，唯独带走了这条龙。

权威资料表明，1997 年 6 月泰国金融机构的风险债权总额高达 4860 亿泰铢，占贷款总额的 31.5%。甚至有人认为，泰国金融业这时候的实际坏账损失高达 8000 亿至 9000 亿泰铢（约 310 亿至 350 亿美元）。

要知道，1994 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债务危机时的项目逆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7.8%；而 1996 年泰国的这一数据已经高达 8.2%，可以说这时候泰国爆发经济危机已经是兵临城下了，只要有人点燃导火线，危机马上就会爆发。而这一次，索罗斯就决心要充当这个点火人。

就在这时候，1997 年初泰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外国投资者纷纷抛售泰铢。索罗斯一看发起总攻的时机已到，于是联合国际金融投机炒家集体进攻泰铢。建立在沙滩上的泰铢堡垒，又哪里抵抗得了这种攻击呢？

索罗斯的这种操作手法与其他投资大师相比区别在于，其他人总是按照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消息来做出投资决策，可是索罗斯不是这样。在他看来，这种投资方法反应过于缓慢，他更喜欢以小见大、一叶知秋，

从该上市公司的一些蛛丝马迹中判断未来发展趋势，然后静心等待市场转折点到来。也许，这就是有人把索罗斯称为“投机分子”的主要理由。试想，如果投资股票不看基本面还能叫投资吗？确实。可是索罗斯不这么想，他认为无论看什么，关键是要有最终获利，“能获利才是硬道理”。

那么，索罗斯又是从哪里来察觉蛛丝马迹的呢？重要渠道之一在于全球金融领袖的公开声明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各种决策。

在索罗斯看来，只要关注全球金融领袖们的一举一动，从中进行分析判断，在他这个层面就很容易察觉出某家上市公司乃至某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动向、节奏。

在这些芜杂的信息和烟幕中，再进行去伪存真，他就基本上能了解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次序了：首先发生了什么，然后可能怎么样，接下来又会是什么样的可能性。

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投资依据。只不过普通投资者不可能像索罗斯这样站得高、看得远，能掌握这么多一手货，并且又都是来自高层。

所以即使你拥有索罗斯一样的本领，也无法与他相提并论，这才是让别人乃至各国政府感到可怕的地方。

因为一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哪怕是最高机密，也会在利率和汇率变动上体现出来。而索罗斯就具有这样的本领，善于对这种利率和汇率变动进行研究、分析，寻找漏洞和规律，从而形成他自己的判断。

索罗斯在耐心等待投资机会出现的过程中一般经过这样三部曲：

一是预测市场趋势变动

预测市场趋势变动是投资者的一项必修课，也是索罗斯的强项，它直接关系到投资时机的选择和最终业绩。

索罗斯在这方面的技巧是，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中，比别人更早地确认股票市场的价格行情突变。一旦他掌握了决定该股

票或该行业命运的影响因素所在，就会比别人更早开始行动，可能会提前半年左右。这也是索罗斯为什么会先人一步抢占先机的主要原因。

二是等待走出市场发展瓶颈

市场变动趋势即使预测正确，也不一定会心想事成，完全按照你所设想的一路走下去。

实践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许多投资者对市场趋势的把握很准确，可是由于缺乏自信，往往在紧要关头犹豫不决，白白错失良机。在股市投资中，即使出现一波大行情，也不会一路捂到底，最终只赚了点蝇头小利。究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投资者在市场发展遇到瓶颈时动摇了信念，自己吓自己，以至于因小失大。

索罗斯在这方面的技巧是，一旦市场行情判断准确就会充满自信。每当遇到市场发展瓶颈时，也就是一般投资者认为需要落袋为安，实际上这只是上升过程中一个小停顿的时候，索罗斯会最大限度地追加投入，把获利水平推高到最高点。

索罗斯的一句名言是：“对和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在正确时收获了多少和你在错误时损失了多少。”所以看到，索罗斯如果认为自己在某件事情上的决策是正确的，他的投入会多多益善，“只有更多，没有最多”。

三是先投资，后考察

和一般投资者看准了再投资不同，索罗斯的投资依据主要是大势所趋，而不是具体的个股。他常常的做法是先投资，再修正投资决策，他称之为“先投资，后考察”。

具体地说，索罗斯总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假设市场下一步会怎么样，然后买入一点股票试验一下，让市场来检验他的这种假设是否合乎实际。如果这种假设得到了验证，他就继续追加投资，并且是投入巨资肯定这种

假设，如果假设得到了否定，他就马上撤退，“改邪归正”。

这种投资风格可谓别具一格。虽然在实践中也被中小投资者采用，但在世界级投资大师中却很少见。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可以说索罗斯在投资市场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找这种假设成立的依据，然后去证实或证伪。一旦这样的趋势得到成立，并且能在趋势变化临界点上找到机会大笔投入，不用说就会获得超常的投资业绩回报了。

从历史上看，索罗斯对市场的判断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独特而有效。例如，他 2009 年 6 月访问我国，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认为，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所有投资都应当以此为基础进行规划。

他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负债从 2008 年 9 月的 8000 亿美元增加到当年年末的 2 万亿美元，实际上并没有包括它们担保的另外七八万亿美元的债款在内，如果算上后者，总数应该是 10 万亿美元。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别人眼里的 2 万亿美元负债在索罗斯眼里实际上应该看做是 10 万亿美元，未来的情况要比现实严峻得多。这个因素如果要消除（事实上根本无法消除）就一定会引发全球性通货膨胀，对全球经济会产生严重威胁。所以索罗斯说：

投资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还有一个自己很看重的开放式社会基金会。同时，我也有一个指导我赚钱和花钱的原则（理念），事实上这才是我最关心的……我关心我的原则，以及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我非常渴望了解现实。对大多数人而言，股市似乎是虚幻的，总是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门科学，是社会及人的行为的真实反映，是我研究现实世界的实验室。

不用说，这简直就是索罗斯自小就有的梦想了。

想当年，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索罗斯才只有 9 岁，在苏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联军队入侵芬兰后，索罗斯从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援助芬兰的呼吁，就急匆匆地赶到报社办公室积极响应，这给报社编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才只有9岁的孩子呀，就能想到为邻国提供战争援助了，实在了不起。为此，记者专门写了一篇报道讲述这个故事。这说明，小时候的索罗斯就有立志要做“救世主”的梦想。

直到索罗斯成年后，有个记者开玩笑说，索罗斯应该被任命为罗马教皇。索罗斯“生气”地说：“为什么呀，我现在可是教皇的上司了！”也就是说，索罗斯仍然相信自己具有独一无二的天赋来造福人类。

10

片言只语就能得到启发

由于索罗斯的投资没有定法，所以他特别注重各种信息哪怕是蛛丝马迹的搜集，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作为证明或者证伪的假设前提。为此，他需要丰富的信息量，却又不会淹没在这些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常常只需片言只语就能从中得到启发，酝酿出一场大小不同的战役来。

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需要具备老道的市场经验和判断能力，而这恰好是索罗斯的一大特长。所以几个因素结合下来，就铸造了股神索罗斯。这样的功底和准备工作摆在那里，他往往能从一些别人熟视无睹的表面文章中发现他需要的信息，从而做出精准的市场判断来。

从某个角度看，1992 年他狙击英镑就是从一篇文章中得到信息的。

话说从 1979 年开始，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没有统一货币，但已经统一了各国货币汇率，构成欧洲货币汇率连保体系。根据该体系规定，各国汇率只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央汇率”25% 的范围内上下浮动，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会采取行动出面进行干预。

但显而易见，各国经济发展速度是不可能一样的，这就决定了各国利率和通货膨胀也相差悬殊，这时候的货币政策根本无法一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保持汇率相对稳定，就只能勉为其难了。最典型的是，当本国汇率波动剧烈时，为了确保连保体系的有效运转，该国中央银行就不得不买进疲软的货币、卖出坚挺的货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

持市场稳定。而当时的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198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表现为德国货币马克随之坚挺。而到了1992年，英国经济开始不景气起来，从而导致英国货币英镑相对疲软。为了克服这种局面，英国不得不不断提高银行利率，但这样做又必然会伤害英国利益，所以英国需要对外寻求德国降低马克利率来协助英国缓解英镑压力。而这时候的德国呢，经济依然在强劲增长，所以不可能采取降低利率政策，否则就会使得经济走向虚热。

德国在利率政策上的拒绝配合，促使英国英镑汇率不断走低。这时候虽然英国、德国在汇率政策上也在联手抛售马克买入英镑，但仍然不见起色，因为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正如1992年9月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欧洲经济共同体货币体制的不稳定，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货币贬值。

这一观点和索罗斯不谋而合。索罗斯敏感地认识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德国将准备撤退了，德国将不会和英国继续联手玩这种游戏了。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而是在这方面最最权威的中央银行行长。既然如此，现在就应该轮到索罗斯出手了。

索罗斯怎么出手呢？请不要忘了索罗斯旗下的巨无霸量子基金。这时候索罗斯从量子基金中划出5%的比例作为保证金，大笔借入英镑买入马克。他想，将来英镑汇率一定会继续大幅度下跌，现在趁它还没有下跌的时候大量借入，买入将来汇率一定会大幅度上升的马克（因为德国的经济正在加速发展进程中），等到将来两者之间的汇率发生变动，就可以马上卖出马克、归还英镑了，这是只赚不赔的事。

索罗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通过这一举措，量子基金卖空了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入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仅仅一个多

月时间里就净赚 15 亿美元；与此同时，英镑则在一个月內汇率就下跌了 20%，欧洲各国中央银行共计损失 60 亿美元。

所以千万不要忽视大量阅读在索罗斯投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广泛、大量的阅读，一方面使得索罗斯耳听八方；另一方面又使得他能够从中辨别真伪，从蛛丝马迹中挖掘到别人不易察觉的有用信息。

例如，同样是看新闻、听报告、读报纸，别人也许是一带而过，当做一种消遣，可是在索罗斯看来，却是寻找投资机会的重要窗口。这种阅读叫解读。

那是 1972 年的一天晚上，索罗斯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国民城市银行正在招待证券分析师们吃晚饭。他觉得很奇怪，因为这种事情过去从来就没有过，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呀！

但索罗斯就是索罗斯，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觉得好奇，仅仅满足于街谈巷议，而是敏锐地觉察到其中必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虽然他并没有受到邀请，没有参加晚宴，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是却很自然地从中联想到是不是有投资机会，这就很难得了。

他猜想，这一举措多半说明银行业可能有什么利好消息要公布。于是，他马上吩咐手下买进业绩良好的银行股，等待股价上涨。果然不出他所料，他买入的这些银行股票后来获利回报都超过 50%。

再例如 1992 年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在一次演说中提到：如果投资者认为欧元是一揽子固定货币的话，那就错得离谱了。

索罗斯听了这话后觉得其中话里有话，猜想很可能是影射当时很虚弱的意大利货币里拉吧。联想到当时德国总统为了经济问题一再提高马克利率，从而使得马克成为一种强势货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这时候的英国和意大利只好不得不跟进。可是殊不知，英国和意大利的经济情况并不理想，所以这两个国家对德国政策有诸多抱怨。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索罗斯找到施莱辛格，特地问他是不是喜欢用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欧元作为统一货币？施莱辛格回答说，他喜欢欧元的这种构想，但不喜欢欧元这个名称；如果这种货币叫马克，他会更容易接受。

有了这样的交底，索罗斯如获至宝，马上卖空意大利货币里拉，结果狠赚了3亿美元；同时又把一大笔英镑换成马克，更是从中赚了10亿美元。

由此可见，同是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会听不会听大不一样。



等待老虎打盹的时候

英镑和美元一样，是全球硬通货。长期以来，英镑在全球具有极高的威望，“母以子贵”，发行英镑的英格兰银行本身也就代表着繁荣和力量。可是俗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貌似强大无比背后，就被索罗斯一眼看出了漏洞。于是，索罗斯准备给英镑一点颜色瞧瞧，动摇动摇这根在西方国家眼里坚强无比的金融支柱。

1991年2月9日，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经过两天辩论，会议通过并草签了《欧洲联盟条约》（包括《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史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共同体在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一体化步伐在进一步加快。

根据该条约设想，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12个欧洲共同体联盟国，将在2000年前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和单一货币。而事实上，从1987年开始大多数欧洲货币就已经稳定在德国马克上了。建立单一货币是大势所趋，但这种做法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毕竟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要把各国货币硬性统一到某种货币上来，必定会“有人欢喜有人忧”。

以英镑为例，当时的英镑汇率为1英镑兑2.95马克，应该是很高的水平了。索罗斯认为，欧洲共同体联盟建立后，各成员国必须保持同一水平的汇率，如果汇率多样化，容易招致国际游资的冲击。而当时的英国经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济正在衰退中，英镑以后要想长期保持这样的高汇率基本上不可能；换句话说就是，长期来看英镑必然要贬值。当然，这种情形不仅反映在英镑上，同样也反映在意大利里拉、法国法郎上。也就是说，长期来看英国政府一定会被迫退出这种牵强附会的货币汇率机制，否则成本太高。

看准了这一点，索罗斯开始行动了。索罗斯想，凭他的崇高信誉，用10亿美元作为抵押能借到100亿美元资金用于炒作。如果他大量抛售英镑，造成英镑贬值预期，必定会引发英国股市震荡，连带影响到其他国家汇率发生变动，在这种天下大乱之际，他正可以乱中取胜大捞一把。

后来的事情经过正像他设想的那样进行。索罗斯在狙击英镑的战役中，一共抛售了70亿美元英镑，他用这些钱购买了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以及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少量的法国法郎。并且，正是索罗斯的这种大量抛售英镑，形成了市场对英镑的长期贬值预期，他从这种卖空中获利10亿美元。

由于索罗斯大量买入德国马克，这就使得市场形成了对德国马克的看涨预期。这种看涨预期对德国股票是不利的，可是对德国的债券投资却是有益的，所以这时候他开始长期投资德国债券市场。当然，不仅是德国债券市场，还包括法国债券市场。

容易看出，索罗斯把原来自己手中的英国英镑换成德国马克，这一漂亮转身不仅已经让他获得10亿美元的现实收入，而且还使得他手中拥有的德国马克成为一种非常坚挺的货币，索罗斯在这其中获益匪浅。

因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场金融“大跃进”运动，纷纷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希望以此来驱动经济快速增长。可是这些国家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主要是依靠外延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在要想通过金融开放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抗衡，很容易被外力所打垮。

正如索罗斯2010年7月2日在《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假如德国退

出欧元区”的文章中所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正是当初欧元启动之初就存在的一个漏洞。因为当初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货币联盟（欧洲中央银行）时，并没有建立政治联盟（中央财政部）。这样一来就留下一个先天性缺陷：当涉及各国主权信用时，欧元区各成员国必定会各自为战，各打各的小算盘。

例如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希腊出现主权债务时，欧盟当局的反应就因为各成员国分歧太大而过于迟缓，主要是其中的德国对通货膨胀过于敏感，不愿意承担改变的风险。而这也难怪，因为德国在 20 世纪中曾经有过两次价格失控的惨痛经历，不会轻易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可是这样一来，尽管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意见都很一致，在最终推出救援方案时也会费力得多，甚至弄得不好，完全有可能把整个欧洲也拉下水，所以其他国家纷纷指责德国。

可是这时候的德国其实也很冤枉：一方面，德国具有最高的国家信用，自然不想因为希腊危机让自己蒙羞，它依然想追求坚挺的货币和财政预算平衡；另一方面，它的这种具有通货紧缩效应的政策会自觉不自觉地强加于欧元区其他国家，让别人难堪。

更要命的是，这时候的德国本来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退出欧盟，可是这样一来，德国马克必将会一路飙升，导致欧元直线下跌，从而因为货币快速升值大大削弱竞争力，其政治风险不可估量，所以它也有点不敢。

从索罗斯的这篇回顾文章中可以看出，索罗斯可谓旁观者清。他根据自己过去对全球政治经济时局的观察发现，当时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在到来。事后证明，他的这一判断非常正确，也由此在索罗斯身上造就了一系列神话故事，铸成了他投资事业的最高峰。

12

认定日本是金融危机源头

索罗斯之所以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很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全球化和
管理国家化之间的差异裂痕，使得他有空子可钻。而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在这
方面的擅长，并自信能够从中取得胜利。

亚洲金融危机过去 10 年后再次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暗含了“10 年一
次金融危机”的所谓“规律”。2007 年 6 月 22 日《第一财经日报》刊登沈
联涛的回顾文章认为，在这其中可以充分领略到索罗斯当年的炒作思路以
及亚洲金融危机之根源。可以说，正是因为索罗斯对亚洲金融危机根源的
很好把握，才使得他的炒作胜券在握。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沈联涛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负责香港储
备管理及外事工作，所以他的所见所闻极具真实性和权威性。

在他看来，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交叉影响事件，远远超出任何一个个
人和政府的控制范围。虽然它首先从泰国开始，逐步蔓延到整个东南亚，
甚至还波及到俄罗斯和巴西，超出了亚洲范围。它向全球揭示了这样一个
事实：虽然我们已经实行了经济全球化，可是对经济和管理仍然局
限在各国法律和本土文化水平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冲突；这种冲突
解决得不好，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宏观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尼古
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认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运行

存在着大约 60 年一个周期的规律，这些周期通常以蒸汽机发明、电力、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的发明等为标志。最近的一个周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恰好经历差不多 60 年的和平经济建设时期。对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1997 年正好是对亚洲经济奇迹进行全面检验，很可能出现新的经济运行周期的重要关键时刻。

1997 年 5 月，在泰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等联手干预下，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在对泰铢发动的第三次攻击中遭受了 3 亿美元的损失。5 月 24 日，亚洲各国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在泰国曼谷召开会议，共同会诊泰铢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下一步对冲基金会怎么做，泰铢是否还能逃过一劫？结果众所周知，就在一个多月后的 7 月 2 日凌晨四点半，泰国中央银行发表了泰铢汇率开始自由浮动的声明，标志着亚洲金融危机正式爆发。而就在当天，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竟然贬值了 15% 以上。

为什么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管理国家化之间的裂痕所导致的呢？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跷跷板关系，而这种跷跷板被索罗斯等人很好地利用了。

具体地说，因为索罗斯早就意识到泰国政府无法维持高估了的泰铢汇率，相反却看好日元有升值趋势，并且日本和泰国之间的关系是：日本是泰国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泰国 55% 的外债是日元。

所以对泰国来说，经济发展受日本这个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影响最大，当时日本一个国家的 GDP 就超过亚洲其他国家 GDP 总和，日本一个国家的金融资产超过亚洲其他国家金融资产总和的两倍。而对于索罗斯来说，要想打击泰铢则很容易从日元下手，通过日元套利外汇交易来攻击泰铢。

索罗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索罗斯最早攻击泰铢的时间是 1996 年 7 月，第二次攻击时间是 1997 年 2 月。而在当时，索罗斯等国际投机者就已经在暗中以不高于 3% 至 5% 的利息借入日元然后存入泰国，以获取 17% 的隔夜拆借利率，进行套利外汇交易了。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要知道，当时日本正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日本银行的利率 1996 年是 0.5%，1999 年是 0。也就是说，索罗斯这样的外国投资者完全有可能以 0 利率借到日元，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寻觅高回报投资机会。可以说，这是一种绝佳的套利外汇交易时机。

正因如此，索罗斯绝不会放过投机泰铢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亚洲各国的货币纷纷实行盯住美元政策，所以索罗斯在这种套汇交易中的回报率有可靠保证；并且同时，泰国需要引进外资，所以索罗斯的这种套汇交易也同样是受到泰国政府欢迎的。

不必说，索罗斯的这一动作当时不可能不引起业内警觉。

沈联涛回忆说，1996 年他在日本东京参加会议时，有位在日本大藏省就职的好友就问他，如果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到了 150：1，港元是否会放弃盯住美元政策？当时他听了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有意思，只是没有往引发亚洲金融危机这方面上去想。

日本实行零利率政策，迫使日元纷纷以银行贷款、债券投资、官方援助等形式大量外流，其中流入地最多的是与日本经济关系密切的亚洲国家，这为后来亚洲经济泡沫的形成和索罗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鼓励资本外流呢？说到底是为了防止国内发生通货紧缩，防止日元汇率的过度高估。明显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帮助国际投机者和国外企业“节省”利息支出。

从实际情况看，日本 1995 年 1 月 17 日发生了神户大地震，随后在 3 月 20 日至 4 月 19 日期间日元兑美元汇率达到 80：1 的峰值，然后开始贬值。

不用说，日元贬值会刺激出口，带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因为日元开始贬值了，所以日本国内银行就利用这一时机开始回收国外贷款。

由于日本国内对形势发展过于乐观，1997 年 4 月把增值税税率从原来的 3% 提高到 5%，一下子就把经济拖入严重衰退，并一直延续到 1999 年。

上面已经提到，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亚洲其他国家总和。所以日本经

济严重衰退必然会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时候这些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资产价格泡沫就无法继续膨胀，到了不得不破灭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些原来从日本流入的资金现在要撤走了，泡沫还不加速破灭吗？

这个规模有多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1996年到1999年间，日本银行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五个国家中收回474亿美元贷款，1995年到1999年间在东南亚地区共收回1925亿美元贷款（其中主要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日本银行的大量撤贷，使得这些亚洲国家发生了急剧信用紧缩，从而成为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线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索罗斯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是看准时机发动金融攻击，加速这些泡沫的破灭。

日本资金的撤走对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有多大？以下一组数据基本上可以说明问题：

1995年到1998年间，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贷款大约有2600亿美元之巨，而当时日本银行之间的目标利率与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之差大约为5%。也就是说，这些东南亚国家从日本借入的资金每年要付出的利差支出大约是130亿美元，三年就是390亿美元。再从汇兑收益方面看，在这三年中日元兑美元贬值了差不多一半，这就意味着这三年间日本从这2600亿美元的海外贷款中获得了差不多1300亿美元的汇兑收益。两者结合起来看，意味着这三年间日本从套利交易中获得了1690亿美元的好处。

日本从中获得的好处，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苦处。

经过以上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索罗斯巧妙地利用了日本在整个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牛鼻子”作用，借力打力，轻而易举地就引爆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做法表明，在他心目中，日本才是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他只不过是发现了这一秘密并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杠杆作用”而已。

13

地震来临前嗅觉特别灵

自然界许多动物都有天性，例如在地震来临前会有某些异常表现。民间传说“鳄鱼翻身就意味着地震来临”，这说明鳄鱼的嗅觉特别灵。

一个真实案例是，2002年3月31日下午，100多名游客正在我国台湾省的一处景点观看鳄鱼，突然分养在12个不同围栏里的1000多条鳄鱼不约而同地狂吼，声音之大犹如数百辆卡车同时发动，许多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导游故作轻松地说，说不定会有天灾地祸，并且还扮鬼脸说“很灵噢！”果然，十几分钟后就发生了一场7.5级的大地震。

索罗斯作为金融大鳄，在投资市场上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灵敏嗅觉。例如，索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看空美元，准备在这方面大干一场，为此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签署了“广场协议”，让索罗斯眼睛一亮，感觉找到了投资方向。

具体背景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财政赤字剧烈增加，贸易逆差大幅度增长。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它自然而然地就想到1971年曾经采用过的货币贬值手段，所以非常想通过美元汇率贬值来扭转上述不利局面。

环顾全球，当时经济发展最好的是日本。美国的一贯做法是不允许任何国家超越自己，包括自己的盟国，所以，看到日本与美国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美国千方百计想要给日本使个绊。

具体数据是：美国从 1980 年开始出现贸易逆差，仅仅到 1984 年贸易逆差就增加到 1600 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6%。正好这时候爆发了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于是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打个比方说，1980 年年初你把 100 元钱存入美国银行，到当年年末的实际收益率居然是负的 12.4%。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国实行了高利率政策，黑市利率高达 20%，这样就使得全球热钱纷纷涌入美国，促使美元汇率一路飙升，美元从 1979 年末到 1984 年末升值近 60%，而这又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

相反看看日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经济发展到了崩溃的边缘。1948 年 10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法案，通过稳定日元汇率来帮助日本实现财政预算平衡，日本经济才得到复苏。

接下来 1951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日本在 1950 年到 1960 年间出口到美国的军火高达 600 亿美元，大大拉动了日本经济复苏，经济年增长率每年都在 10% 以上，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

话说美国因为朝鲜战争从日本进口了这么多军火，怎样才能转嫁这种经济负担呢？很简单，那就是不断印发美元，促使美元贬值。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稀释各国尤其是日本的美元储备（1985 年时日本的外汇储备高达 279 亿美元），二是打击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因为在美国看来，当时的日本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日本产品在全球各国到处可见，当时在经济上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只有日本）。

所以这时候，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制造舆论，惊呼“日本时代到来了”，乍一听这好像是在赞美日本，其实是发出一种信号，提醒日本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了，美国接下来会给日本一点厉害看看；另一方面，美国在积极联络全球主要工业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探讨如何联合干预全球汇率市场，说穿了就是要这些国家帮助美国有序地贬值美元，从而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遏制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1985年9月，美国在纽约广场饭店摆了一桌“鸿门宴”，邀请上述五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开会，会后签订了一份“广场协议”。会上美国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把日本财政部长竹下登说得灰溜溜的，日本因为这时候看到自己的经济在发展，迫切希望能走上国际舞台，所以在1985年推出了《关于日元的国际化》等一系列政策，加快了日元走向国际化的步伐。

按照最初的设想，日本认为日元汇率上升10%就可以满足美国的要求了，所以日本财政部长在会上爽快表示，愿意协助美国采取措施降低美元汇率，并表示日元“可以贬值20%”。既然如此，美国也就不客气了，在协议中明确要求日元和马克大幅度升值，以帮助美国降低美元汇率。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国家开始大量抛售美元，结果带动全球投资者一起抛售美元，美元汇率大幅度走低。

而从日本方面看，由于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导致日元大幅度升值，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9月的1美元兑换250日元上升到12月的1美元兑换200日元，日元升值了20%。又过了一年，到1986年末，继续上升到1美元兑换152日元，1987年的最高点甚至高达1美元兑换120日元。

事实上，在广场协议签订的3年内，日元就升值了111%，而不是原来设想的10%至20%，这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索罗斯在干什么呢？早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索罗斯就意识到美国总统里根的“双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政策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因为归根到底，解决“双赤字”的主要途径是在国内压缩财政规模，而不是在国外调整汇率。

所以索罗斯认为，如果美国要想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发展，然后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只会使得美元贬值压力越来越大，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他把这种情形称为“里根大循环”。

这种大循环的结果主要是两种：一是通过提高税收，减少军费开支来压缩财政赤字，但这在美国显然做不到；二是促使美元贬值，但这种游戏也不好玩，有可能会引发美元货币体系崩盘。

处在这样的夹缝中，里根政府必定会想到另一条路，那就是以政治、军事、经济等综合手段来逼迫其他国家为美国买单。放眼全球，当时最有能力担任这一角色的非日本莫属。

不用说，后来的事情发展正如索罗斯所预料的那样丝毫不差。所以能看到，索罗斯在广场协议签订前后特别忙，主要是忙于卖空美元，买进日本日元、德国马克等待升值。

上面提到，1986年一年中美元兑日元汇率贬值了20%。这时候许多国际炒家见好就收、获利了结了，可是索罗斯认为这还远远没有到位，好戏还在后头呢，所以他依然按兵不动。

他的理由是，美元汇率只贬值这么一点，根本不会对美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带来多大帮助，所以一定还会继续贬值下去。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美元兑日元贬值了50%。

与此同时索罗斯还认为，这时候的美国股市存在着严重泡沫，并且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所以即使美元贬值也会对美国股市没什么好处，美国股市仍然有突然崩盘的危险。

这一观点正好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截然相反。因为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货币贬值是会对股市有促进作用的。

所以读者能看到，当时的美国政府和投资者都纷纷看好股市、积极买入，只有索罗斯在卖空美国股票，同时积极买入日元、马克。

就在索罗斯卖空股票后，美国股市虽然也回光返照了一段时间，让索罗斯造成了较大的账面损失，但最终还是于1987年出现了“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一天内空前绝后地猛跌22%，给索罗斯送上了一位对冲基金经理梦寐以求的荣誉和尊敬——索罗斯在1986年到1987年间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虽然也有几次投资失误，但因为投资方向完全正确，投资回报率竟然高达122%！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索罗斯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骄人业绩，并不是靠操纵市场（当时他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完全是依靠敏锐的判断力和冒险精神取得的，他具有大地震来临前鳄鱼般的灵敏嗅觉。

14

退而不休，半退半休

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来说，索罗斯想退休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毕竟他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并且事业已经达到顶峰，没有什么理由不停下脚步来歇一歇，过过悠闲的晚年生活。但与此同时，索罗斯的性格和追求又决定了他不可能像常人那样生活，否则他也就不是索罗斯了。

索罗斯的退休决定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 2000 年他 70 周岁时，第二次是最近的 2011 年 81 周岁时。他第一次退休被事实证明是退而不休、半退半休，这一次是否依然如此，读者可以拭目以待。

索罗斯第一次退休是在 2000 年。当时的背景是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很多人认为索罗斯作为“一个时代”就这样终结了，而他自己也感到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呼风唤雨。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2001 年 7 月至 2002 年 6 月的一年里，量子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只有 3%，而全球对冲基金资产平均投资回报率则高达 10%。

这颇让人觉得索罗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所以，就在量子基金首席交易员德鲁肯米勒离任之后，索罗斯干脆把量子基金更名为“捐赠基金”，从而转向为一个“投资不那么咄咄逼人的工具”。

索罗斯在 1999 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不想创造任何记录了。”面对另一家著名对冲基金老虎基金在当年的关闭，当时 70 虚岁的索罗斯经常喃喃自语地说自己“已经 70 岁了，不想再赌博了”。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但请注意，索罗斯只是更名，并没有关闭富可敌国的量子基金，并且在 2000 年 4 月已经宣布退休的情况下，仍然聘请外人来重组并打理量子基金，他自己则把主要精力用于哲学冥思和慈善事业。

不过，这种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随着索罗斯聘请的经理人一个个离去，尤其是索罗斯本来有意让儿子罗伯特继承事业的，可是罗伯特却明确表示自己无意子承父业，这让索罗斯感到量子基金离开自己还真的不行。与此同时，他自己又不能专心致志地从事慈善事业，于是在退居幕后两年多后不得不亲自管理投资基金，过一种“退居二线”、“垂帘听政”的生活。

索罗斯重出江湖，效果很快就呈现出来：2001 年量子基金在标准普尔指数下挫的宏观背景下，当年投资回报率高达 13.8%，是同行业平均水平的 3 倍以上。

所以，即使在索罗斯退居幕后这段时间里，熟悉他的人对他的评价依然是：“虽然他曾以高龄为由，表示不想再豪赌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仍一如既往尝试赚取更多的金钱。”

从上面量子基金在一年里的投资回报率只有 3%，而 2001 年却高达 13.8% 中容易看出，它在 2002 年上半年是亏损的。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基金公司高层频繁换人；另一方面是索罗斯不断“修正”投资策略，希望通过不断换人来找到比较保守和低风险投资策略的经营管理层，从而取得比较可靠的收入，为慈善活动出资。但这只是索罗斯的一厢情愿。

与投资决策中的“知错就改”原则一样，索罗斯在用人方面也是如此。当他通过两年实践，发现自己的这种想法行不通时，不得不在 2002 年调整策略，从原来的由外界经理管理资金模式改为由基金内部人士管理，并且由他亲自出面掌管 70 亿美元规模的量子基金和其他投资工具。

结果，量子基金 2002 年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12%，与当时不景气的美国股市行情相比，这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索罗斯这种本来想退休，可是退休之后又放心不下原来自己创下的那份家业的心态，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表露无遗。

2008 年末，他在公司办公室进行的两个小时的会谈中明确表示：“我不想看到我多年积累的财富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我回来了，建立了一个宏观账户，用以抵抗我所认为的公司风险敞口。”他说，他在退休的这些年中由于不再参与量子基金投资，所以对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像以前那样清楚，既不负责选择股票，又不熟悉最近发明的一些宏观金融工具。

但显而易见，索罗斯在这里是谦虚了。这只能表明他不再从事具体投资业务，或者说，与过去相比具体业务量减少了，但他的影响力依然还在。2007 年量子基金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32%，在全球同行中排名第二，不能不说与他的最终掌舵分不开。

2010 年 11 月 8 日，索罗斯基金香港办事处正式开张，索罗斯的二儿子、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副主席乔纳森·索罗斯主持开业仪式，索罗斯本人并没有到场。

担任香港办事处总裁的乔纳森·索罗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而在此以前，索罗斯的大儿子罗伯特·索罗斯已经去我国重庆“探过路”，准备在重庆设立办事处，好好地大干一场。

顺便插一句，或许是为索罗斯基金香港办事处的开张造势，2010 年 11 月 11 日索罗斯基金公开在香港股市上买卖 A 股，从而引发全球一系列股市相继大跌。从 2011 年全球中国概念股的被操控看，这确实标志着索罗斯在做空中国。遗憾的是，当时我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言归正传。因为是索罗斯的儿子，所以罗伯特和乔纳森从小就深受索罗斯的熏陶，索罗斯对这两个儿子也一直寄予厚望，尤其是大儿子罗伯特，索罗斯非常希望他能出面掌舵公司，毕竟自己已是 80 高龄了。

但从现在的情形看，索罗斯的这两个儿子并不怎么热衷于担任这样的重任。虽然罗伯特在同事心目中拥有很高声望，被认为同样具有索罗斯那

种精准判断市场波动的能力，但罗伯特一直表示自己不愿意接管整个公司，而是更希望能专心致志地做好投资事务。

但血缘关系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何况罗伯特和乔纳森这两个儿子本身并非平庸之辈。所以从2004年开始，索罗斯一点一滴地把权力交给他们，为最终交班做准备。无疑，这也会改变两个儿子的想法。

2011年7月26日，索罗斯基金正式对外宣布该基金管理公司将关闭一切投资委托，从而改组为专门为个人和家族服务的家族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给索罗斯基金投资人的信，正是由罗伯特和乔纳森以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副主席身份联名发表的，这被看做是索罗斯即将告退、两个儿子正式出山的标志。罗伯特和乔纳森表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在父亲的公司里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公开信全文如下：

我们写这封信是为了通知你们，不久前美国证监会(SEC)公布了基金监管方面的一个重大调整。也许你们已经知道，新的监管规定要求某些私人投资顾问必须在2012年3月以前向SEC注册。如果一个投资机构作为一个家族组织运作，它就无需遵守这方面的规定。

2000年以来，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实际上已作为一个家族机构在进行运作，当时乔治·索罗斯先生宣布对投资重点进行调整，量子基金将改名为量子捐赠基金。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可享受监管方面的豁免，这使得外部股东的利益可与家族投资者保持一致并继续向量子基金投资。依照新的监管规定，这些豁免条款已不再适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完成转型为家族机构的交易，虽然11年前它已经开始这样运作。

这一新情况所产生的一个不幸后果是，依据新监管规定的定义，我们不能再为家族客户之外的任何人管理资产。因此，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将要求量子基金董事会将相对少量的不合规定的资本在监管规定生效前返还

给外部投资者，而新规定很有可能将在今年底生效。未来几个月中，你们将收到资本返还的操作细节，但我们必须建议你们尽快采取行动，这样你们才好做出相应的规划。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将继续致力于达成为客户带来超级回报的目标，将继续以业界的最高标准来进行商业运作。但是，未来我们的投资建议只能服务于索罗斯家族的账户和相关实体。

我们还要遗憾地通知大家，除了公司不再服务于外部投资者外，安德森 (Keith Anderson) 先生已决定离开公司，寻求个人其他的发展机会。2008 年初他以首席投资官的身份加盟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领导公司度过了金融危机及危机后的复苏期。我们非常感谢他对公司成功所做的贡献。他离开时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具有活力和强大的投资机构。

对于过去近 40 年中选择将资本投向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客户，我们要表达深深的感谢。我们相信，时间已告诉你们，你们的决定得到了出色回报。

从这封信中容易看出，量子基金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原因在于 2010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对冲基金等高风险投资机构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

根据这项法案规定，凡是管理资产在 1.5 亿美元或者有 15 个客户以上的基金管理公司，都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并公布有关投资者和职员的信息、管理资产规模、财务状况、业务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基金顾问服务等内容；同时，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定期检查。

根据要求，所有对冲基金管理机构都必须在 2012 年 3 月前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完成注册登记，不进行注册登记的基金公司只能管理家族资产。

就好比说，量子基金本来是一家私营企业，一切由老板说了算；而现

在根据法案规定，因为它拥有外部投资者，所以必须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来进行规范管理，这样就会对今后量子基金的运作带来诸多不便。

既然如此，索罗斯认为，还是退出这些外部投资者、重新恢复为家族企业为好。这样一来，也就不需要“夹着尾巴”做事了，这很不符合索罗斯的投资个性。

法案出台后，索罗斯就多次发出暗示，认为这种监管上的繁文缛节只能促使他下定决心不再为外部人员运作资金。

而这一观点也得到索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狙击英镑时，因为协助索罗斯而名声大噪的对冲基金经理德鲁肯米勒、投资家伊坎的赞同，他们一致认为，量子基金作为一个家族机构运行会更好。

正因如此，量子基金副主席，也就是索罗斯的两个儿子罗伯特·索罗斯、乔纳森·索罗斯在给投资者的这封信中表示，量子基金对外部投资者关闭后，会在 2011 年底以前向外部投资者返回总额大约 10 亿美元的资金，然后由他们继续管理家族资产。

应该说，由于量子基金从 2000 年开始实际上就主要是以管理家族资产为主，并且不再接受新的外部客户了，所以，这一转变对量子基金来说不会带来什么大的改变；更何况，这 10 亿美元资金对于 2011 年资金规模高达 255 亿美元的量子基金来说，比例只占 4%，实在是小菜一碟，根本不会动摇量子基金的原有根基。

而实际上，美国监管规则的变动，也只是索罗斯退出的一个借口。量子基金在过去 40 年里的平均回报率高达 20%，超过巴菲特的同期投资业绩，可是 2011 年上半年却非常糟糕。由于市场环境恶劣，量子基金投资趋于保守，2011 年上半年竟然亏损了 6%。为了避免进一步亏损，量子基金不得不大量持有现金，现金比重一度高达 75%。

附带说一句，当时索罗斯持有大量现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做空中国概念股，这从现在的眼光看已经可以得到证实。做空股市是他的一

贯操作手法。

不过，从索罗斯当时的具体情况看，借机退出外部客户还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外部客户虽然能起到“泰山不择土壤”的作用，可是，对于索罗斯基金来说作用并不大。索罗斯基金主要是自有资金，外部资金比重很小，可谓是“有它不多、无它不少”，所以索罗斯对此也就不是很在乎。

相反，外部客户也不是好惹的主。一方面，有了外部客户，他们就会要求定期收到信件和电话，以便能随时了解基金经营管理动态，这会增加索罗斯的麻烦，尤其是在信息公开方面必须符合相关监管规定，这样就暴露了索罗斯的行动轨迹；另一方面，当市场不景气、投资业绩不佳时，这些外部客户随时都有可能逃离，眼睁睁地看着你走投无路。

并且从道理上说，任何企业和个人投资行为都会符合以下两条“规律”——当资金规模不大时，会首先选择独立操作，因为这种规模小的基金主要依靠投资收益而不是管理费就能生存得很好，操作灵活性强，更容易赚钱；当资金规模很大时，会首先选择吸收外部客户，赚取管理费；当规模不大不小时，则会随时具有合并与被合并的可能。

从索罗斯基金的情况看，当投资机会减少时，外部资金的危害要大于好处。正如 2010 年归还外部投资者资金的德鲁肯米勒所说，当时该基金有超过 100 亿美元的外部资金，这限制了基金所得回报，就是这个道理。

附带一提的是，2011 年初《福布斯》杂志估计索罗斯的身价为 145 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中排名第 46 位。而从量子基金 255 亿美元规模中只有 10 亿美元来自外部投资者看，索罗斯的身价应该远远高出 145 亿美元。也就是说，《福布斯》杂志对索罗斯的估价是很保守的，同时也表明，索罗斯基金改为家族企业后，它的操作手法的杀伤力不会有丝毫削弱。

一般认为，索罗斯对外部投资者关闭量子基金，绝不是他正式退休的标志，即使他对外宣布退休，也会是隐而不退。这只是他的一种策略。

因为就在这封公开信由索罗斯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乔纳森以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副主席的身份宣布，许多人把它看做是索罗斯即将把大权交给两个儿子，自己退出江湖的标志，有媒体就此向索罗斯求证时，索罗斯并没有做出明确回答。这就更让人怀疑索罗斯是否真的想退休了。

对于索罗斯来说，把量子基金转为个人和家族企业，一方面可以逃避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相关操作的条文；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索罗斯的直觉经常出错，也是促使他萌发退居二线的因素之一。

2010年量子基金获利率只有2.5%，2011年上半年更是亏损6%，在这18个月中索罗斯旗下三分之一与能源有关的股票投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这使得一直非常自信的索罗斯也感觉自己“老了”，需要“休息”了。

不过，现在看来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假象。正如美国媒体一致认为的那样，对于索罗斯来说，把量子基金转变为纯粹的家族企业，显然对索罗斯更有利。这种有利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从此再也不用为如何公开投资细节烦恼了。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从此以后量子基金将不再需要接受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量子机构的运作策略和过程将会变得更神秘。

对此，只要看看索罗斯宣布退休时量子基金高达75%的现金比例就可以相信，这只是索罗斯的暂时封笔，一旦时机到来索罗斯又找到“手感”时，必定会再次出山重干一番。这才符合索罗斯的秉性。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美国经济的复苏趋势并不乐观，债务违约风险依然严重，这并不是索罗斯认为的那种最佳投资时机，所以他一直在逐步减少投资规模。2011年7月，量子基金的投资仓位只有25%，现金比重高达75%，就是与2011年上半年量子基金亏损6%的黯淡业绩吻合的。

75%即190亿美元规模的现金放在那里干什么？索罗斯实际上是在等待他所认为的那种最佳投资良机——做空中国——的出现。

2011年4月，索罗斯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虽

然当时全球市场没有直接崩盘的危險，但却比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更加令人费解，更加难以捉摸。

这表明，索罗斯当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同样感到迷茫。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现金放在手里比较稳妥，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现金为王”；同时宣布自己退休，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毕竟，对于一个 80 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也是他的应有权力。

15

未来看好中国市场

索罗斯攻击各国货币的前提之一，就是该国金融体系是开放的。因为只有开放的金融体系才能让索罗斯进出自由，从而通过攻击一国货币达到转移财富的目标。但这又不是绝对的。

以我国为例，亚洲金融风暴时期我国大陆的金融体系同样相当封闭，所以索罗斯等国际对冲基金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攻击人民币。因为人民币的篱笆墙扎得紧，对冲基金无法大规模进入，更无法自由撤退。也正因如此，人民币在这场灾难中幸免于难。

现在10多年过去了，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有所扩大，但幅度仍然有限，尤其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是国际对冲基金无法大规模进入我国的主要障碍，但这也并非就表明索罗斯等人不可能发起对人民币的攻击。并且有种种迹象表明，索罗斯未来更看好中国市场，说他是虎视眈眈也不为过。

因为归根到底，国际对冲基金从正面攻击人民币不行，但迂回曲折的路径还是有的。例如，有实力的国际炒家仍然可以通过投机机构长期进行资金潜伏，化整为零地进入中国大陆，伺机以待。

具体地说是，目前我国外向型经济比重过高，于是国际投机资金就一定会利用各种外资渠道进入我国，在我国国内进行套利。即避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审查，以美元进入我国大陆，然后换成人民币，再把人民币投向房地产市场等高风险、高获利行业。

等到我国房地产价格炒到奇高后逢高出货，这些投机资金持有者手中就拥有了巨额获利。而这时候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是不断升值的，这些获利资金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及时换回美元，在赚取投资收益的同时，又赚一笔丰厚的汇兑收益，可谓是两头赚钱，两头不耽误。

换个角度看，为什么我国百姓望着节节升高的楼价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买不起住房呢？说到底也是因为这些国际投机资金持有者提前透支了购房者的未来财富，把房价炒到天上去，提前把中间的利润抽走了！

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 3.2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是这绝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因为这充分说明，全球国际投机资金已经全面以美元方式进入我国大陆并换成了人民币，一方面通过各种资产组合工具（如上所述的房地产投资）获取套利暴利，另一方面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人民币升值获取汇兑收益。

这时候倒霉的是谁？当然就是手中拥有美元的一方了，具体地说就是我国政府。虽然这些美元并没有减少，但其购买力已经比过去大大降低，同时，这些美元储备虽然是“国家”的，但说到底其损失是全国人民的。

例如，早在 2010 年 2 月 3 日索罗斯在香港大学访问期间，市场就有传言说，索罗斯基金在当年一月份就开始了秘密建仓，主要对象包括汇丰控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兴通讯、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银行、中国太平、中海发展等 10 只股票，令人诡异的是，在消息传出的当天，这 10 只股票全线上涨。当有人就此向索罗斯求证时，索罗斯轻描淡写地说：

当我发现泡沫的时候，我往往会买进，泡沫并非是无理性的。在泡沫发端的时候参与进去是明智的。当我认为泡沫已经成熟了以后，我就卖出。对吧？我甚至会做空。然而在大盘走势改变以前我尽量不去做空。因为如果你想抢占最高点的先机，做空会令你非常的痛苦。如今通过做空来赚钱

还是可能的。然而，即便在股市暴跌的时候，它依然能够重生。例如当IT泡沫破灭、股价暴跌的时候我做空了，此后IT股迎来了第二春。因此总结来说就是，应对股市没有一成不变的秘诀。

索罗斯如此这般的描述，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证实读者的提问，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问题，并且还进一步加重了市场对中国资产泡沫化的担忧。不用说，这是香港股票和内地A股向下调整的压力来源之一。人们会想：既然索罗斯是这样认为的，这市场发展前景就是令人担忧的。

要知道，全球几乎一致认为索罗斯的投资是投机，这种投机的主要秘诀在于进出股市的时机选择上。归根到底，投资股票最重要的是选股，挖掘价值大大被低估了的股票然后买入，一路持有；而投机股票最重要的是选时，即在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抛出，至于这只股票的质地好坏并不是很重要，关键要看能给你带来多大的炒作空间和投机获利。

容易看出，投机与投资相比，方式和手段更多、风险也更大。例如在市场低迷时，投机者同样可以买入股票作为投资，但他们更习惯于用低杠杆率分散买入股票，而当市场被高估时，他们则会通过提高杠杆率的办法来加大沽空力度。

对于这一点，从索罗斯分散买入10只中资股票的行动看（如果索罗斯确实在这样做），他采取的是一种“试探性”投机。或许在他看来，香港股市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资本市场最密切的纽带，既然是全球对冲基金的心仪对象，那么他也就应该毫无例外地积极参与其中。

明白了这一点就容易看出，为什么索罗斯称“投资是出差错的投机”了^①。意思是说，像他这样的国际投资商的一切投资行为，本质上看都是为了“投机”；只有当“投机”发生失误时才会被迫变为“投资”。这听起

① 索罗斯：金融炼金术[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358。

来和我国股民戏称的“炒股炒成股东”是一个意思。

想当年索罗斯第一次来中国，是 2001 年 9 月 12 日在北京国际饭店应邀参加中国外交学会主办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 3 年，索罗斯在中国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在这个论坛上，他用 15 分钟作了名为“21 世纪的全球资本市场和中国的作用”的演讲，算是第一次在中国人面前亮相。

接下来，索罗斯就在原来投资海南航空公司的基础上，追加投资在海南航空公司基础上组建的大新华航空公司，并对来中国投资抱有浓郁兴趣。2005 年 10 月索罗斯表示：

以前我对中国市场只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现在要走进来，寻找投资机会，探索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我的投资属于专业投资，下一步，我要研究如何真正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话音刚落，2006 年索罗斯与中国品牌奇瑞汽车结盟的消息就不胫而走。消息称，索罗斯准备通过他的基金公司投资 2.25 亿美元到奇瑞汽车的美方合作方美国梦幻汽车公司，力挺奇瑞汽车早日进入美国市场。

对此，中国汽车界颇有些感到忧心忡忡，认为索罗斯的这次投资很不负责任，对于奇瑞汽车来说也面临着较大风险。因为索罗斯手上拥有几百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这对任何一个企业哪怕是任何一个行业的冲击都是不容小看的。而现在他仅仅拿出 2 亿多美元来，很可能只是一种试探，并不是看中该公司的投资业绩；或者说，并不表明该公司值得索罗斯投资。

之所以这样说，是与此同时在 2005 年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知爱行”的年度报告看到，当年索罗斯基金会向该组织一共捐赠了 23.6 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 200 万元），是连续第三年对该组织的资金支持。

索罗斯基金会直接与该组织合作，对资金使用并没有要求，也不参与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该组织运作，因而被认为是具有“突出的政治色彩”。

据索罗斯基金会总裁办公室介绍，2005 年它们统一拨给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和相关机构的捐赠数额在 200 万美元左右，主要用于支持法律援助、公共利益诉讼、环境保护、艾滋病防治等。

需要指出的是，索罗斯基金会和索罗斯基金并不是同一概念。索罗斯基金是一个投资项目，主要从事运营和投资，这样的基金组织索罗斯有好几个；而索罗斯基金会也叫“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全球拥有 50 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 1000 人。也就是说，索罗斯基金会主要是索罗斯致力于“推动成立开放社会”的民间组织，从索罗斯基金那里得到资金来源，然后投入索罗斯所关心的一切地区和领域。

而在此之前，索罗斯基金会在 1986 年初就仿照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向我国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资助改革和开放研究活动，每年出资不少于 100 万美元。到 1989 年停止这项运作为止，共向我国相关机构提供了 250 万美元捐款。当时，索罗斯也曾经有过在我国筹建索罗斯基金会中国分部的设想。

索罗斯对“知爱行”的资助是悄然进行的，甚至没有出现在索罗斯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这显示了索罗斯一贯的谨慎和低调。而实际上，索罗斯除此以外还在通过其他境外组织对我国国内进行捐款。

比如，2005 年索罗斯旗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给一家名为“国际公平桥梁”的组织提供了 45 万美元资助，支持它在我国开展刑事辩护方面的培训；给一个名叫“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组织提供 37.5 万美元资助，支持它在我国开展倡导公众参与的环保项目。此外，在公共健康、改善吸毒者治疗方法方面的研究等领域，也有合作和关注。索罗斯基金会总部明确表示，将在适当时候在中国设立分部，“为广大的中国人服务”。

但显而易见，由于索罗斯基金会每年高达四五亿美元的花费中相当一部分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说穿了就是输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所

以遭到许多国家抵制，如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

就索罗斯与我国奇瑞汽车结盟这件事情来说，奇瑞汽车最初是想通过合作方美国梦幻汽车的渠道快速进入美国市场，结果双方合作并不愉快，很快就闹起纠纷，并且于 2008 年 7 月 22 日被美国梦幻汽车公司声称要告上法庭，向奇瑞汽车索赔 11 亿美元的“潜在利润损失”。

虽然奇瑞汽车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但从中看出索罗斯的投资眼光显然还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在我国大大小小的汽车品牌中，只有奇瑞汽车是血统纯正的民族品牌，具有自主研发的发动机及相应知识产权。如果是其他混血儿品牌，索罗斯又何必投资中国？因为在这些国内品牌汽车中，最核心的发动机几乎全都是进口的，根本不值得索罗斯投资。

索罗斯看好未来中国市场，除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可能嗅出了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些规则漏洞，这也不必回避。

2001 年 9 月 10 日，索罗斯在北京举行的“21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不断发现世界众多规则中的缺陷，找到了就利用它来赚钱。记者问，如果你在中国也发现有这样的缺陷，觉得可以挣钱，会不会因为交情而不冲击中国市场？

索罗斯直言不讳地说，我可能会先警告你们，然后还是要赚钱的。因为如果你市场开放并且有许多弱点，金融市场上就会有很多条“鳄鱼”，意思是不止他一条。他说：

我现在这样说，好让你们有时间为此做准备。所以你们需要改革金融体制，而且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中国的金融体制需要开放。而且我认为中国在对外开放前，应该有一个内部的开放。这就是我认为“开放社会”的概念目前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原因。

附带一提的是，索罗斯这里所说的“警告”不一定是语言，更可能是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行动。而事实上，在此以后他已经对中国采取了几次动作，这是不是属于他说的“警告”范畴，就用不着他进一步阐述了。

索罗斯 2009 年 6 月访问中国时，我国记者试探地问他是否有兴趣增加在中国的投资。索罗斯回答说，这主要看机会。他说，中国的投资限制比较多，所以他在操作过程中会有难度，但他“肯定会寻找恰当的时机”。

这话说得有水平。一方面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下一步设想，可是又没有把话说死；另一方面，索罗斯当然知道自己在全球投资界的影响力，如果他把话说得过于明确，必定会引发全球市场做出相应反应，这样他下一步的布局和炒作有可能会被动。所以他只能这样模棱两可地说。

2009 年 10 月 30 日，索罗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科学院演讲时，发表了从长期来看中国将成为金融危机最大赢家的观点。而在此之前，市场已经传出索罗斯大手笔认购龙湖地产的消息。事实上，索罗斯一直都在密切关注中国资产，只不过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他一时还无法大规模投资而已。

从过去的一贯立场看，索罗斯对中国应当说是很友好的，虽然许多中国人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索罗斯的“帮忙”，中国才能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躲过一劫。

此话怎讲呢？众所周知，这场金融风暴对全球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美国处于这场噩梦的中心，中国所受到的影响最小。究其原因，还得追溯到 10 年以前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索罗斯提前给中国打了一针“预防针”，或许这也是他上面所说的这种“警告”吧。

当时是 1997 年 7 月，索罗斯在完成了以泰国为源头的东南亚金融市场攻击后，开始乘胜追击，对香港发动攻击。而当时的香港刚刚回归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政府都会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其前提条件当然首先是保持港币稳定。所以这就注定了索罗斯对港币发动攻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自量力的。

当索罗斯大量抛售港元及沽空港股期货后，怎么也抵挡不住香港特区政府动用 1200 亿港元外汇储备的围剿，隔夜拆息一度抽高至 300 厘，迫使索罗斯 8 月底期指结算时只能高价平仓，乖乖地亏损了结离场。

而索罗斯这次发动对港元的攻击，从香港和中国内地方面来看实际上不完全是坏事，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至少可以提醒我国在哪些金融政策方面还需要改进和完善，哪些政策需要调整。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正是经过了这次攻击，中国政府“吃一堑，长一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抵御十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免疫力。正如《环球时报》评论员文章所说的那样：

金融怪才犹太人索罗斯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了任何金融理论家。他的职业合法性使中国从《刑法》中剔除了金融“投机倒把”，还使许多中国文科状元扎堆报考“经济与金融”专业。他的钱比联合国中 42 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他的话有时和美联储主席一样重要。尽管 1997 年在香港股市投机中没有得手，但他始终在找寻狙击人民币的机会。中国以举国之力对付索罗斯，虽然没有给他可乘之机，但中国金融、币值、资本市场的改革被迫滞后。不过歪打正着的是，他让中国在 2008 年金融风暴中躲过了一劫。

也就是说，正是索罗斯对港币的这一击，使得我国政府对已经处于准备之中的金融改革，有了更加理性和清醒的认识；虽然这并不是索罗斯的本意，但客观上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也正因如此，索罗斯被《环球时报》评为“影响新中国的 60 位外国人”之一，他由此给予中国的思考是很多很多的。

从这个角度看，幸亏亚洲金融风暴对我国的损失不大，否则我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不敢想象。正如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

所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并不具备发动和应对国际金融战的足够人才。言外之意是说，一旦金融战爆发，我们只有挨打的份。

那么，索罗斯未来看好中国，他会怎么做呢？2009年6月11日索罗斯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我正在思考世界经济的未来，所以我到中国来寻找答案。”索罗斯会寻找什么答案呢？一向神秘的他当然不会轻易透露他看好我国的哪个行业、哪个企业，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人所作的分析。

美国国际智能资源公司法明戴尔分公司总裁大卫·黑尔、美国 Guzov Ofsink 律师事务所共同创始人达伦·奥弗辛克认为，从索罗斯持有海南航空公司股票 10 多年的长期投资历史看，中国航空业可能就是他的投资目标，这是无须多说的。大卫·黑尔的理由是：“索罗斯在投资战略和战术上做足了功课，航空产业伴随着中国中产阶级数量的剧增而高速发展，这项投资很成功。”

但也有人认为，因为索罗斯曾经投资过我国的科技板块、金融服务板块、医疗板块、航空板块，并且这些板块的经济增长都非常快，给了索罗斯很好的投资回报，所以这些或许都是以后索罗斯最感兴趣的领域。而索罗斯自己则曾经说过：

我对投资中国比投资其他国家更感兴趣，我特别对私人股权感兴趣，因为中国总的投资前景很好，许多实业里面会发生很多兼并。中国企业会发生很多兼并和资产重组，有更多的盈利空间，这样我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综合以上分析或许可以看出，索罗斯最看好的可能还是以上这些领域的股权投资，因为这更符合索罗斯的投资个性和对冲基金的操作手法，而不是具体的个股买卖。

对此，香港英皇证券资料研究部副总裁林建华 2010 年 5 月对《南方都市报》记者分析时也认为，索罗斯这样的级别不可能直接买卖 A 股，而

是会采取另外两种方式进入 A 股市场。

具体地说是，索罗斯基金的性质属于对冲基金，既可以买 A 股也可以沽空期货指数。他选择在中国内地开通股指期货指数之际进入香港，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进入期货指数炒作，这非常符合对冲基金的操作手法，即在短期内大量沽空期货指数。只有这样，对冲基金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如果索罗斯要直接投资 A 股，当然也可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 QDII 额度，或者向有额度的外资券商借用额度来直接进入，但更可能会通过内地基金买卖，这也是合理合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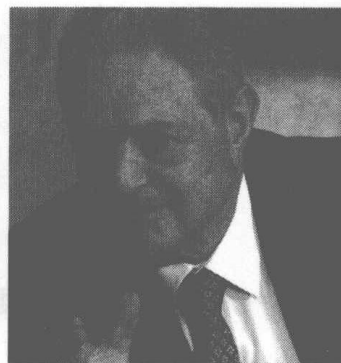
从过去的操作手法看，索罗斯喜欢一边大量买进一边沽空，等到外界察觉到他的蛛丝马迹后，很可能他已经把钱赚到手了。就好比说，当你觉得有蚊子在叮你时，它已经吸了一口血扬长而去了。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他当年攻击英镑还是港元，虽然外界都知道他在大肆做空，但除了他的手下以外，外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察觉，等到发现时他已经数钱走人了。

这就是索罗斯，神出鬼没的索罗斯。

那么，怎样来判断索罗斯有没有参与 A 股炒作，以及在什么点位做空 A 股呢？一般来说，对冲基金在做空股市时的点位都不高，但动作很快。如果真的是对冲基金沽空 A 股的话，之后对冲基金的子弹打完了股市很快就会有反弹。只有到这时候，才能回过头来加以评论。

索罗斯的第二板斧

全力做空股市



George Soros

索罗斯的第二板斧，在于全力做空市场。他最擅长唱空和做空，通过制造市场恐慌，引发大量抛盘涌出合力砸盘，他则在一旁“没事偷着乐”。索罗斯曾经在一个月內就沽空 70 亿美元英镑，净赚 15 亿美元，这样的杀伤力和获利可谓举世无双。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

市场投机并不违法

有市场存在，就必定有投资和投机存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投资和投机并没有贵贱之分，并且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只要这种投资或投机不违法，便可予以承认和肯定。与其说谴责投机，不如谴责市场监管体系不健全，让人有机可乘。至少在索罗斯看来是这样。

20 世纪 80 年代，泰国泰铢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保持相对固定，1 美元大约兑换 24 泰铢。而当时美国和泰国的经济发展都很不错（可不要忘了当时的泰国可是亚洲经济发展“四小龙”之一），所以这种固定汇率比较适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尤其是到了 90 年代中期后，泰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而美国经济发展则相对稳定，这时候两种货币之间虽然依然保持汇率稳定，但已经呈现出某种不协调。这一蛛丝马迹，被索罗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觉得自己施展拳脚的时候就快要到了。

就好比说，有两个人在路上跑步，腿长的人跑慢一点，腿短的人跑快一点，两人之间基本上还能保持着相同的速度、相对的距离。可是这时候索罗斯已经看出来了，腿短的人正在拼命用劲，大有落后之势，只要有机会对他轻轻地使一下绊，就可以从他身上揩到油。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泰铢。

换句话说就是，这时候泰铢虽然和美元之间保持着固定汇率，但它的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价值明显被高估了。只要在泰铢汇率还没有贬值之前通过各种渠道拥有泰铢，然后等待时机对它施展拳脚，泰铢的这种高汇率就无法继续下去。从这种汇率猛跌中，索罗斯等国际游资必定可以大捞一笔。

事实正是如此。等到索罗斯完成了对泰铢的大量囤积后，就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说，发动媒体进行宣传攻击，使得拥有泰铢的人们纷纷动摇信心，在市场上开始抛售泰铢，致使泰铢汇率不断下跌。

泰铢汇率市场的不稳定，迫使泰国政府出面拼命施救。资料表明，当时泰国政府在市场用于买入泰铢的外汇储备高达 250 亿美元左右，可是依然无法维持泰铢稳定，最后只好放弃努力，使得泰铢与美元的汇率一下子就贬值到 1：40。

而这时候的索罗斯认为泰铢的价格已到底部，所以赶紧抛售美元买入泰铢，用最低廉的价格买入泰铢归还原来借入的泰铢。从这两种货币汇率的跷跷板中，索罗斯大获其利。

当后来人们纷纷指责他引爆了亚洲金融危机时，索罗斯显得很委屈。他说，指责别人永远都是那么简单，可是又有谁知道，他的布局实际上早在六个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并没有违反所有游戏规则。

他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投资市场的“守法经营户”，只不过看到了市场的扭曲从而给了政府一个教训而已。他形容说：“家里被偷只能怪你家里的大门没有关好！”

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索罗斯被人骂得要死。其中最气急败坏的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他厉声指责索罗斯暗中操纵东南亚金融危机，从而导致马来西亚货币贬值。他说：“我们花了 40 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着很多钱的白痴（指索罗斯）一下子给搞垮了。”

而索罗斯根本就不买账，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错，所以也就谈不上承认错误了。索罗斯反击说，是“马哈蒂尔政府管理不当”酿成了马来西亚陷入东南亚经济危机。

想想也是，你号称花费 40 年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经济体系，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呢？你为什么不从中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呢？

后来，当法庭宣布了对索罗斯的判决后，马哈蒂尔才感到自己出了一口恶气。他说：“这一判决表明他道德品质低劣，我感到很高兴……他以前诬陷我的政府管理不善造成了金融危机，其实他才是世界经济的大蛀虫。”

除了马哈蒂尔以外，亚洲其他国家及其政府领导人也对索罗斯恨得要命，纷纷指责索罗斯的金融投机活动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不过马哈蒂尔要想追究索罗斯“恶意”投机的法律责任，就成了一则笑谈。

因为如果真的要这样做，你怎么来认定索罗斯的投机行为是“恶意”的呢？“恶意”不“恶意”由谁来认定呢？难道除了“恶意”的投机以外还有“善意”的投机吗？又有谁能将索罗斯“绳之以法”呢？这些问题永远都没有结果。

平心而论，与其用这种方式发泄愤怒，不如实实在在地反问自己：为什么索罗斯会瞄准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和证券市场投机并取得成功？

按理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证券市场，有交易就必然会有投机，因为投机是活跃交易的润滑剂。市场交易中存在着大量机会，有机会就必然会有人去投机，要认定这种投机是“恶意”还是“善意”永远扯不清；更重要的，倒是从法律角度扎紧篱笆墙，不让别人有可乘之机。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要想拒绝苍蝇叮咬，首先要从自身做起。怨天尤人可以聊以自慰，却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正因如此，索罗斯面对指责总是心平气和地摆出一副哲学家的姿态说：

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我只能一而再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金融市场天生就不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金流动皆是有荣有枯，有多头也有空头。市场哪里乱哪里就可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以赚到钱。辨识混乱，你就可能致富；越乱的局面，越是胆大心细的投资者有所表现的时候。

在这里，索罗斯所说的“投机空间”是指什么呢？法国储蓄及信托银行经济学家法迪勒·拉库阿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就是指“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的工业投资过多、房地产危机、进口增加、经济增长放慢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国家的货币要以某种方式与美元挂钩，一旦货币市值高估无法反映其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经常项目收支，投机空间就出现了。

上述各种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缺一不可。比如，当时的港元汇率也是与美元挂钩的，可是在索罗斯的冲击下只是摇晃了几下并没有被击倒，相反最终还打垮了索罗斯，原因就在于香港的经济状况良好，香港的金融体系比其他东南亚各国和地区更健全、更自律，香港发行港元现钞有充足的美元储备作为保证，并且当时香港的经济正发展正处于回升阶段。面对这种“无缝的蛋”，就是“苍蝇”叮几下也不会使得经济质量变质。

针对有人总喜欢用道德标准来评价索罗斯对英镑、泰铢、港元等的攻击，索罗斯解释说：

实际上我绝没什么错。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我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我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的。如果市场禁止投机，我也不会投机；如果市场允许投机，那我就会投机。所以我实际上是参与者，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我的行动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这里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

索罗斯说得很对，市场投资或称市场投机，并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问题，只有对和错。如果他违反了游戏规则，那就是他做错了，而现在是他

并没有违反市场规则，所以他并没有错。

至于他遵从市场规则有时候会出现惊人结果，这并不是他的责任，而是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的责任。事实上，他同样非常关注游戏规则是否完善正确，因为这涉及市场是否会运作良好的问题。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他当然很关心市场能否健康发展了。

索罗斯一贯喜欢唱空和做空股市，很少例外。这例外中有一例就出现在他 2009 年 6 月访问中国时对中国经济的高调唱多，这甚至引起全球的过多关注甚至警惕，不知道索罗斯在这其中究竟卖什么药。

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钢在采访结束后深有感触地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索罗斯对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没有任何负罪感，也丝毫没有感到过后悔。因为索罗斯认为，他并没有触犯法律，所以真正要负责任的应该是政府监管部门，不是他。

芮成钢由此进一步阐述说，我国的资本市场亟待建立和完善监管机制，这样才不至于总是担心“索罗斯来了”。因为在资本市场里确实很难讨论道德自律标准，这是逐利的资本本性所决定的；真正重要的是只要有了成熟的市场监管机制，就不用担心索罗斯们对中国市场的覬覦之心。

总体来看，索罗斯在进行市场投机时分为以下四步：

一是偏见决定价格

索罗斯认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完全是由投资者的偏见造成的。这种偏见不仅仅作用于股票价格，而且还会影响到所谓的基本面，从而进一步影响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影响价格波动，引发“盛衰”现象。

所以，索罗斯非常注重从投资者的偏见中寻找投资机会。他甚至认为，投资获利的关键就是要研究其他投资者的偏见及市场预期，从中寻找股票价格的运动方向和规律，而不仅仅是多数人所认为的那种基本面。

在他看来，股市的基本面只是影响股票价格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重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要因素，而这也被当做是索罗斯认为现行股票价格机制的缺陷所在。

二是保持低调

索罗斯历来是个低调的人，这种低调对保护自己发挥了应有作用。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在全球金融投资界的名声并不佳，高调亮相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负面影响。至少，直到 2009 年 6 月访问中国之前，他一直是保持这样的低姿态的，努力让世人相信他“只是一个普通投资者”、“不会对全球金融领域造成任何伤害”。

例如，作为对冲基金的代言人，索罗斯从来不对外发布自己的投资策略，并且当其他人问到敏感话题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加以处理。有人问他像他这样的个体投资者能否聚集起足够的资本操纵某一种货币？他的回答果断而坚决：“不可能”，并且他也“不相信任何市场参与者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在低调地为自己辩护，保护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索罗斯如果不在投资界，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

三是分散投资风险

分散投资风险的说法人人都会，最典型的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这方面，索罗斯又是怎样做的呢？

在量子基金的投资组合中，索罗斯主要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基金净值，即资本投资，被索罗斯用来用于投资股票市场；另一块是基金融资部分，主要用于投资期货、债券、外汇等金融商品。

一般来说，其他对冲基金在投资时是不区分自有资金和贷款资本这两部分的，可是索罗斯不。索罗斯严格规定量子基金的本金只能用于投资股票，而用财务杠杆得到的资金（贷款）则全部用于商品投资，包括股票期货交易、债券、外汇投资。

索罗斯的理由是，股票的流动性要比期货、债券等金融商品小得多。所以，把本金投资在股票上，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在需要追交保证金时能够及时调度这部分资金，以免发生灾难性崩盘。

例如，由于不同投资工具的保证金要求不同，所以在选择财务杠杆倍数和准备追交保证金规模时，往往颇费脑筋。对此，索罗斯戏称他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心情”。一般来说，美国股票的保证金要求是 50%，外国股票是 30% 至 50%，有些股票指数期货只有 6%。所以，对冲基金必须极力避免把所有自有资金投入到任何一种单一投资工具中去，但同时又要考虑各种投资工具的不同投资比例。

索罗斯说，这方面他一般更关心本金安全，虽然要区分本金和利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许多基金的本金就是由利润堆积而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量子基金兼具股票市场资金和商品基金两者的特点。

作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管理者，索罗斯当然知道金融杠杆的作用和风险。所以他虽然会最大程度上利用金融杠杆尽可能创造投资收益，但也要看具体投资对象。例如，他对于纯粹的商品类基金，在使用金融杠杆时就非常谨慎，因为这类基金的投资风险较大，所以如果没有十分把握，索罗斯不会轻易地用高杠杆比率来进行这方面的操作。

四是忍受痛苦

投资有风险，投机的风险就更大。金融投机往往和痛苦交织在一起，没有一定的痛苦忍受力，就根本不适合在这个领域里摸爬滚打。

索罗斯在这方面与众不同，在谈论痛苦（亏损）时他可以做到若无其事，好像亏的不是他的钱，完全与他无关一样。

索罗斯并非刻意这样镇定，但他善于往好的方面去想。虽然痛苦是人人都讨厌的，但有时却会给人以清醒的头脑。投机市场上的痛苦往往与赔钱交织相伴，而投资者能否从这种痛苦中悟到些什么，才是更重要的。

经常从这种哲学角度进行思考，索罗斯的头脑会异常清醒。要知道，他的投入动辄就是几亿美元，规模达到如此之大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哪怕在基金掌舵人中也很少见。这说明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强的毅力，只有这样才能举重若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能够忍受痛苦并及时中止痛苦，否则“苦海无边”，就一定会影响下一步的投资决策。

2

看准了就要全力以赴

作为著名的投机大师，索罗斯在投资时颇为心狠手辣。不用说，所有投资或投机都必须注意风险防范。而在索罗斯看来，这种风险不是指循规蹈矩地保住既得利益，或者亦步亦趋地稳扎稳打，而是如何利用手上的每一个筹码最大限度地发挥赚钱效应。也就是说，如果资金在你手里无法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这种投资就是有风险的，称为低效率风险。

明确了这一点，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索罗斯在投资中会雷厉风行、心狠手辣了。要么不出手，要么就在看准时机后全力出击。他始终认为，投资者所犯的错误往往不是过于大胆，而是过于保守。这一观点虽然令人颇感新颖，但仔细想想却又不是毫无道理。

所以看索罗斯的投资过程，他总是在精确判断市场趋势转折点到来之前提前布局，精心准备，然后拿出自己的所有身价“孤注一掷”，有时候甚至嫌自己现有的实力不够，还会采取循环抵押贷款方式，尽可能筹集更多的筹码。一方面，这种投资方式过于疯狂，不提倡其他投资者仿效；另一方面，这又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索罗斯对自己的判断信心十足。

这样就走入了一个极端：如果信心不足，就绝不出手；如果信心充足，那就一竿子到底，酣畅淋漓。

关于这一点，在他 1992 年狙击英镑之役中有最好的注脚。

当时他的手下大将原来是准备建立 30 亿到 40 亿美元的英镑空仓规模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的，索罗斯得知后不无批评地说：“你这么一点规模也算是仓位？”于是，他马上把规模提高到了 100 亿美元。

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在国际上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大批国际游资时刻关注着索罗斯和量子基金的行动及方向，这在客观上放大了索罗斯的投资效益。有时候他只要放出一点风声来，就能马上调动全球游资涌向某个领域或行业，帮他打开血路。这也是索罗斯极具破坏力的表现之一。

以至于到后来，索罗斯投资黄金，全球投资者就认为投资黄金的时刻到了，黄金价格就开始上涨；索罗斯投资伦敦的房地产，那里的房地产价格一夜之间就从颓势转向兴旺；索罗斯写文章批评德国货币政策，认为马克不值这么多钱，于是马克汇率就只好“乖乖”地开始下跌……

客观地说，索罗斯的这种魔力无论对各国市场还是索罗斯本人来说都有利有弊。以对索罗斯的影响为例，投资者的这种跟风起哄增加了他看清市场趋势的难度，因为在这种跟风起哄的背后是一种混乱。只有在这种混乱中保持冷静和理性，才能辨别真伪，找到符合自己的投资良机。

索罗斯写文章批评德国货币政策这件事，具体地是指 1993 年 6 月索罗斯预计德国经济衰退，短期利率必然会下调，否则高利率政策一定会损害德国经济，而利率下调，马克就必将随之贬值。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投给英国《泰晤士报》，表达自己的这一看法。

文章发表后，立刻在全球市场上引起热烈反响，马克的比价从 6 月 11 日的 0.80 美元下跌到 6 月 25 日的 0.59 美元，下跌了 26% 还多；量子基金因此轻轻松松地就大赚了差不多 4 亿美元。

与此同时，索罗斯发现英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低谷，于是在 1993 年 6 月通过与里奇曼共同设立的基金斥资 7.75 亿美元，买入英国土地公司 4.8% 的股份。由于索罗斯的巨大影响，当时全球许多投资商对索罗斯极为崇拜，看到索罗斯买什么他们也就买什么。由于投资者跟风追涨，致使英国土地公司的市值上涨了 6.67 亿英镑，索罗斯从中分享获利 520 万英镑。

这两次战役使得索罗斯大大增强了自信，但也由此给他造成了麻烦。具体地说，这时候的马克虽然贬值了，却不是德国政府愿意看到的，这反而引起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度警惕。因为再怎么讲，这时候的德国经济也要比1992年的英国强得多，所以德国中央银行接下来展开了一系列与索罗斯进行抗争的行动，使得1994年初索罗斯斥巨资卖空马克的行为受到严重挫折。据说当时索罗斯卖空了300亿美元马克，损失多惨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虽然索罗斯看准了就会全力以赴，但归根结底他的“看准”与事实是否相符则不好说，作为追风的投资者来说要时刻保持一份警惕。

新近的例子是，正当黄金价格涨势叹为观止、受到全球投资者大肆追捧时，索罗斯等大投资家却在抛售黄金。2011年10月，索罗斯已经彻底清空手中的黄金头寸并表示“没有必要再大量持有黄金”，令全球投资者直呼看不懂：许多投资者在跟风抛售，更多的尤其是那些刚刚高价买入黄金的投资者则感到左右为难。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分歧呢？实际上，在对待这种事情时有一点必须考虑清楚，那就是索罗斯作为大投资家与一般投资者的操作手法和时点选择都是大不一样的，后者可以参考前者的做法，但也不必奉为圭臬。

究其原因在于，对冲基金所玩的这种游戏必定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财务杠杆，所以他们的交易成本相对来说微不足道，适合快进快出。可是如果一般投资者没有财务杠杆，这时候要快进快出只能是微利，甚至连俗话所说的“汤”也喝不上；一旦碰到做反了，还注定要赔钱。举个例子来说，对冲基金如果有2%的获利就抛出属于正常，在税率极低、交易成本很低、杠杆率极高的背景下，这就是一笔丰厚的获利回报了。

更重要的是，请不要忘了对冲基金的“对冲”性质。对冲基金把持有黄金仅仅当做投资组合中的一种风险对冲工具，往往更重视它在投资组合中的“平衡调整”功能，并不是为了一定要赚多少钱。究其原因在于，黄

金价格与其他投资品种的关联度最小，所以黄金投资在对冲基金组合中可以单独存在。

可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就不是这样了，黄金投资很可能就是你的主要投资品种，至少也是一个独立投资品种，不存在这种“平衡调整”功能。所以，一般投资者完全没有必要参考索罗斯等大腕的黄金买卖来决定自己的投资策略，否则会有东施效颦之幽默。

更不用说，无论是大投资家本人还是媒体，在对外界报道他们的投资操作时往往谎话连篇。有的是子虚乌有或张冠李戴，有的是捕风捉影或投其所好，其中最常用的是“预先设置”故事，然后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编造和扭曲，目的是希望市场跟风，从而更有助于他们下一步的投资操作。如果读者根据这样的报道自投罗网，那就正好上了他们的当。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是查阅这些基金公司报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相关文件，来核实与媒体报道或他们自己所说的是否一致。一般来说，他们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材料因为要负法律责任，在真实性方面要更可靠一些。只是要注意的是，这些材料的发布有一种滞后效应，等到你能查阅到时，基本上已经无法给你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了。

所以，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更好的方法是能从索罗斯等大投资家抛售黄金的举措中，体会他们的独到见解。

本书多次提到，索罗斯是从全球政治经济角度来考虑投机价值的，所以他的大举措一定具有许多有价值的独特之处，其他投资者或许会从中得到有价值的参考。

比如从索罗斯大肆抛售黄金来看，你是否能联想到“这是不是表明黄金价格已经到达相对高点，其他某种商品的投资价值就突显出来了？”循着这样的思路看问题，或许才是正确的。

要知道，量子基金是一种对冲基金，而对冲基金的操作手法往往是通过对货币的远期，以及在期货、期权市场上对这种货币进行大规模卖空进

行的。大规模卖空这种货币，才会在市场上造成这种货币将要贬值的预期。如果该国政府没有雄厚的外汇储备，或者不能大规模调动资金对市场进行干预，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预期成为现实。而这就正好上了索罗斯的当，让量子基金等处于空头的对冲基金大获其利。

补充说明一点：量子基金的投资活动非常复杂，并不是读者常见的那种面向普通投资者的证券投资基金。这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基金投资者、资金募集方式、信息披露要求、受监管程度、投资活动的公平性和灵活性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

具体地说，证券投资基金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资产组合概念，并且在投资工具的选择、投资比例上具有确定方案。

例如，如果是平衡型基金，那么在基金的投资组合中股票和债券比重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如果是增长型基金，则主要侧重于投资高增长型股票。并且，这些共同基金是不能利用信贷资金进行投资的。

可是量子基金在这些方面就没有任何限制和要求，它可以利用一切可以操作的金融工具和组合，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它可以不择手段地获取超额利润回报。

更重要的是，量子基金在操作上具有高度隐蔽性和灵活性，再加上它具有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杠杆融资效应，投资获利和投资风险都会被大大放大。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它要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其重要性和破坏力会被放大许多倍。

索罗斯解释说，在1997年上半年量子基金挤压泰国金融市场时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用自己的钱买股票，付5%的现金，另外95%的资金用借的；如果用债券做抵押，可以借更多钱，我们用1000美元，至少可以买进价值5万美元的长期债券……”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如此这般，自然而然地就扩大了索罗斯原来可以动用资金的倍数。更厉害的是，如果索罗斯用这些资金追加投资于具有“高杠杆”特点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杠杆比率还会更高。

例如，1997年3月量子基金就大量买入看跌期权，然后以掉期方式借入大量泰铢，卖出泰铢期货和远期。因为索罗斯算定交易对手会抛出泰铢现货为衍生产品合同保值，所以他轻而易举地就借别人之手制造出了泰铢贬值压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索罗斯的“立体投机法”。

那么，索罗斯等人是怎样进行立体投机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利用某种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促使其汇率变动，从而获得巨额利润。举例说，1996年下半年索罗斯看到实行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泰铢已经处于高位，坚信泰铢与美元26比1的汇率无法长期维持下去，于是就瞄准泰铢开刀。

索罗斯先在泰国银行（或者与泰国银行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外国银行）存入一大笔保证金，例如5亿美元，如果是20倍的杠杆率，就可以从这些银行贷到相当于100亿美元的泰铢，即2600亿泰铢。因为这时候的泰铢汇率还没有发生大变动，所以索罗斯可以通过即期外汇买卖在外汇市场上把这些借来的泰铢迅速抛售出去，干什么？就是为了换回100亿美元。与此同时，索罗斯再以大大低于1：26的兑换价格购进2600亿的泰铢期货，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对冲原来抛出的2600亿泰铢。

不用说，这时候索罗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泰铢贬值，只要是在贷款归还期内，贬值幅度越大越好。因为借款到期时的泰铢越是不值钱，索罗斯归还的美元就越少，只要低于原来的100亿美元及其利息，这差价就变成了他的投资获利。

事实上，索罗斯在这次战役中拼命打压泰铢汇率，泰国政府又无力进行干预，泰铢兑美元的汇率很快就从26：1下跌到35：1。这样，索罗斯只要投放5亿美元进行炒作，大约就能从中赚到近20亿美元。

顺便说一句，有读者也许会问，索罗斯赚到的钱是从谁的口袋里流出

来的呢？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炒作中谁受到了损失呢？

这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持有泰铢的老百姓，他们手中拥有的泰铢数量还是这么多，可是购买力却下降了；二是泰国政府，政府在力挺泰铢汇率的过程中需要用美元购入泰铢，而这时候购入的泰铢购买力已大不如从前，所以这种交易是吃亏的。可是作为政府来说，眼睁睁地看着货币体系崩溃又不行，挺不住也得挺。

一般来说，由于金融市场上存在着无套利均衡关系，所以外汇即期市场、远期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衍生市场之间是环环相扣和节节锁定的，牵一发动全身。所以索罗斯在立体运用金融工具时，会同时注重运用各种策略来达到目的。

最典型的是，1997年10月索罗斯进攻港元市场时就是首先在货币市场上大量抛售港元，迫使香港特区政府急剧拉高货币市场上的同业拆借利息，而同业拆借利息的急剧拉高，必然会促使香港股市大幅度下跌；而香港股市的大幅度下跌，又会连累到香港期货指数的大幅度下跌；香港期货指数的大幅度下跌，则会动摇全球投资者对香港经济和港元的信心，促使港元面临新的贬值压力。

如此这般，索罗斯就可以在这种立体工具的运用下，最大限度地扩大战果。

当然，这只是如意算盘。如果这些立体工具运用不当或时机不当，抑或局面不是向自己设想的那样发展，所造成的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对此，索罗斯形容说：

如果你把一般的投资组合像名称所显示的一样，看成是扁平或二度空间的东西，就最容易了解这一点。但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像建筑物，用我们的股本作为基础，建立一个三维空间的结构，有结构，有融资，由基本持股的质押价值来支撑……我们愿意根据三个主轴把资本投资下去：有股票

头寸、利率头寸和外汇头寸……不同的部位互相强化，创造出这个由风险和获利机会组成的立体结构。通常两天——一个上涨日和一个下跌日——就足以使我们的基金高速膨胀。

所以总体上看，20 世纪 90 年代亚洲金融风暴最先从泰国开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泰国由于银根放松导致不良资产膨胀突出，具体表现为经常项目赤字膨胀、肆意借贷外资、房地产过热，再加上政府把泰铢与美元汇率相挂钩，这就导致索罗斯等人有机可乘了。

虽然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可是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反映的却是泰国整体经济效益不佳的实质。

早在 1996 年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就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警告说，如果按照 1994 年 12 月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危险信号来衡量，如果东南亚要发生金融动荡之类的危机，泰国将会首当其冲。

遗憾的是，当时的泰国国内依然陶醉于对未来蓝图的描绘中，有人虽然也看到这一警告，却满不在乎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如日中天的泰国怎么可能会前途未卜呢？”

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泰国，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比较普遍，这也是最终导致索罗斯在攻击泰国后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攻击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原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这些国家普遍放松银根，更要命的是，这些资金进入的领域都是些低效益企业；企业效益不好，清偿能力就不高，一遇到提高利率等措施就必然会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这样，企业中的不良资产率也就暗中转移给了金融机构。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中不良资产逐步积聚，一旦触及投资者信任底线，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

不用说，索罗斯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并利用这个弱点发动攻击的。

1997年3月，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良、流动资金不足时，索罗斯发出了进攻令。

与此同时，在美国，虽然当时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和外债比例、外债占外汇储备比例的增长速度都很快；可是由于这些资金的投入方向大多是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和行业，难以形成不良资产，所以就无法积聚成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当然，10年后的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又正是金融机构贷款质量不高、金融资产中不良资产增加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形成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索罗斯从攻击泰国开始抓住的是银行不良资产率，实在是抓住了要害。

对于这一点，当时的泰国总理猜瓦利实际上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在接受《民族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说：“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一直在挥霍借来的钱。我们欠了很多债，我们只有精明地、正确地使用这笔钱，才能减少债务。”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众所周知，谁都想把钱投到回报率高的企业和行业，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世界银行的研究资料表明，在当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中存在的6600亿美元银行坏账中，泰国一国所占比重估计就高达20%。

回过头来看，索罗斯是怎样看准并全力以赴的呢？以下一条脉络值得关注：

一是观察投资者预期

每个投资者都想判断市场预期，因为这是投资获利的可靠保证。可是如果要想据此做出买入或卖出的决定，依据又在哪里呢？不用说，就在于对未来价格走势所作的判断。

索罗斯认为，由于投资者和投资市场的偏见所在，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回过头来看，索罗斯自己的做法是，他完全不相信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说的那种完全自由竞争模式，而是坚定地认为是市场走势在操纵着供需关系发展，并由此引发价格波动。

这就是说，索罗斯认为是全体投资者的预期在决定着市场走势，市场走势决定着供求关系，供求关系决定着价格变动。一句话，判断其他投资者究竟具有怎样的市场预期，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寻找差距

通过上述分析判断后，把自己的判断和市场现实相对照，进一步寻找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容易发现投资市场中的不平衡状态究竟在哪里。

索罗斯认为，如果这种差距比较明显或者其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就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因为它必将影响到其他投资者的市场预期，进而对股票价格或汇率走势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投资机会就潜伏在其中了。

三是发现联系

如果能找出市场趋势和现实之间发生联系的纽带，就能比较方便地找到投资机会在哪里。

索罗斯认为，市场发展趋势的差距并不必然表现为价格变动趋势，但一定会与价格变动趋势产生联系，并且往往会呈现出“错误”的走向。投资者如果过于简单地判断这两者之间的协同作用，未免显得太幼稚。

因为在他看来，投资者对市场的偏见和市场发展趋势之间，实际上往往存在着反作用联系，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一致性。这既是市场判断的难点所在，也是精准判断市场走势的技巧所在。

四是找到偏见所在

索罗斯认为，既然上面提到投资的要点在于观察投资者预期，那么找

到投资者和投资市场的偏见所在就十分关键。虽然投资者对市场趋势存在着许许多多偏见，但这些偏见集中体现在自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价格与股票真实价格之间的差额上。

也就是说，投资者买入股票时的价格如果高于其实际价值，就体现为看好这一股票的偏见价值；卖出股票时的价格如果低于其实际价值，就体现为对这一股票价值的特别不看好。这种情形永远存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消除。对于索罗斯来说，只要能从整体上较好地把握这种不稳定状态，就能把握市场主旋律，从中大获其利。

3

别太顾忌良心道德

索罗斯认为，搞投资尤其是搞投机，不能太过于顾忌“良心”、“道德”的束缚，更重要的是遵守游戏规则。当然，如果这种游戏规则过时了，不具备先进性，适当破坏一下、改进一下也未尝不可，哪怕这会触动自身利益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建设和维护“开放社会”所必需的。

看起来这和我古代的儒家哲学很不相符，但却非常实事求是。俗话说“见利忘义”，在商业经营过程中过多地考虑“义”，就必定会损失“利”。这就是生活中大家所感受到的，商人有时候做生意不愿意做“朋友”、“熟人”的生意，更愿意做“陌生人”生意的道理。虽说“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过于注重人情的社会氛围中，就更是如此。

不要责怪索罗斯在这方面“见利忘义”、“心狠手辣”，其实这反而是法制社会的应有要求。只不过像索罗斯这样敢于表明观点的人太少而已。

索罗斯从不隐瞒自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并且说他自己投机货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所以他对任何人没有也不会有负罪感。

例如，他不认为交易中有所谓“双赢”的说法，而是直言不讳地说，交易中的双方有人获利就必定有人损失，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只有心狠手辣、果断出击，才能抓住机会，从对方手里夺取利润。

索罗斯曾经说，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没有道德，这并不

过是一种操作方式而已。金融市场不属于道德范畴，所以别在投资或投机中谈什么良心道德。也就是说，投资者在金融领域根本就不用去考虑道德问题，因为这种投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索罗斯在这方面最早受到的教育，可能是他 14 岁时的一段经历。那是 1944 年德国军队入侵匈牙利后，他父亲的一位朋友有一条金项链要出售，委托他父亲帮忙。于是父亲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索罗斯，因为索罗斯的长相酷似母亲，金头发、蓝眼睛，看起来不像犹太人，更容易在纳粹军队的监视下蒙混过关。

索罗斯根据父亲的嘱咐，把金项链交给两位外国朋友。由于这两个外国人与黑市交易有联系，所以金项链卖了个好价钱，是委托者期望值的两倍。

这件事情给索罗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他懂得任何商品包括黄金的价格都是可以浮动的，这可谓是他从实践中学到的“金融第一课”。

正因如此，成年后的索罗斯经常说，作为金融市场参与者，他会按照原有游戏规则来玩这个游戏，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意思是说，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行，与道德无关。言外之意是，任何人都别想用道德来束缚他的思想和行为，他自己从来就没觉得有什么内疚和不负责任感。

例如，索罗斯在 1973 年辞职和罗杰斯一起创建量子基金时，正是他在单位里“吃香”的时候。与他同样怀才不遇的还有毕业于耶鲁大学历史系，并且在剑桥大学读过哲学和经济学的罗杰斯。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们两人在公司股票经营中不可能分得太多利润，所以才毅然携手一起辞职并单立门户，创建属于自己的公司。

在当时，这种做法是非常遭人非议的，但他们觉得有这种想法和行为很正常，不但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且工作环境更自由——索罗斯常常骑着自行车上班，而罗杰斯更是有时候穿着网球鞋就去办公室。无论能不能赚到钱，他们每周都工作 80 小时以上，充满激情和乐趣。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同样遭人诟病的还有买空卖空。索罗斯偏爱卖空行为，可是其他投资者都不敢这样做，或者不忍心这样做。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在股市低迷、上市公司不景气时，你还要故意砸盘，虽然不违法，但至少是“没有同情心”、“不道德”。可是索罗斯和罗杰斯都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自己是靠实力和技巧获取利润的，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这样做都无可厚非，不但他们可以这样，其他基金公司也完全可以这样做。

在这里，啰里啰唆地说那么多良心道德的话题，实际上是有原因的，那就是索罗斯身上背负着太多骂名——有人说他是“金融大鳄”，这已经算客气的了，“一只假寐的老狼”，就已经更进一步；“金融界的坏孩子”，责骂中多少带有一些嗔怪，因为这里毕竟还是把他当“孩子”来看待的，而任何“孩子”都是允许“犯错误”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就不啻于要把他送上断头台。他自己则有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对这一切似乎看得很淡，因为他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有人把引爆亚洲金融危机的责任全部推到索罗斯身上，而他则认为，如果不是他炒作，亚洲金融风暴照样会发生，他是否炒作对爆发这次金融危机不会起任何作用。无论是炒作外币还是投机，他只要遵守游戏规则，并且从有助于建立良好社会角度出发注重改进规则，就是“有道德”的，哪怕这种规则的改进触犯自身利益，只要对建立良好社会有帮助，他照样会支持。

例如，美国从2011年9月17日起爆发的名为“占领华尔街”的和平示威运动，目的就是要通过静坐、宿营等方式声讨华尔街金融业者。

他们打出了“不要削减公共开支”、“够了！腐败”、“纽约不能再容忍贪婪的华尔街”、“99%的美国人反对1%的贪腐者说不”等口号，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响应，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站在他们这一边。活动很快就发展到全球80多个国家的几千个城市。

索罗斯同样大力声援这场运动，并称“愤怒有理”。索罗斯认为，他

非常理解这些抗议民众胸中的愤怒，用纳税人的钱去填补亏损银行并让这些银行因此获利，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可是当有媒体猜测索罗斯就是这场运动的幕后金主时，他则亲口予以了否认。

索罗斯说，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区，他因为在狙击英镑战役中迫使英国英格兰银行屈服，以及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导致马来西亚人破产而出名。当然，这种出名是以他作为投机者和魔鬼的代价换来的。可是在世界其他地区，他却被当做是“开放社会”的捍卫者。

由此可以看出，索罗斯对全球对他的看法还是比较中肯的、实事求是的，所以为此他很淡定。正是因为这种淡定，使得他不会患得患失，而是会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当然，以上只是索罗斯的一面之词。从全球范围看，还是公认他对泰国泰铢的炒作是引发亚洲金融风暴导火线这一事实的。但作为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投机家，如果苛求索罗斯担负什么“良心”、“道德”，从而让他“放下屠刀”，则是非常幼稚可笑并且不现实的。

即使你说他是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获取巨额资本的目的，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日常生活中的苍蝇属于“四害”，人人痛恨，可是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要想不让“苍蝇”叮咬，你这只“蛋”首先要保持新鲜、充满活力，使得“苍蝇”无懈可击，这才是正路。又何况，所谓投资或投机，不就是主要通过某种机制的漏洞从中获利吗？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责难索罗斯的道德问题呢？这是因为，索罗斯操纵着规模庞大的对冲基金，而对冲基金的运作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

例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正常情况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机制是有效的，可是如果受到对冲基金的冲击和干扰，原有正常运转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就会遭到破坏。对冲基金攻击得越厉害，这种破坏作用就越大，最终的结果就会越朝着有利于对冲基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从某个角度看，这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财富在对冲基金和国家民族之间进行再分配。

由于对冲基金在冲击正常经济秩序时会联手操作，所以这种破坏力非常巨大，几乎可以说是垄断操作。既然如此，那么对冲基金从国家民族身上夺取利润，也就可以大致看做是垄断行业在获取垄断利润。在这背后，反映的是市场秩序遭到了破坏，市场效率被降低甚至完全没有效率。而既然市场效率消逝了，那么他的这种投机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因为从全球范围看，这种行为导致的财富再分配，其赢者所得到的并不仅仅是输者的损失，同时还体现为一种以金融体系崩溃、经济体制失效为代价的福利损失，所以难怪要激起全球“公愤”了。

索罗斯能够因为狙击英镑取得成功而闻名于世，主要在于他彻底颠覆了过去人们的一种固有观念，那就是认为全球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足以抵御货币价值的任何波动。

索罗斯用事实粉碎了这样的幻想，由此警告各国：金融活动规模已经大大超出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范围；索罗斯在从另一个角度帮助各国乃至全球修复金融体系，平衡市场力量。

从时间段看，这个过程大约从 1986 年开始，1998 年到达顶峰。正是因为这种金融市场的平衡修复，很好地避免了 2008 年我国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是我国政府从 1997 年索罗斯狙击港元中得到的教训在起作用。

话已至此，我们来看一看不太顾忌“良心”、“道德”的索罗斯是怎样判断市场的。在这方面，他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部曲：

一是突破扭曲观念

稍微有点经验的投资者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所谓“理论”，或者受到某种理论的束缚，形成一种固有思维。而这在索罗斯看来是很不应该的。

索罗斯早年想成为一名哲学家，而哲学家的基本素养是要学会独立思

考。索罗斯的这种独立思考及其观点，让他更多地看到了投资界存在的缺陷和扭曲观念，更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而这对判断市场趋势是至关重要的。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也就很难正确判断市场发展趋势了。

二是学习、暂停、反省

索罗斯不是不会犯错误，而是经常犯错误，但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为投资大亨他并不全然沉迷于投资市场，相反经常会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这使得他在投资时能更清楚地看到投资市场中潜伏的风险和各种迷茫的信息干扰。再加上他的耐心实在太好，所以他会把一个投资过程分成几个阶段，先小试牛刀，然后再暂停一下进行总结反思，待判明方向后继续加码或及时退出。

在这个过程中他所做的主要工作是阅读和思考，并且刻意不去办公室，以免受到办公室氛围的压抑。他需要的是“旁观者清”。

三是勇于承认错误

任何投资者都不可能一贯正确，因为市场总是捉摸不定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别人指出你的错误后，你能否正视现实、勇于承认错误，这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如果一意孤行坚持错误，只会让亏损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被淘汰出局。

索罗斯在勇于承认错误方面有口皆碑，因为他不觉得承认错误有什么羞耻。在他眼里，投资只不过是一种游戏，既然是做游戏，那么也就根本不用标榜自己是一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索罗斯能取得骄人的投资业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知错就改或者放弃，这是许多投资者做不到的。

当然，以上总结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索罗斯的操作手法。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他管理的是对冲基金，而对冲基金与普通投资相比无论在资金规模、金融工具、投资手法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别，所以普通投资者只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能借鉴他的这种心路历程；要想真正弄懂索罗斯，难度相当大。

这一点连索罗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有人认为他的投资哲学过于晦涩，确实如此，但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他可以把它归纳为“了解自己的错误，研究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进一步解释说，每个人对事物的了解总是有偏差的，我们不可能确切地了解真相，但你可以一步步接近真相。看得出，差一点成为哲学家的索罗斯，说话总是那么充满哲学意味，让人似懂非懂的。

4

把量子基金玩到滚瓜烂熟

索罗斯纵横江湖几十年，靠的主要是他一手创办的量子基金。所以，了解他的操作手法和心路历程，一定要从了解量子基金开始。

量子基金是索罗斯创办、管理的主要投资基金之一，在全球算是规模较大的对冲基金。在量子集团内一共有 5 个风格迥异的对冲基金，量子基金是其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被公认为迄今为止全球所有投资基金中业绩最好的基金。

量子基金属于高风险基金。量子美元基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注册，主要采用私募方式筹集资金。量子基金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股票、债券、外汇、商品等，经常大量运用金融衍生产品和杠杆融资，从事全方位的国际性金融操作。

索罗斯为什么把它取名为“量子”呢？原来，他平生特别赞赏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定理”，认为证券市场经常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很难进行精确度量 and 估计，这就和微粒子的物理量子不可能具有确定数值一样。从中可以看出索罗斯的基本投资哲学。

量子基金的前身双鹰基金成立于 1969 年，是索罗斯和另一位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在美国纽约创办的，注册资本 400 万美元。

由于该基金出资人都不具有美国国籍，所以能够较好地避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因为根据美国 1933 年证券法、1934 年证券交易法、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1940 年投资公司法规定，不满 100 个投资者的机构的成立不需要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等金融主管部门登记，并且可以免于管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因为美国证券管理机构认为，这种投资者人数较少的金融机构，操盘手一般十分老练而富裕，自我保护能力强，所以政府没有必要出面操这份“闲心”。

双鹰基金是索罗斯创办的第二家基金，在此以前他创办的第一家基金叫老鹰基金，是索罗斯说服爱霍德公司老板在 1967 年设立的。两家基金都属于离岸基金，由索罗斯负责运作，但老鹰基金是多头基金，双鹰基金是对冲基金。并且，双鹰基金是索罗斯用自己的资金设立的，他当时出资 25 万美元，然后在欧洲大亨中吸收 600 万美元资金，从中挑选欧洲、阿拉伯、南美洲富豪的 400 万美元作为双鹰基金的本金。

在这方面，能够充分看出索罗斯的长远目光。因为就在创设双鹰基金时，就有许多美国富豪想投资进来，但全都被索罗斯拒绝了。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他有足够的自信从欧洲人身上筹集到资金，因为多数欧洲人为人忠诚；另一方面，出资人全部是境外投资者，有助于避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更有助于他放开手脚随意运用金融工具。因为索罗斯这时候已是美国人，所以他算是基金批准的唯一美国客户。

从股权结构看，索罗斯的 25 万美元只占其中的 6.25%，很小，但作为管理者他有权从每年的基金收益中获取一定报酬，由于基金中只有他最了解欧洲市场，对基金获利贡献最大，所以其他股东对此完全没意见。聪明的索罗斯把自己每年的分红又全都投入其中，这对他来说能够提高自己的股权比重，给人以对基金发展前途看好的信心；同时对其他股东来说，又能发挥榜样的力量，吸引他们不断追加投资、壮大基金规模。

1973 年，索罗斯离开原单位，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吉姆·罗杰斯一起把原来的双鹰基金改组为索罗斯基金。虽然这时候的注册资本只有 1200 万美元，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两人合伙公司，所以干起来很卖力。1979 年，

索罗斯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这是后话。

这两人的组合可谓是绝配——罗杰斯擅长分析，而索罗斯则善于判断决策。两人相得益彰，再加上他们完全抛弃了美国华尔街上那套所谓的流行理论，投资效益日渐增长，短短几年间规模就扩大到1亿美元。

这里简单看看罗杰斯是何许人也，值得索罗斯赞赏有加？这位罗杰斯1942年10月出生在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虽然家族中没有人从事金融行业，可是罗杰斯的投资天赋和巴菲特颇为相似。他5岁时就开始在棒球场上捡空瓶，不久以后就获得在少年棒球联合会比赛中出售饮料和花生的经营特许权，开始了创业。

这时候的罗杰斯6岁。他向父亲借了1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购买花生烘烤机，5年后11岁时，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成果还清了这笔贷款，并且自己的银行账户上有了属于自己的100美元。

成年后，罗杰斯既是一位优秀的大学教授，又是一位杰出的投资家。他一边环球旅行一边投资，被称为“奥地利股市之父”。他从1983年开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最热门的高级证券分析课程，连“股神”巴菲特听了也大声叫好，认为罗杰斯对市场大趋势的把握无人能及。

事实上，罗杰斯无论在德国、奥地利、巴西、新加坡等国家的投资都取得了巨大成功。1999年罗杰斯第二次环球旅行时，他投资的上海B股照样取得了巨大成功。他1998年创立的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RICI），到2003年11月就取得了117.5%的涨幅，超过同期全球主要商品指数。所有这些，都奠定了他“全球著名投资家”的桂冠。

话说1973年改名后的索罗斯基金，刚开始时只有三个人：索罗斯担任交易员，罗杰斯担任研究员，再加一个秘书。基金规模并不大，但由于是索罗斯和罗杰斯两人自己的公司，所以他们非常投入。更因为这两人都是杰出的投资家，两个人的能耐都非同小可，所以在他们联手的10年间，一直是美国华尔街上的最佳黄金搭档。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他们的力量来自哪里呢？和巴菲特一样，是阅读。当时的索罗斯基金订阅了 30 多种商业刊物、1500 多家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金融财务记录。他们两人每天要仔细研究其中的二三十份年度财务报告，从中寻找最佳投资机会。当然，有付出必定有回报。在他们合作的 10 年间没有一年的投资是失败的，索罗斯基金规模呈现出超常发展。到 1980 年 12 月 31 日时，索罗斯基金增长了 3365%，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只增长了 47%！

1979 年索罗斯在英国证券市场上运作得非常顺利。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就在当年英国股市上涨到最高点时，索罗斯彻底抛空英镑，然后以非常低的价格补仓，据说投资金额高达 10 亿美元，而索罗斯基金仅此一项投资的获利就高达 1 亿美元。

1980 年，索罗斯基金的投资回报率达到难以置信的 102.6%，是两人合作历年来业绩最好的，基金规模也随之增加到 3.81 亿美元，推动索罗斯进入了亿万富翁行列。令人遗憾的是，这时候的罗杰斯已经厌倦了华尔街的生活，从而使得这对华尔街最佳黄金搭档不得不分道扬镳。

索罗斯这时候的心情非常糟糕，颇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他得知罗杰斯离开的原因，尤其是听到他谈起要两次环游世界，一边旅游一边投资时（第一次是 1990 年他骑着摩托车去了 50 多个国家，历时近两年；第二次是 1999 年他开着奔驰旅行车去了 116 个国家，历时三年，从冰岛出发经欧洲、日本、中国、俄罗斯、非洲、南极、澳大利亚、南美洲然后回到美国，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一度想彻底退出市场，过普通人的生活，或者专心致志地做慈善家、哲学家、作家。

要知道，因为 1980 年时的量子基金注册资本已经高达 8000 万美元，这还只是合伙人的个人资产（索罗斯个人占 80%），不包括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从经济实力来说，这时候的索罗斯完全可以为所欲为，无论是做投资还是做慈善都不成问题，就更别提环游世界了。

顺便一提的是，索罗斯的慈善事业也正是从 1981 年开始的。当时

他正在为投资债券疯狂集资，有一天猛然想到“如果只是为了变得富裕而死去，我将是失败者”，于是下定决心要为这个世界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

紧接着，他就把手下的工作人员分成两大块：一部分负责赚钱，另一部分负责花钱（用于慈善事业）。并且索罗斯的花钱与赚钱一样，也是眼睛一眨不眨的。据说有一次，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慈善项目计划交给索罗斯。虽然内容不长，只有半页纸，可是索罗斯在 15 分钟内就把计划返回给手下，并且改动了一个数据——把预算中的 300 万美元投入调整为 1.5 亿美元，整整扩大了 50 倍！并且，由于这些慈善项目都是属于索罗斯的个人行为，所以这些钱都是要从索罗斯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可是他依然很开心。

言归正传，索罗斯最终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投资生涯，并且马上就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把量子基金分为各种小基金，划小核算单位，然后发包给其他经理人；他自己则专心出任基金监督者，从此开始了长达 30 年的个人投资黄金时代。

只可惜，当时量子基金的这种改革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甚至还在 1981 年第一次出现了亏损，基金净值下降了 26%。

当时的索罗斯判断美国国债市场会出现一波较大上升行情，所以用借来的银行短期贷款大量买入长期国债。结果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他持有的长期国债损失了 3% 至 5%，量子基金首次出现利润下跌，下跌幅度高达 22.9%，大批投资者离他而去。

由于资金赎回压力大，量子基金规模从之前的 4 亿美元压缩到 2 亿美元，公司资产也减少了 1.93 亿美元。这一情形差不多延续到 1984 年。

1984 年，索罗斯看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决定还是恢复原来的做法，收回原先的资金发包方式，自己亲自操刀。但显而易见，这时候的基金规模已经比初创阶段大了许多。为了管好这只基金，索罗斯开始组建自己的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管理团队，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好汉三个帮”效应。

1985年索罗斯做多马克和日元，对赌美元兑日元贬值。在这场大规模投入行动中，索罗斯一共赚得约1.5亿美元，一下子就打响了量子基金在华尔街上的名气。1986年量子投资公司的财富增加了42%，达到15亿美元，而当年索罗斯个人从中得到的分红就有2亿美元。

到1992年9月，索罗斯采取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投资行动——狙击英镑，使它臣服——从此，他一举成为全球最著名的投资家。

这样的好景到1996年有了大转折。1996年量子基金的投资业绩相当糟糕，直到1997年6月末仍然没有起色。具体地说是，1996年美国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2个百分点，可是量子基金却亏损了1.5个百分点；1997年上半年量子基金业绩虽然增长了14个百分点，可同期道琼斯指数却增长了20.6个百分点，完全可以说乏善可陈。也就是说，投资者投资量子基金的业绩，完全比不上随随便便买上一只美国股票。

但读者千万别忘了，索罗斯具有常人不具备的分析能力和胆识，曾经多次准确预见金融危机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并提前空仓；而预测某个行业或公司具有非同寻常的成长潜力，对他来说更简单，他多次从这些股票的上升中获得超额收益，并在市场下滑时因为卖空股票而赚钱。所以，虽然当年的业绩很糟糕，可是长期来看发展速度还是非常惊人的。

截至1997年索罗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前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量子基金从原来的400万美元增值到60亿美元。简单地看规模好像只增长了1500倍，而实际上它的投资回报率高达3万倍。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969年投入量子基金1万美元，1996年末已经增值到3亿美元。

不过回过头来看，索罗斯的投资技巧在20世纪90年代才趋于成熟，量子基金的收益也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积累起来的。无论1992年的狙击英镑还是1997年引爆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在兴风作浪中可谓名利双收。几次大规模的货币狙击战，不仅让他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一跃成为全球

金融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并且在我国也开始家喻户晓。

要知道，量子基金虽然只有 60 亿美元规模，由于它实行的是杠杆融资政策，只要有需要，这 60 亿美元可以发挥出几百上千亿美元的投资效应来，从而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上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谁都无法小看它。

5

从最薄弱处撕开缺口

从历史上看，从最薄弱处撕开缺口，几乎是索罗斯的一大特长。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索罗斯在美国纽约梅尔公司工作时，就利用自己的特长，发明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

读者知道，此前索罗斯在英国伦敦混得并不好，但这段经历使得他对欧洲金融市场十分熟悉，而当他到了美国纽约后，发现纽约市场上这样的人才极其匮乏，所以索罗斯原来的那些经验就成了他与同行相比非常有用的竞争优势。索罗斯是在同事介绍下，于 1956 年 6 月来到纽约的。在纽约梅尔公司科恩的帮助下，他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自己的特长，提出了一种“认股权凭证交易市场”的操作方式。这是他的特长，却是别人的弱点。

在当时，认股权交易并不热门，因为认股权凭证的价值并不为人所知。所以索罗斯发明了这种交易方式后，主动权多半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时加拿大有一家名叫北班铀矿（Northspan Uranium）的公司，想筹集资金开发新矿，所以发行了一种可转换认股权债券。

索罗斯想，可转换认股权债券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转换成公司股票了，如果能想方设法把债券卖给客户，客户再交换一种凭证，保证在转换期间交出股票，这样让债券和认股权分开进行交易，就能形成一个认股权凭证交易市场。

索罗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他认识一位在大券商贝尔·史蒂恩斯(Bear Stearns)公司套利部门工作的交易员,28岁的格林伯格(Alan C.Greenberg)，两人经常通过专线电话讨论构想。如果构想也得到格林伯格的赞同，两家公司就一起买进、共同操作。

在这段时间里，索罗斯除了吃饭睡觉，整天考虑的就是这件事，为公司赚了不少钱。而这位格林伯格，后来一直做到该公司的执行长。

接下来，索罗斯又发明了一种从市场薄弱之处开拓经济增长点的渠道——建立海外套头交易投资，排斥美国客户（这时候的索罗斯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他个人例外，即他是可以作为其中一员的）。

具体地说，就是把美国人这时候普遍流行的套头交易投资用在海外投资中。由于这是一项开拓性工作，所以非常具有冒险性。也就是说，如果试验失败，索罗斯在这个行业里就可能永远抬不起头来，也就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会被提前结束。

但本书前面多次提到，索罗斯小时候的经历决定了他会喜欢这种冒险行为，无疑，这次他又取得了成功。从人才学角度看，这是胆商在起作用。

索罗斯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面带微笑地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对欧洲证券市场一无所知。所以，我得把我想得到的利润寄希望于我所紧随的欧洲公司，这真是瞎子给盲人带路。”听听看，这是不是很有点像中国人常说的“瞎猫捉到一只死老鼠”？既自谦，又自豪。

从索罗斯发动的亚洲金融危机看，最早是从泰国开始的。泰国在索罗斯眼里就是打开东南亚市场的薄弱点，事后证明他是正确的。

1992年，泰国政府义无反顾地对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结果引来国际游资纷纷以低利率的美元贷款形式进入泰国。

泰国金融业一看有这么多低息贷款进入，转手之间，就把它们以年息30%的价格贷给房地产市场，很快就推高了泰国房地产业的经济泡沫。随着泰国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很快就又出现了泡沫破

灭，许多银行贷款根本无法收回，金融资产质量严重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索罗斯向部下明确发出“国防动员令”：泰国正在玩火自焚，随时准备出击。

1997年6月，索罗斯明确指示开始抛售美国国债，目的是筹集资金，准备向泰国泰铢发动猛烈攻击。

现在回过头来看，索罗斯手下的量子基金正是在那个时候达到了最大的规模，投机活动也达到顶峰阶段。

再看1994年索罗斯对墨西哥比索发起攻击，也是因为他看准墨西哥此前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过于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基础之上、不堪一击的。

具体情况是：过去的墨西哥比较穷，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全球投资热潮中，它非常想借助于自己位于美国南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顺道发展经济，于是分别与美国、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1994年开始生效。

墨西哥政府希望这一协定能够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并没有错，但由于宣传过了头，让国内民众觉得墨西哥很快就要成为发达国家似的，这反而引起了国内的强烈不满，认为墨西哥在这个协定中的付出大于所得，不划算；并且更严重的是，从此以后墨西哥将融入全球经济，受美国的牵制太大。

伴随着这种思潮，墨西哥国内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总统候选人遇刺身亡，墨西哥政府本来还想宣布货币贬值的，这时候更不敢了。由于经济开放后外资大量涌入，墨西哥国内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墨西哥货币比索汇率高估，所以不得不用美元来支付外债，但这种局面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1994年12月20日，面对庞大的外资流出、外贸逆差、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比索兑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15%。而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比索立刻贬值15%！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时候的这种贬值措施已经太晚了。一方面是墨西哥的外汇储备已经没有了，另一方面是墨西哥的外债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一旦外资撤退必将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正是这样，比索与美元挂钩的当天就下跌了25%，学术界称之为“比索危机”。

这一切被索罗斯看得一清二楚。早有准备的索罗斯对此发起了猛烈攻击，墨西哥不得不仓促应战，原来的一点外汇储备很快就被消耗一空，于12月22日不得不放弃与美元的汇率连动，实行自由浮动。

汇率自由浮动的结果是什么？很容易想到，原来被高估了的汇率迅速下跌，在墨西哥国内造成比索贬值和股市崩溃，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把墨西哥逼到几乎要砸锅卖铁的地步，它自己却因此获得巨额投资回报。

不用说，表面上看这是索罗斯在乘人之危，而实际上墨西哥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比索贬值——是经济改革开放步伐太快、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部资金流入、政府决策失误以及政局不稳综合造成的结果。

资料表明，墨西哥危机造成的损失是GDP下跌6.9%，失业率从3.2%上升到6.6%，经济损失至少450亿美元，10年来的改革成果基本被抹平。

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1994年墨西哥的这一幕，很快就出现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其中的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这些国家长期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偏高，并且基本上维持与美元或以美元为代表的一揽子货币。

这种固定汇率或联系汇率，实际上就等于向国际游资宣布：你们如果进来进行炒作，必将会得到预期结果。不用说，国际游资最喜欢攻击这样的国家及其货币了。在这其中，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表现得最为抢眼。

1997年7月24日，泰铢兑美元的汇率就已经下降到32.5：1，创下历史新低。

在完成了对泰国泰铢的攻击后，索罗斯又把目光瞄准东南亚最大的国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家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印尼盾。印尼盾大幅度贬值，使得印尼国内出现了抢购美元狂潮，并且从 1997 年 7 月 21 日以后汇率大幅度下跌，同样创出了历史新低。

连克两城，索罗斯感到意犹未尽。因为他很清楚，既然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那么这场战火就必定会从泰国、印度尼西亚蔓延到其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不但具有紧密联系，而且颇具同质性。只要一鼓作气，就可以不断扩大战果，把战火烧遍东南亚。

在这样的背景下，索罗斯首先从受泰铢贬值造成多米诺效应冲击最大的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货币开刀，同时不放弃继续对泰国、印度尼西亚的战场打扫。

归根到底，无论一个企业、地区、国家，如果经济发展根基可靠，抵御这种金融风暴的冲击能力就会显示出“我自岿然不动”来。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香港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企业。要知道，和记黄埔公司在香港股市总市值中所占份额高达十分之一，就在 1997 年 10 月 21 日索罗斯拼命进攻港元、香港股市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香港恒生指数猛跌 23.34%、总市值在 4 天内贬值近四分之一的情况下，和记黄埔公司依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并且在金融危机过去后还不断创造出惊人业绩来。以至于五年后的 2002 年，该公司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别建议大家去读一读 1997 年末李嘉诚在该公司周年晚宴上的致词，说“所有奥秘即在其中”。

那么，这“其中”又在哪里呢？这就是李嘉诚在致词中所说的：“过去几个月来亚洲发生的金融风暴是史无前例的，但集团根基良好、稳健，业务多元化、国际化，所以与其他一般公司相比，影响较为轻微。”

意思是说，和记黄埔公司之所以受冲击较小，最重要的因素是李嘉诚一贯奉行的“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的经营之道。

举个例子来说，欧洲几大电信巨头包括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德国电

信当时都因为购买 3G 牌照而负债累累，与它们相比，实力更逊一筹的和记黄埔公司也参与购买 3G 牌照，因而遭到许多非议，被认为是一种冒险。

可是这些人不知道，和记黄埔公司与前者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都是用银行借贷来购买 3G 牌照的，可是和记黄埔公司完全是利用出售 2G 业务的资金来支持 3G 业务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具体地说，和记黄埔公司用当时出手 Orange 换回的 1000 多亿港元资金，足可以买下全球所有 3G 业务，包括执照费、设备费、利息、开拓消费群体等费用。而现在它只需要用到这总费用中的一部分，又哪里来的风险呢？与前面的几大电信巨头相比，这完全是两码事，而且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所以任凭金融危机冲击，净资产不会受到真正的损失。

有了这种稳健经营策略，该公司的业务多元化和外向型在索罗斯冲击港元的背景下，就被降到了最小损害的程度。因为港元交易在和记黄埔公司中所占比重并不大，索罗斯冲击港元对它的影响当然也就大大降低了。

1997 年时和记黄埔公司的海外业务营业额在总营业额中占 39%、海外业务盈利占总盈利的 31%。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后的 1999 年，该公司由于在出售 Orange 方面的经典操作，当年海外业务盈利占整个集团总盈利的比重高达 97%，在当年全球所有单一企业中盈利额最高。直到现在，这个比例仍然在 60% 左右。

庞大的海外业务，使得和记黄埔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实际上处于风暴眼之外，当然受影响就小了。

这也给我们一种启发：经济国际化能够有效抵挡国际游资和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是闭关自守，就越经不起冲击。

再来看和记黄埔公司的五大核心产业中，只有电讯业属于所谓的新经济类型，其他四大产业都属于传统业务；并且，该公司在 1989 年时就已经很清晰地勾勒出了五大核心业务。在这其中，电讯业是该公司净资产和推动股价上升最快的部分，港口及相关业务、地产及酒店、零售及制造、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能源及基建则在抗击金融风暴时基本上不受影响，这样也就大大增强了整个公司股票的抗跌能力。

具体地说是，1994年该集团和记黄埔港口公司成立后，很快就在全球经营30个港口，营业额占集团总营业额的17%。在索罗斯的冲击下，香港楼市缩水一半以上，和记黄埔的地产和电讯资产缩水也达200亿港元，但由于和记黄埔公司的港口业务和零售制造业务稳住了阵脚，所以始终能够确保整个集团公司有盈利。

索罗斯2009年6月访问中国时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2008年他攻击港元时之所以没能取得成功，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的做法很对。10多年过去后再回过头来看，他的做法并没有错，也没有什么值得内疚的地方，因为这是市场功能决定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斗过”市场。

没有“斗过”市场是什么意思？说穿了还是最通俗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一个市场、一个国家、一种主权货币没有“薄弱”之处，或者“薄弱”之处不够“薄弱”，就不怕受到外力来攻击。

例如，这几年全球清洁技术行业发展很快，各种风险投资纷纷关注该领域，索罗斯也非常看好这一点，这是不是说明这个行业是未来的“薄弱之处”呢？2009年9月索罗斯在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第四次气候变化谈判会议时公开表示，他将投入1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技术。他说：“这次的投资会十分谨慎，不仅要取得盈利，还要力争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或许，这条金融大鳄从中嗅到了什么？

怎样从薄弱之处撕开投资缺口？索罗斯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抓住“最佳和最差”两头

投资有各种方法，索罗斯喜欢从宏观经济、社会分析出发，在全球范围内对某个行业或企业的“两头”进行投资。

通常的做法是，他会在某个行业中选择一家最优秀的企业和最糟糕的

企业进行投资，忽略其他企业。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套头”行为，可是索罗斯的本意不在于套头，而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两种股票都会有较好的业绩表现——最优秀的企业当然会因为其经营业绩好，给股东创造不菲的回报；可是最糟糕的企业一旦浪子回头，其业绩增长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索罗斯要赌的正是这种“浪子回头”。

全球对冲基金行业中的领先出版物《阿尔法》杂志，每年会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年度最赚钱十大对冲基金经理”榜单，索罗斯及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以年收入 29 亿美元位居 2007 年第二位，主要依靠的就是这种投资方法。

二是专门投资不稳定状态

索罗斯认为，投资市场上永远存在着不稳定状态，只有在这种不稳定状态中抓住时机买入卖出，才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获利回报。

而对这种时机的把握，关键在于寻找超出投资者预期的市场发展趋势，在超越投资者预期的时候进行操作，在这种预期与现实差距缩小（势态得到控制）的时候（金融市场上称之为“盛衰”现象）收手不干。

普通投资者对此可以理解为，市场越是波动就越意味着存在机会；当市场波澜不惊时，就暂时休息。这和现实中的表现是一致的。

三是选对投资工具

不同的人应当选择不同的投资工具，索罗斯的工具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是所有投资工具中盈利率最高的，当然投资风险也最大，并不适合所有人，甚至并不适合绝大多数人，但却是索罗斯的最好选择。

因为索罗斯惯于精准判断市场趋势，并且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就好比说，什么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也就很好地具备了驾驭期权、期货、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的本领。尤其是对冲基金可以在多头和空头两面下注，更

让喜欢追求刺激的索罗斯们如鱼得水，畅游其间。

四是恰如其分地选择杠杆率

对冲基金主要是利用杠杆作用来扩大投资收益的，当然，与此同时也会相应增加投资风险。收益大皆大欢喜，风险大则要竭力避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恰当选择杠杆比率是一门高深学问。

索罗斯在利用杠杆率的时候有一个最大好处，那就是不受束缚，因为它是私募基金，这是他在股市中能够快速进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时候对基金操盘手的胆量和坚韧毅力是一个极大考验。因为既要确保投资获利，又要在投资杠杆上保持平衡，确实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自信，特别是做空股市的时候。而这正是索罗斯擅长的。

6

除了做空还是做空

索罗斯在股票操作中最擅长使用做空机制。这种所谓做空机制，说穿了就是：首先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如半年到一年间）慢慢地买入一个国家的货币或股票；然后当这种积累达到足够量的时候，突然在短时间内大肆抛售，这样就必然会形成一种市场恐慌，当大家纷纷加入到这种抛售行列中时，汇率或股票价格就会直线下跌。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银行会出面进行干预（主要是大肆买入），但由于这种恐慌性抛售所向披靡，即使动用国家力量也无法阻止其下跌，最终容易出现货币或股市崩溃的局面。而到了这时候，索罗斯等投机基金再出面进行抄底，以最低价格买入这些货币和股票；等到汇率或股价出现回升时，就表明这种投资可以赚钱了。

当然，索罗斯除了从中赚钱以外，更能享受到一份刺激和“阴谋”得逞后的满足。虽然这种操作手法对大多数人来说风险太大，可是由于索罗斯预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胜算率高达十之八九。

例如，索罗斯卖空股票的一个经典案例是：为了达到卖空目的，他在雅芳化妆品公司股价 120 美元时，借入 1 万股该公司股票，一段时间过后该股票价格开始狂跌，索罗斯在两年后以每股 20 美元的价格买回 1 万股用于归还，每股净赚 100 美元，合计 100 万美元，两年间回报率高达 5 倍。

当然，这只是一种最简单的描述，实际运作过程和情形要比这复杂得多。尤其是索罗斯更习惯于采取立体战略，即同时动用各种金融工具用于投机性冲击，只要运用得当，它的破坏力更强，收获也更大。

具体地说，这种立体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一是利用即期外汇交易在现货市场上发动攻击

例如，利用现金和银行贷款或离岸市场融资，大量买入某种货币（当然主要是弱势货币）如泰国泰铢，等到手里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就对外大肆抛售，换取其他强势货币如美元或日元。

这种大肆抛售一定会引发跟风，从而形成市场恐慌，反过来引发更大的恐慌性抛售，促使泰铢大幅度贬值。

等到泰铢贬值到一定程度、跌无可跌时再逆势操作，大量买进。这样就不但扰乱了正常货币秩序，而且可以乱中取胜。

二是利用远期外汇交易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发动攻击

例如，索罗斯可以通过向当地银行购买大量的远期合约，卖空某种远期弱势货币如泰铢。这时候的泰国银行为了规避投资风险，一定会想方设法轧平货币头寸，在现货市场上出售泰铢以换取外币，而这就又对索罗斯的卖空泰铢远期合约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等到泰铢大幅度贬值后，索罗斯就可以用到期日相同、金额相同的泰铢多头远期合约，对前者进行对冲；或者在泰铢到期后，在现货市场上用外币换取泰铢进行交割。

通过这样的远期合约操作，索罗斯可以从中大获其利。

三是利用外汇期货和期权交易在市场上发动攻击

这种操作手法和远期外汇交易比较相似。

四是利用货币当局的干预进行投机

例如，索罗斯在发动对某种货币如泰铢的攻击时，泰国政府当局必定会入市进行干预，以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确保泰铢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制度。其主要方法有二：一是积极买入泰铢，吸纳市场流通量，促使泰铢汇率回升；二是提高短期贷款利率，实际上就是想要提高投机者的投机成本，让它们知难而退。

而这时候的索罗斯，正可以利用这种政府干预机会，在泰铢汇率被抬高的同时，利用利率互换合约，用固定利率来换取浮动利率，获取其中的差价。与此同时，由于本币利率上升会从股市中抽走资金、引发股市下跌，索罗斯还可以通过做空泰国股票牟利，一举两得。

上述几种手段同时使用，其杀伤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上述各种方法中又有许多具体运用技巧，这里不再展开，可以说，其中许多学问一辈子也学不完。

在对冲基金做空操作时，不得不着重提到金融政策，尤其是其中的利率杠杆。由于金融炒家运用的是高杠杆操作方式，所以对利率、汇率的变动十分敏感；利率和汇率变动对他们的最终获利也有直接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利率或汇率变动并不是单向的，所以索罗斯等人在这方面会受到双重影响：做得好可以左右逢源，弄得不好也会两面受挫。

举个例子来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金融管理局通过提高港元利率来捍卫港元，这对金融炒家来说既是利好消息，也是利空消息。换句话说就是，金融炒家在这种港元利率提高中既能获利也会造成亏损。

具体地说，在港元利率提高过程中，卖空港元的炒家会受到打击。因为对于大多数金融炒家来说，要想狙击港元，手中原本没有港元或者原来拥有的港元规模不够大，所以这时候必定要借进港元来卖出，即用美元来买入港元然后卖出。这样对于他们来说，手中借用的港元很多，这些港元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当然是要付利息的，而现在港元利率提高了，炒家的炒作成本也就相应上升了，获利空间减少了。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为什么说港元利率提高对炒家来说也是一种利好消息呢？原来，这些炒家采用的是立体战术，既涉及港元即期买卖，又涉及港元期货合约买卖。

在港元期货合约买卖中，这两种货币一共涉及四个“率”。例如在炒作港元时，就必然会涉及港元和美元的四个“率”，这就是港元和美元的即期汇率、远期汇率、即期利率、远期利率。

如果这四个“率”之间彼此保持一种平衡关系就没什么问题，否则就一定会存在着套利机会，也就是有可能让投机者从“买低卖高”中获取差价。当然，这种“买低卖高”行为又会反过来调整过去的不均衡关系，从而使这种套利机会慢慢缩小甚至消失。

所以在金融学上，一般要求能考虑到三个月期的这四个“率”能保持一种均衡关系，时间再长就不容易看清楚了，这一理论在教科书上称为“利率平价说”。因为这种均衡关系的存在，所以，如果知道其中的三个因素就可以推导出第四个因素，像通过计算公式一样算出来。

例如，如果现在知道三个月期的美元和港元即期利率、美元兑港元的即期汇率，那么就可以从这种均衡关系中计算出远期汇率“应该是”多少，这种远期汇率称为“隐含远期汇率”。意思是说，这是一种“锁定价格”。不过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并不一定就是三个月后的实际即期汇率。

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现在拿 100 港元去换美元，可以换到多少美元，然后把这些美元存入银行，三个月期的本利在理论上就应该是这 100 港元本利和可以换到的美元数额。后者的汇率就“应当”是三个月期的远期汇率。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港元利率提高了（美元利率并没提高），这时候就会促使金融炒家改变操作方式：不在即期市场炒卖港元（因为这时候即

期市场上炒作港元的成本提高了)而改为在远期市场上炒卖(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现在不用支付现款,可以把这种利率提高的操作风险向后推迟三个月。如果到时候港元贬值了,他就从中赚钱了)。

那么,这种港元利率提高除了迫使炒家推迟交割时间以外,还能从什么途径获利呢?这里面的花样还是很多的。

举个例子来说,就在港元利率提高的同时,两个月期、三个月期、六个月期、一年期的远期汇率也会发生相应调整。假如现在一个月过去了,炒家完全可能会在这时候买进两个月期的远期港元合约来对冲原来卖出的三个月期的远期合约(这时候因为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所以买入的这两个月期与原来卖出的三个月期合约到期时间相同)。在这样的一买一卖之间,炒家就很好地锁定了投机利润,因为采用杠杆交易,所以投机利润还可能非常可观。

在这里,远期合约价格与即期价格之间是密切相关的,金融炒家在炒作远期合约时,打击的实际上是即期市场价格,可以起到声东击西的作用。

举个例子来说,金融炒家在卖出远期港元合约时,对手(通常是银行)需要从即期市场上买进美元以备将来支付之用。而大家都在买美元,美元利率就必然会被抬高,港元利率相应被压低,港元利率压低了,吸引力就会减弱,从而引发更多的人抛售港元;而这时候香港特区政府要想保持港元稳定,就会提高港元利率,而这又正好上了卖出远期港元合约的金融炒家的当。

容易看出,这里面的关系可以说错综复杂,一般人听听就要听迷糊了,更谈不上实际操作。可是对于索罗斯这样的投机高手来说,他们最擅长这一行,并且自身拥有或者至少能动员庞大的基金规模一起来搅动这个市场,所以胜算把握是很大的。

7

心狠手辣是逼出来的

索罗斯在全球金融界颇具破坏力，这使得他在1994年时就被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为“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想想也是，你索罗斯既然具备洞察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和货币体系的能力，知道哪些地方存在漏洞，为什么就不去善意提醒他们进行弥补，非要发动货币攻击致他们于死地，然后自己大捞一票就走呢？这不是有点像电脑黑客吗？真是“坏孩子”。

其实，只要了解索罗斯的成长经历，读者就会认可这样一种观点：索罗斯之所以成为“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完全是环境逼出来的。索罗斯童年有过两次逃脱纳粹铁爪的经历，这使得他一辈子都特别注重逃避毁灭性打击。他直言自己的最高投资技巧就是“侥幸逃脱”。

索罗斯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为人懒散，可是家庭条件十分优越，而且性格坚强、处事精明，曾经创办过全球唯一一本世界语文学杂志。他从小就教育索罗斯要自尊自重、自强不息，并且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去对待财富，这些都对索罗斯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小时候的索罗斯与同龄人相比各方面非常突出，成年后的索罗斯直到现在，身上依然保持着上述优秀品质。

从下面这件小事上，大概就可以看出父亲是怎样培养索罗斯的。有人甚至说，索罗斯后来之所以能在金融界取得辉煌成就，与小时候父母对他的“放任自流”教育是分不开的。

194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平生贪图享受、不管有钱没钱每年总要出去旅游的父亲对索罗斯说，下个星期天准备去阿尔卑斯山滑雪，问索罗斯是不是愿意去。索罗斯一听高兴极了，当时就欢呼雀跃起来，可是父亲泼冷水说，现在还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就是他自己先到达目的地，然后索罗斯必须自己想方设法赶到那里去会合。

11岁的索罗斯担忧地说，我这么大的人一个人去能行吗？父亲果敢地说，没问题，这是对你生存能力的一次考验。不认识路，你可以查地图或者问别人，路费我来出，但你必须在限额内使用。

就这样，索罗斯想方设法搞到一张去阿尔卑斯山的旅游地图，查到目的地所在位置，然后确定最佳行动方案，硬是一个人背着旅行袋和滑雪板走出家门，坐了4个小时火车才到达目的地，与先期到达那里的父母和哥哥会合。

从家里到火车站坐车，下火车后独自去一英里外的宿营地寻找父母，路上的各种经历对索罗斯来说既好奇又刺激，这对索罗斯日后的性格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话说1944年，随着纳粹德国对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侵略，索罗斯的幸福童年也宣告结束了。索罗斯的父亲不得不通过贿赂官员，给全家弄到一张“非犹太人”的假身份证才幸免于难，从此全家人开始逃亡生活，最终迎来了苏联红军的解放。

成年后的索罗斯说，他一点也不喜欢苏联帮助建立的匈牙利，反而非常怀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那段时光给他带来的“锻炼”和“刺激”，因为这让他从中学到了面对生死危难如何生存下去的技巧。

因为就在他张开双臂迎接苏联红军到来后不久就发现，他原来喜欢的冒险行为和推崇的投机行为不仅受到限制，而且还遭到严厉打击。这也是他在父亲怂恿下，下决心要去英国伦敦寻找梦想的主要原因。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表明索罗斯从小就具有的这种冒险心理，对成年

后的他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国际投机领域敢打敢拼是一大帮助。他自己也确实这样说过：这两段经历对他的整个投机生涯都非常有帮助，具体地说是两点：一是不要怕冒险，二是冒险时不要孤注一掷。

也正是从这种危难经历中索罗斯得出结论，一定要坚定地奉行“开放社会”。这也是他发达后成立名叫“开放社会协会”的慈善团体，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开展慈善事业，每年捐赠额在 4 亿美元以上，总捐赠额超过 80 亿美元的主要原因。

1947 年，索罗斯离开匈牙利去西方国家寻求发展。

在战争年代，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是人们少得可怜的娱乐活动之一。为了寻找一条生路，索罗斯家有个亲戚在英国，所以父亲就“砸锅卖铁”凑足路费送他去英国找找机会。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选择是对的，否则也就不会有现在震惊世界的索罗斯了。

索罗斯首先来到瑞士的伯尔尼，然后很快就到了英国伦敦。结果他发现，伦敦不但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简直是走投无路。

他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父亲虽然有时候也会寄来一点点小钱，但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索罗斯每天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没有任何乐趣。

这时候，前几年在战争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求生本领很好地帮助了他。他决定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认为只有这样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索罗斯 18 岁时，在英国主要从事铁路搬运工、餐馆临时工、旅行社推销员、人体模型组装工、农场工人、苹果采摘员、家庭油漆匠等工作。

读到这里，读者仿佛能看到索罗斯像今天的城市外来工一样，在一张硬纸板上用毛笔写上几个字，摆在路边等待雇主雇佣。事实上，当时的索罗斯也确实是这样，常常要一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以至于成年后的索罗斯回忆那段经历时说：“在英国的第一年是那么的悲惨，相比之下，1944 年倒是不错的一年。我吃得非常差，我甚至嫉妒房东的猫，因为它不愁吃穿，它有沙丁鱼吃，而我却没有。”

容易看出，这段沉沦的底层经历对索罗斯日后的事业发展和性格形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要知道，在农场打工时他甚至还因此组织了一次集体罢工，迫使农场主改按天计酬为按劳计酬，他和其他雇用工人的收入都由此有了相应提高。

1953年，索罗斯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出去找工作，就像今天的大学生一样，要想找到一份理想工作谈何容易？当时的索罗斯非常贫困，家里常常寄不来钱，所以只有尽快找到工作才能解决基本生计问题，而他能找到的第一个工作，居然只是去旅游胜地销售手提袋。一个外国人，说话又不利索，又没有英国绅士派头，跑推销是十分困难的。

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切身感受到提高收入的重要性。他想，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如果能进入伦敦投资银行才算不负自己所学。可是在当时的伦敦金融界，找工作同样是需要“拼爹”的。索罗斯没有背景，找不到工作，所以只好去做商业批发站的业务代表，后来终于有机会进入一家匈牙利人管理的金融公司，但最终还是被解雇了。

无奈之下，他决心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来求职。其实，他也只剩下这条路了。他写了许多封求职信，分别寄给伦敦市所有的投资银行，并且不知天高地厚地在信封上写着“总经理亲启”。这在当时可是新闻，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会给自己不认识的人这样写信。

终于，有两位总经理愿意见他。其中的一位与他见面只是为了告诉他，索罗斯把他（总经理）的名字拼错了。而另一位总经理则出于好心，实事求是地对索罗斯介绍了一下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当时伦敦金融圈里流行一种“聪明裙带主义”，即每位总经理总喜欢从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中物色对象，其中总会有一位有前途的人脱颖而出成为下一位总经理的；如果索罗斯与这“下一位总经理”关系很好至少是同一个大学毕业，就业希望就大了。可现在的问题是，你（索罗斯）连英国户口也没有！

后来，索罗斯由此得到启发，通过一位在伦敦当眼科医生的表哥介绍，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去了一家银行做实习生。索罗斯感到欣喜若狂，因为这不但能摆脱他长期以来的贫困，更能切切实实开始金融生涯了。

后来的事实证实，索罗斯在这家名叫辛格 & 傅利兰德公司（Singer & Friedlander）的实习经历，对奠定他的一生确实非常有帮助。

毫无疑问，索罗斯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在黄金股票套汇交易岗位上如痴如醉地工作着，但工作业绩乏善可陈。幸亏这家公司总经理也是匈牙利人，频频念及同胞之情，才对索罗斯照顾有加。

渐渐地索罗斯在工作中发现，他对利用差价获取套利越来越感兴趣，并且练就了在不同市场赚取差价的专长，很快他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积蓄。

不用说，“翅膀长硬了”的索罗斯虽然这时候依然充满理想色彩，但已经不再满足于原来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了。说穿了，这时候索罗斯的身份是“储训人员”，每天的工作只是登记银行进出款项，把账单记录在一种很大的平板上，仅此而已。而索罗斯本人呢，则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到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纽约去闯一闯。

有人开玩笑说，当时的伦敦金融界肯定没想到，就是这位小子在 36 年后杀回英国，通过成功狙击币值高估的英镑，迫使英格兰银行乖乖地投降，最终退出欧洲共同体汇率机制。这算不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如果当初他不是伦敦走投无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一切。所以，索罗斯成功狙击英镑，实在是被英国逼出来的。

所以，索罗斯从来不承认自己对攻击英镑有什么负罪感，相反却从中总结出一套人与市场相互作用关系的原理。他的原话是：

我认为应该理解一个股市个体参与者的影响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你正确地理解、预测形势的发展时，你就可以对其施加影响。你预测到了股市发展的轨迹，就可以提前进入此轨道，但却千万不能逆势而行。以英国的危机为例，当英国推出汇率机制的时候，我提前预估到它的退出甚至促成

其退出……即便我没有出生或者我根本不存在，英国依然会退出汇率体系。因此，实事求是地说，我并非促成那次危机的罪魁祸首。然而我确实加速了事情发展的进程，这就是影响市场的方式。这也是你影响市场唯一的方式。当你尊重市场规律时，人们会听你的，你也能短暂地对市场施加影响，即便你是错的。当然了，你错了好几次以后，人们最后就不会再听你的了。这就是市场被影响的方式。

终于，索罗斯在同事的介绍下，于 1956 年 6 月来到美国纽约，靠自己仅有的 5000 美元积蓄打天下，从此走出了一条辉煌之路。

到了纽约后，索罗斯顺利进入同事为他介绍的一家名为梅尔公司的经纪公司。这时候的索罗斯制订了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在这里不多不少干 5 年，把自己的 5000 美元积蓄增值 100 倍变成 50 万美元，然后再回到英国从事独立的哲学研究工作。若干年后他解释说，之所以准备干 5 年，是因为他“对美国并不是特别喜欢”。

索罗斯进入公司后很快发现，当时的美国市场和英国市场相对割裂，索罗斯来自英国，而纽约则急需这样的人才。所以索罗斯被分配专门负责黄金和股票套利操作，兼做欧洲市场分析。由于这时候的美国投资者基本上不了解也不关心欧洲市场（当然，欧洲市场的投资者也不了解美国市场），这给他在工作中崭露头角提供了极好机会。也就是说，这两个市场当时是相对独立的，这样，无限商机就全给了见缝插针的索罗斯。

套利交易在今天已家喻户晓，可是在当时却很少有人涉足，没有人愿意投入大额股份在这方面进行投机。所以，当时的索罗斯进行的黄金和股票套利，差价其实很小，必须小心翼翼地吃准市场，才能从这种差价很小的高抛低吸中获得差价。这既是一件坏事也是一件好事，索罗斯正是从中锻炼出了一大长处：吃准市场、擅长市场分析和精准判断。而这也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全球最伟大的投资家的基本功。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索罗斯在工作中充分施展自己熟悉英国市场的特长，为公司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索罗斯进入公司后一个月，就爆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并最终出现流血冲突，引发埃及、英国、以色列、法国之间的战争。战争使得苏伊士运河无法正常通行，石油运输需要绕道而行，这样成本就提高了。索罗斯利用他在英国的关系匆忙入市，寻找在欧洲市场的投资机会，因为两地时差的关系，他几乎夜以继日地关注行情，一刻不敢懈怠。几个月的疯狂工作，索罗斯给公司创造了丰厚利润，他自己也站稳了脚跟。

1960年，索罗斯利用自己的特长，第一次对国外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当时有一家德国安联保险公司的股票，其房地产投资业务增长很快，而德国阿利安兹保险公司正在大量抛售安联股票套现，于是索罗斯建议大家不妨购买阿利安兹的股票，等待它的股价上涨。可是由于美国人对欧洲市场不了解，所以应者寥寥，只有摩根担保公司、德雷福斯非常赞赏索罗斯的观点，大量买入了阿利安兹股票。这件事情让阿利安兹公司董事们很不高兴，他们写信给索罗斯的领导，说索罗斯得出了错误的判断。

不用说，最终的情形正如索罗斯分析的那样，阿利安兹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扬了3倍，索罗斯的名声一下子就在业内传播开来。

1963年，索罗斯跳槽到一家名叫爱霍德·布雷彻尔德的美国公司担任分析员。该公司主要经营外国证券贸易，非常符合索罗斯的特长。由于索罗斯熟悉欧洲市场，在欧洲有自己的联系渠道，并且又会讲多种欧洲语言如法语、德语等，这使得索罗斯很快就在该公司脱颖而出，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佼佼者，1967年就担任该公司研究部主管了。

在此期间，索罗斯的投资才能日益显露，为该公司赚了不少钱。

与其他所有恃才傲物的人一样，这时候的索罗斯开始飘飘然起来，觉得“工字不出头，老板才自由”。虽然自己已经成为公司顶梁柱，又怎么样呢？如果自己单干，一定会比这好得多。

一方面是有了这样的念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索罗斯在此期间结识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合作伙伴罗杰斯。于是两人在 1969 年共同创立了双鹰基金（量子基金的前身），给索罗斯纵横疆场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舞台。

晚年的索罗斯虽然听力下降了，可是记忆力非常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依然记得很清楚，他一生都感谢他的父亲，那个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里逃出来的年轻人。是父亲教会他如何在恶劣环境下应对风险、不按牌理出牌。

尤其是当索罗斯回忆到父亲在他 14 岁时拿着伪造的身份证，带领全家在德国纳粹封锁线里穿行的时候，他说，那种刺激是他一生投资生涯中所未曾有过的。他开玩笑说，这时候他身上绑着的黄金和外汇，是他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8

意外学到的思维方式

索罗斯 1947 年只身去了英国后，条件相当艰苦。可是他并没有在沉沦中堕落，而是选择在沉沦中爆发。更由于在上大学期间他读了导师的一本书，进而班门弄斧切磋探讨，掌握了他一生受用的“哲学思维方式”，奠定了后来他在取得巨大的投资成功后，更希望别人把他当做“哲学家”和“慈善家”的理论基础。与其他投资家相比，索罗斯的“理论水平”更高。

在伦敦那些非常艰苦的日子里，索罗斯懂得了赚钱的重要性，也学会了怎样“理财”——他规定自己每星期的花销不能超过 4 英镑，并且每笔开支都记账，无论生活怎样艰苦，都要坚持自学，希望通过升学来改变命运。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复习，索罗斯学完了所有必要的文化课程，于 1949 年考上伦敦经济学院。从此，他的命运真的发生了转折。

索罗斯为什么要选择报考伦敦经济学院呢？除了这所学校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地位仅次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经济学院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工作，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虽然他读的是他特别喜欢的哲学专业，不是最热门的经济专业。

在大学里，索罗斯师从 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米德 (John Mead)。不过在索罗斯看来，他并没有从米德身上学到什么有用东西，相反却更喜欢另一位自由哲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1902—1994) 的课程。

所以，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用了两年时间修完三年课程后，最后一年集中选修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课程，这激发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写下了许多篇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名哲学家。波普尔鼓励他要学会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这对索罗斯一生的影响极大。

当时的情况是，索罗斯在阅读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非常赞同他的观点。

波普尔在该书中说，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成为“封闭”社会，即所有人只有同一个信仰；二是成为“开放”社会，人们可以拥有各种信仰，并且这些信仰可以相互包容。波普尔认为，无论如何，开放社会总比封闭社会更先进，虽然它同样具有更多的“不确定和不安定”。

读了这本书后索罗斯决定要见见波普尔这个人，以便能够学到更多东西。这就像钱钟书所说的那样，在吃了鸡蛋后，他还想看看下这只蛋的老母鸡。于是，索罗斯带了自己撰写的几篇论文去找波普尔，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波普尔于是成了索罗斯的指导老师。

1994年，92岁高龄的波普尔在回忆当时两人第一次见面时依然记忆犹新。波普尔说，当时索罗斯走进他的办公室说，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希望能和他谈谈。通过交谈，波普尔发现索罗斯很机灵，并且自己写的那本开放社会的书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后来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探讨。

波普尔说，每次他总是听索罗斯说，并不向他提出任何问题，所以索罗斯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不过，虽然他不是索罗斯的正式导师，索罗斯后来一直称他为指导老师，表明索罗斯对他是很友好的。

而索罗斯是怎么看的呢？索罗斯认为，波普尔对他的最大影响在于鼓励和启发他思考世界运行的方式，并且尽可能地提出有助于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哲学图式。虽然初看起来哲学并不是现实世界中寻找发财之路的地图，但是他却从中学到许多关于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而这是他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后来，索罗斯正是不断运用波普尔所教的思想，

在东欧和苏联进行慈善活动，把它作为加速这些地区“社会开放”的理论来源。

1987年4月，在我国武汉召开的卡尔·波普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索罗斯提供了一份名为《我与卡尔·波普尔》的书面发言，其中就谈到他在大学读书时波普尔对他的哲学影响：揭示了人类认知活动所具有的那种本质上的不完备性；索罗斯独特的哲学理论（反身性原理）就是在波普尔哲学基础上的进一步突破。

索罗斯后来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多次表示，他的职业生涯前期“完全没有用到大学学习的任何知识”，在职业生涯中后期用到的主要是大学最后一年培养起来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使得他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金融市场上那种非理性和反身性。

换句话说就是，索罗斯的一生中基本上不相信什么现代金融学，他所取得的成功可以看做是对现代金融学理论的一种嘲讽。所以，他的反身性学说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反身性本身就意味着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

反身性理论是索罗斯最主要的投资理论，对于读者来说比较难理解。所以这里做一简单介绍。

索罗斯所说的反身性，其英文是 Reflexivity，是指投资者和市场之间发生的一种互动影响。

索罗斯认为，投资者要想“正确”认识世界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偏见”进入市场，所以，你如果要想了解金融市场的动力，关键是要了解投资者都具有哪些“偏见”。如果这种“偏见”只是一部分人具有，那么它的影响力就比较小；可是，因为不同投资者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当这种“偏见”变成“流行偏见”时就会成为一种主导观念，在市场中产生羊群效应。

而这时候索罗斯的做法是，他会在将要“大起”的市场中投入巨额资本引诱投资者共同地狂热买进，把本来属于一小部分人的“偏见”放大成

为“流行偏见”，从而顺手牵羊掀起羊群效应，带领价格走向疯狂。而当行情即将崩溃之时，索罗斯再带头抛售做空市场。因为在市场到达顶峰时总是不堪一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恐慌性抛盘并进一步加剧市场下跌直至崩盘。这时候索罗斯就可以从这种大起大落中赚取巨额投机差价。

从实践中看，索罗斯的主要投资获利，确实是利用这种反身性理论来寻找市场与现实的脱节，从而掀起惊涛骇浪，直接冲击一国金融市场，从中浑水摸鱼。

当代学术研究认为，索罗斯的这种反身性理论既没有办法证明它是正确的，也没有办法证明它是谬误的，只能说索罗斯把这种理论运用在金融投资实践中“所做的预测大多数是成功的”。或许，索罗斯称他这种理论为“金融炼金术”，本身也多少表明这些理论是注定充满神秘色彩的。

言归正传，可惜的是，由于索罗斯当时家境贫寒，急需要用钱，而波普尔也一再劝说他不要放弃自己的前途。因为在波普尔看来，索罗斯的祖国匈牙利本身就是个封闭社会，索罗斯的家庭又根本支持不了他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继续研究“开放社会”理论，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先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工作或金融工作更实惠，这对他来说是最有用的。他相信，凭索罗斯这样的勤奋好学，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

但索罗斯显然并不死心，毅然去了一趟犹太人救济委员会。对方说救济金只能发给失业人员，学生不在这个范围内，可是对于索罗斯来说，学生同样没有工作，同样需要得到救济。但这不是他说了算的事。

后来他勤工俭学去当铁路搬运工，一不小心折断了腿，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他总算“不是学生”身份了，所以强忍着去救济委员会讨一口救济粮吃。

他拄着拐杖，夸大其词地说自己已经陷入绝境（实际情形也差不多），才终于得到一点帮助。这既反映了他在1944年全家逃难时学到的狡黠和智慧，又使他更加看清了现实：赚钱要紧，不能继续读书了。

或许，这段经历也是他后来决心从事慈善事业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亲身体会到那些绝望的穷人是什么滋味，他决心要帮这些穷人一把。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索罗斯说：“我宁可帮错人，也不能只做那些官僚的表面工作。”随后，他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一系列慈善机构，致力于推动开放社会和帮助别人。

顺理成章地，索罗斯听从老师的意见，把经济和金融行业确定为自己的就业方向。当时的索罗斯曾经因为贫困几乎辍学，但他求学若渴，并且还写了一本名叫《意识的重负》的书稿，只是还没写完就不得不搁置下来。这正应了一句俗话：“无论理想多么丰满，现实是单薄的”——面临毕业，他必须首先找到工作养活自己。

更何况，当时他就对这部书稿内容很不满意，写完后就马上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扔在了那里。

1961 年 1 月，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上台后修改了利润平衡税条例，阻止美国投资者购买外国股票，这对专门从事欧洲股票交易的索罗斯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所以这时候 31 岁的索罗斯又重新点燃了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他从 1961 年开始，每天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用来修改《意识的重负》，希望能把它正式出版。

一连修改了 3 年，直到 1963 年他仍然感到不满意，连自己都觉得不知所云，但还是把书稿寄给了波普尔教授。他想，如果能得到这位全球著名哲学家的肯定，或许书稿离出版就不远了。

可是，当时 61 岁的波普尔收到书稿后已经想不起来索罗斯是谁了，但依然热情地进行了回复。当他后面得知索罗斯不是美国人，而是来自共产党统治的匈牙利时大失所望，所以只是敷衍索罗斯继续探索下去。而这时候的索罗斯已深深知道，从事哲学研究这条路他无论如何是走不下去了。

正因如此，索罗斯一辈子以“失败的哲学家”自称，并为此感到自豪。有一次，他甚至把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讲座题目就定为“失败哲学家的再次

尝试”。而在《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一书中，索罗斯干脆单写了一章，名为“失败哲学家自传”。直到 70 高龄后，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在哲学上有所建树，梦想别人在称他“投资家”、“慈善家”的同时也能叫他一声“哲学家”，并且他把后者看得很重。由此可见，人的理想是不灭的。

不过用今天的眼光看，索罗斯的这种哲学素养在他一生的投资生涯中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擅长用严谨的哲学思维来思考全球政治经济时局变动及其内在规律，缔造了现在的索罗斯。

9

换个角度坏事也是好事

最让索罗斯背负骂名的是引爆了亚洲金融风暴，人们说他是“纵火犯”、“害人精”，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好像如果不是他的出现，原本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繁荣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确实，如果单从亚洲金融风暴所造成的损失看，的确十分惊人。例如从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这半年时间里，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货币的贬值幅度高达30%至50%，情况最严重的印尼盾贬值幅度更是在70%以上。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也高达30%至60%。

仅仅从汇市、股市下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看，规模至少在1000亿美元以上；更不用说，受汇市、股市下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经济衰退。

可是辩证法告诉我们：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或者，同一件事情换个角度看，坏事就也是一件好事。亚洲金融风暴也是如此。

以索罗斯最早“开刀”的泰国为例。当时的泰国经济确实一片繁荣，可是这种经济繁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泰铢与美元汇率保持固定的同时，泰国国内在悄悄地增发基础货币，用货币发行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并不是没有水分，相反水分很大。

从索罗斯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诚信行为，这种做法很容易诱发国际游资攻击，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他决心要从这里开刀，给以

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一点颜色看看。

具体地说，假如这时候的美元没有增发货币，只是泰铢在增发，那么在泰铢和美元这两种货币所构成的闭合圈中，美元是诚信方，泰铢是不诚信方。美元保持相对稳定，与泰铢相比会产生相对升值（相对而言是泰铢贬值了），而与泰铢以外的其他货币（假定它们都没有增发的话）也会保持相对稳定态势。这很符合“好人有好报”的基本原则。

拓展开来说，如果这时候美元也在增发货币，或者全球其他国家都在增发货币，这时候美元和泰铢以及其他货币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对于这种不诚信对不诚信的货币关系，一般来说，总是相对弱势的货币保持与强势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以此来避免汇率波动，避免金融危机冲击；相反，相对强势货币则会把这种波动影响传递给其他弱势货币，从而在全球掀起汇率波动，传递金融危机。

索罗斯对此原理可谓烂熟于心，并且运用得恰到好处。

索罗斯 1997 年点燃亚洲金融风暴首先从泰国开始，就是看到了泰国货币政策中的不诚信行为。靠多发货币刺激经济，必定会是虚胖，汇率必然要下降；如果不下降，在这其中就会有机可乘。

索罗斯正是看中这一点，发动了对泰铢的攻击。因为索罗斯清楚地看到，按理说当国内政府需要增发货币时，应当同时通过国际金融汇率调整来对本国货币进行相应贬值。可是泰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依然保持着固定汇率，用国内“含水率”过高的货币欺骗别国，与含金量不变的国外货币进行交换，然后用这种国外货币采购国外商品，实际上就是在“非法获得”国外的劳动成果。在索罗斯看来，这是一种市场商品交换中的极端不诚信行为，理应受到打击和教训。

可以看出，这时候索罗斯认为自己攻击泰铢并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捣乱”、“破坏”，相反还颇有一些“替天行道”的味道。当然，不仅仅是索罗斯，其他国际金融炒家大概也都有这种想法。这不是他们的观点有问题，而是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就必然会有这种新发现，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屁股决定脑袋”、“思路决定出路”。

在这次行动中，索罗斯一方面通过地下钱庄偷偷地暗中购买泰铢；另一方面，利用泰铢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公开进行抛售，换取美元，轻而易举地就把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掏得一干二净，直至在货币交换过程中出现现金链条断裂。

现金链条断裂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泰国政府的货币交换市场面临崩溃，这无论对泰国经济还是政治都构成一种致命打击。所以，泰国政府绝不允许这种情形出现。这时候的泰国政府要竭尽全力维护货币交换市场，在所有“弹药”都用完的背景下，才不得不于1997年7月2日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从而彻底引发亚洲金融危机。

对此，索罗斯并不认为自己在点燃亚洲金融危机中有什么负罪感。他说，如果不是他进行炒作，亚洲金融危机照样会发生。这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如此。

因为目前的全球资本运作已经浑然一体，在这个多种货币流动所构成的全球货币体系大循环中，必然会有一部分货币存在上述“不诚信”行为，从而出现类似于上面泰铢这种易受攻击的局面，产生局部现金链流动危机；这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又会导致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

从这个角度看，亚洲金融危机确实不能算是索罗斯引爆的，至多只是索罗斯最早发现了这其中的漏洞，进而走上去把这个漏洞撕得更大，引发更多的人集体攻击，最终打开了一个巨大缺口，推倒了这一面“墙”。

回过头来说，要想避免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消灭了索罗斯就能心想事成，更关键的是要消除金融危机的根源，这就是：要么实现全球统一货币，要么所有国家的货币都必须诚信运作。

显而易见，全球统一货币至少在目前根本不现实；所有国家货币都保证绝对诚信，口头上可以做到，实际上同样行不通，因为这是资本的逐利

本性所决定的。

这样，归根结底就只剩下一句话：在当今世界，要想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本就不可能、不现实。

当然，爆发金融危机也不是多么可怕的事。这就像辩证法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通过金融危机的爆发，在资本内部自行调节全球货币体系、生产结构、组织结构、社会结构，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对资本运作规律有一个新的认识，不完全是坏事。

从这个角度看，索罗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好像还是“有功”了呢。

从这个话题引伸开来看，索罗斯在攻击一国货币时并不怎么看好政府护盘，这一点与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或许他认为，既然“苍蝇”现在已经在“叮”这只鸡蛋了，那么这时候把这只鸡蛋的“缝”人为地进行弥补，至多不过是亡羊补牢的马后炮。

以股市为例，不仅索罗斯如此，全球著名经济学家中大多数也不赞同政府干预股市，认为股市运行有其自身规律，政府不应当动不动就出面护盘，这种帮忙其实是在“帮倒忙”。

而索罗斯对此的态度显得更为复杂。他一方面希望有一个给力的国际金融组织能够出面解救崩溃中的股市，但他又从来没有明确支持过各国政府介入。

总体上看，索罗斯认为混乱的股市是政府扶不起来的，这时候的政府干预往往不会取得效果，并且还会给像他这样的金融炒家创造投资良机。

从历史上看，索罗斯从这种干预中可谓获益匪浅。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首先是泰国中央银行出面干预股市，然后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中央银行都在大力护盘，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不但没有收到应有成效，反而使得本国股市更加雪上加霜。

看起来不该出现这样的结果，但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这究竟是哪里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出了问题呢？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当政府护盘动做出现时，往往会被市场看做是一种股市变盘的信号，从而被投资者尤其是国际炒家看做是股市即将走坏的方向标。事实上，当政府出面干预股市时，确实大多面临着出口衰退、债务过高、信用扩张过度等经济危机征兆。

更何况，政府对市场的灵敏度和反应要远远逊于国际游资炒家。在政府出面护盘时，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国际游资已经先头进入股市，就等待着博政府护盘是否成功了。

如果政府护盘成功，这些国际游资就会以较低的买入成本获得预期收益；如果政府护盘不成功，或者至少是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会引起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怀疑和恐惧，大大破坏原来已经遭到侵蚀的政府信用，导致恐慌盘纷纷杀出，引发股市暴跌。

所以能看到，索罗斯总是站在另一个角度，像啄木鸟一样监视着全球各国金融体系中哪里存在着漏洞，像“王海打假”一样把坏事变成好事。哪里有漏洞，他就出现在那里；哪里的漏洞越大，他就越活跃。

对此，曾经多次采访过索罗斯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钢深有体会。他说，当他 2003 年第一次采访索罗斯时，感觉索罗斯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对投资谈得并不多，好像也没有多大兴趣；可是 2009 年就不一样了，索罗斯显得比过去更年轻地，更精力充沛，也更喜欢谈论投资。

在这里，芮成钢其实并没有指出另一点，那就是在刚刚过去的 2008 年，索罗斯在全球顶尖投资家中依然业绩骄人，当年获利 11 亿美元，他正处于一种兴奋中呢。因为这能从一个侧面表明索罗斯“宝刀未老”。

芮成钢在 2009 年的这次采访中发现，针对当时全球一致谴责是美国的私营金融机构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索罗斯就颇不以为然。在索罗斯看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机构在判断市场方面都会产生失误。他的原话是：

人人都有判断错误的时候，这对于金融机构的经理和银行家们来说很普遍。可问题是监管部门也判断错误，因此实际上，必须由监管部门来承担这场金融危机的责任，因为他们未能有效地实施监管。

看得出，索罗斯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哲学高度，他比别人看得更清楚。

10

从现在开始匍匐在香港

1997年的香港并没有受到索罗斯的有力冲击，无论对索罗斯还是香港来说，就都既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坏事。这很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

从香港方面来说，由于在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守住了阵地，所以接下来香港在其他各国纷纷吸取教训的同时，反而放松了警惕。与其他周边国家相比，亚洲金融危机后只有香港依然在衍生经济泡沫（主要表现为恶炒房价和不注重产业成长性），这为下一步香港经济的衰退埋下了伏笔。

读者能够看到，上海迪士尼公园的建设、海南岛免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实际上都在外部一点点抹去香港第三产业的政策红利。而香港本身是个消费城市，如果第三产业不具竞争优势，经济全面衰退就毫无悬念。

经济衰退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就意味着香港的货币港元必将经受一次劫难。从表面上看，这为索罗斯等人发动再次攻击创造了时机；而实际上，这又是国际游资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不是索罗斯，换了其他人同样会这样做。

从索罗斯匍匐在香港的历史进程看，资料显示，索罗斯是在2010年3月24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港元。在该公司9月的股份申请表中，入股资金显示为3500万港元。

而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索罗斯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亚洲办公室是在2010年11月1日获得牌照，11月8日在香港设立的。

媒体报道说，其实在这之前，索罗斯基金亚洲办公室负责人戴舜昕及其团队就已经赴我国大陆考察相关经济情况，并且在北京与我国金融高层见面。这时候的索罗斯基金已经从总规模 260 亿至 270 亿美元中拿出三分之一约 90 亿美元来伺机炒作人民币，我国中央政府对此情况也是大致了解的。由于索罗斯基金香港办公室是他在亚洲的总部和唯一机构，于是据此可以得出索罗斯是在以香港为跳板炒作人民币的结论。

市场一般认为，索罗斯基金划出三分之一投资组合放在香港，可能不完全针对人民币，应该包括整个亚洲的投资在内，但主要是人民币；而索罗斯基金在香港成立办公室也并非就一定就是炒作人民币的标志，因为在此以前他们就在纽约买卖港股如龙湖地产、民生银行等。

但显而易见的是，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有利于接近亚洲市场，更容易获得我国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资讯。据透露，索罗斯下一步还将在北京或上海设立办事处，更加深入内地。

值得注意的是，索罗斯基金亚洲办公室发言人对此传闻拒绝评论，只是说索罗斯基金经常会与不同的人见面，这是“正常的”商业活动。

这种说法虽然无可辩解，却符合索罗斯的一贯神秘原则，不能不提高警惕。尤其是索罗斯本人多次呼吁人民币升值，就更加不得不令人感到其中是否有什么新动向。甚至有人猜测说，索罗斯投资人民币首先是从攻击食品价格开始的，他对我国内地的 A 股以及其他中国概念股、与人民币相关的产品非常感兴趣，更被看做是一种不好的征兆。

因为刚刚过去 10 多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历历在目。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索罗斯就是带领国际对冲基金首先寻找偷袭目标，把巨额资金推入目标国，然后不断往复这种致命循环，等到资产泡沫变得越来越大时再大肆抛售该国货币、卖空各种资产，然后以低价买入，最终获得巨额利润的。

敏感的读者有理由怀疑：索罗斯是不是会故伎重演？

2009 年 10 月 30 日，索罗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科学院演讲时发表了美

国经济“二次探底论”，同时表示从长期来看中国将会成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

而实际上，索罗斯一直是密切关注中国资产的，只是因为人民币不是全球流通货币，他无法大规模投资中国资产而已，所以有时候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例如，当时索罗斯在香港股市整体不看好的内地房地产股中，选择投资了位于重庆的龙湖地产。龙湖地产是重庆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项目遍布北京、上海、重庆、西安、成都等地，主要开发高端房地产。

在国内房地产行业前景不明的背景下，索罗斯勇敢地投入龙湖地产令人捏一把汗，也有人因此怀疑索罗斯会不会看走眼？从历史经验看，索罗斯虽然也经常看走眼，但上述担忧显然是多余的。

索罗斯的理由是，当前的中国还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从城镇化到大城市化还有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不但长期看好中国经济，而且长期看好我国房地产尤其是高端房地产市场。从这一点上看，他的这种投资行为与过去的投资一脉相承。更何况，索罗斯在全球历来有准确判断市场趋势的本领，所以这就更让人觉得他有长远眼光。因为无论怎样判断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走势，他投资的只是专注高端地产的地产公司而已。

正因如此，有许多人猜测这是索罗斯在改变策略，即在人民币还不能在全球自由流通的背景下，改过去单纯的货币投机套利炒作手法为持有单只股票的长期投资，从而坐享人民币升值的丰厚获利。

具体地说是，索罗斯一方面可以在香港市场上直接投资 H 股，采用与攻击英镑、泰铢相同的操作手法，先买入港元计价的人民币资产（H 股），等到人民币升值到预先设定的目标时进行反向操作，卖出人民币，换回美元，落袋为安。另一方面，他也可以通过大型咨询机构取得 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名额进入内地 A 股市场。除此以外，最擅长期期货操作的索罗斯当然还一定会从事固定收益产品交易。

这样的策略改变对索罗斯来说是有利的，也是“迫不得已”的，可是对中国来说并不意味着杀伤力就减轻了。

要知道，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平台，可是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充其量还不到 1500 亿元，如果索罗斯要在香港发起对人民币的冲击，在高杠杆率作用下，轻而易举就可以把无本金交割远期人民币合约价格（NDF）推高，然后从中获取丰厚的回报。对于索罗斯来说，在吸取了 1997 年攻击港元的教训后，这种曲径通幽更不在话下。

简单到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来说，索罗斯如果买入 45 天内人民币升值 3% 的合约，接下来就必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这合约的 45 天内人民币没有升值 3%，那么这时候索罗斯作为无股本金交割远期人民币合约的买入方，只要付出千分之五的期权费就行了，这对他来说是“毛毛雨”，而如果在此期间人民币升值了 3%，那么合约卖方就必须补齐索罗斯所有升值的差价（至少是 3%），通过担保银行以美元进行交割。

初看起来这 3% 或 5% 数额并不大，但在高杠杆率作用下，其获利水平会放大 10 至 20 倍。例如，索罗斯如果购买 1 亿美元的合约，赌输了只要付出 50 万美元期权费，赌赢了则可以获得 300 万美元利润（以人民币升值 3% 计），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索罗斯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概念股了。不但是关注，而且是积极投入。

例如，他 1995 年买入 2500 万股海南航空，开创了海外资本进入内地航空公司的先河；2006 年至 2007 年他大量买入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百度股份；2009 年买入阿里巴巴股份，成为其三大流通股股东之一；2010 年买入中国淀粉 4000 万股，买入四环医药 4000 万美元……

所有这些都表明，索罗斯越来越看好中国概念股，而中国被这只金融大鳄所看好，是喜是忧很难说清，因为谁都知道索罗斯是不讲情面的。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原来是指另有所图，在这里，则是指索罗斯在香港布下重金，其真正意图是从香港入手来做空中国股市、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并且他从 2010 年末开始就已经尝到甜头了。

聪明如索罗斯不会不知道，香港回归中国后，在香港的背后站着的其实是中国大陆。关于这一点，他在 1997 年进攻港元失利后就看得非常清楚，并且可以说有切肤之痛。现在他已经对此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所以决心要先把人民币“搞定”，然后再来“收拾”港元。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实际上，早在 1997 年索罗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后就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只有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出现问题而自己浑然不知时，我们才会对他们发动攻击，以警示他们不再犯错。

正是从这一点上看，索罗斯从 2010 年开始重新驻扎香港，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对人民币的一种窥视。因为香港是自由市场，在香港比我国内地更容易发现人民币系统存在怎样的漏洞。这就是所谓的“洞若观火”。

索罗斯为什么要把目光瞄准人民币呢？从客观上看，除了上面的原因外还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人民币规模大，具有足够的经济体量，便于索罗斯施展拳脚，进退自如。尤其是 2009 年我国广义货币（ M_2 ）的增长速度高达 29.7%，位居全球第一，更是把自己的软肋暴露在索罗斯的炮火射程下，使得索罗斯

牙根痒痒的，恨不得马上就咬上一口。

二是从股市角度看，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已经基本完成对我国 A 股的战略部署，无论是 A 股还是 B 股基本上已经处于历史最低点，A 股的总市值只不过区区 3 万亿美元，这样的盘子对于境外投资机构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随时发动一波行情、捞一票就走，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从楼市角度看也是大同小异。我国房地产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外资，具体地说是这些房地产开发企业上市后纷纷加入以外资为背景的房地产信托，使得房地产信托年收益率高达 20% 以上。所以我们看到，过去房地产价格跌不下去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开发企业不肯通过“薄利多销”来维持资金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外资已经被他们抽离了的结果。

嗅觉异常灵敏的索罗斯对此可谓一清二楚。

就在 2011 年 6 月 14 日我国公布 5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5.5%，创下 34 个月以来新高，远远高于中央银行设定的 4% 目标的当天，索罗斯在美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已经错失抑制通货膨胀的机会，中国经济存在“些许泡沫”，而且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失控”。

从这个观点看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屯兵香港，就很容易看出他的意图其实不在香港，而在于人民币、在于中国经济。而量子基金屯兵香港的这一举措本身就表明，索罗斯已经完成了对人民币做空的布局，索罗斯在等待最佳时机。

虽然从表面上看，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为全球第一，高达 3.2 万亿美元。可是要知道，在这其中实际能够流动的部分不超过 0.9 万亿美元。而根据公开报道的资料，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仅仅布局在香港的规模就高达 1.2 万亿美元，“对付”人民币外汇储备绰绰有余。

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索罗斯的攻击力，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的实践看，都应当保持一份高度警惕。这与索罗斯的个人道德无关，而是国际游资的本性决定的——游资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炒作、在于追逐暴利，而

与炒作什么样的目标物无关。只要这种目标物落入它的法眼，觉得完全符合炒作目标和条件，就会成为它的猎物，这一点毫无疑问。

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从而导致外贸出现持续逆差，就应该到了索罗斯所认为的那种最佳炒作时机了。因为外贸持续逆差，就表明这时候用来对付国际游资炒作的火力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一旦断了这些后援，量子基金的炒作就会胜券在握。

要知道，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利率和美元利率相差不止 10 倍，任何投机资金都不可能忽视这么大的息差收入。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国际游资必定要想方设法进入我国，哪怕进来了不进行投资，也能坐享丰厚的获利回报，这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能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来对冲热钱、降低市场上的人民币流通总量。

可是这也不是什么好办法，因为这样一来会导致新的结构性问题——投资在虚拟经济上的套利热钱比重越来越高，投在实体经济上的资金越来越少。这也是 2011 年我国温州出现老板外逃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银行可以投入实体经济的钱越来越少，实体经济就必然会从民间寻求高利贷，最终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不堪重负，老板只好一走了之。

从理论上说，应对国际游资更好的办法是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提高这些热钱获取套利的风险成本；可是，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又不一定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所以可谓是进退两难。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进退两难索罗斯最喜欢。从历史上看，索罗斯过去攻击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以下共同点：通过外向型经济带动经济发展，货币升值，国内投资过热出现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导致持续加息压力……而这正是我国目前所具有的经济征兆。

这种情况就连索罗斯也有点“干着急”了。2010 年 4 月 13 日他在《经济学人》举行的会议上再次提醒说，现在这种通过银行贷款和财政拨款方

式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早在 1998 年为了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时就被各国普遍使用过，结果怎么样呢，经济泡沫一连增长了 10 年，直到爆发次贷危机，如果现在不吸取教训，那么将来必然会迎来一个规模更大、存活时间更短、更具有破坏性的经济泡沫。

事实上，我国从 2010 年 10 月以来每月外汇占款数额就高达几千亿美元。在国际版即将推出、人民币逐步走向兑换自由化、上海正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等背景下，跨国公司和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将变得更便利。

伴随着索罗斯对中国的“看好”，这位耄耋老人不辞辛劳地一趟趟往我国跑，非常耐人寻味。自从他 2001 年第一次访问我国后，现在是频率越来越快，2005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又分别踏上中国土地到处演讲，一路“唱多”中国。

2010 年 6 月，索罗斯在和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马云交谈时透露说：

我对投资中国比投资其他国家更感兴趣，我特别对私人股权感兴趣，中国总的前景很好，许多实业里面会发生很多兼并，而资本市场能赚大钱的机会就来自兼并和资产重组。

2011 年 3 月，索罗斯在香港更是“建议”我国政府不如将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认为我国要避免热钱流入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然后再以渐进式浮动汇率制度进行调整。与此同时，索罗斯又在 2011 年 8 月“建议”美国政府，要采取强硬措施强迫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且提出尺度说，他认为人民币每年升值 10% 对我国而言“是可以忍受的”。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个背景，那就是索罗斯已经携带 90 亿美元进驻香港了。无利不起早。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他的获利目标铺路。

据 2010 年 12 月 24 日《华夏时报》报道，之前一天（23 日）在香港发行的中联重科 H 股，上百亿港元的募集资金中有一笔重要认购就是属于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索罗斯的。索罗斯和巴菲特对 H 股的投资，都显示了他们看好我国的经济
发展。而在此以前，索罗斯已经连续参与四环医药和我国内地汽车经销渠
道商正通汽车的 H 股发行认购，所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由于这时候索罗斯旗下的索罗斯基金刚刚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所以这
一举措有人认为是索罗斯学习巴菲特投资比亚迪寻找价值投资的举措，也
有人认为是索罗斯已经发现了一个正在成长的泡沫。孰是孰非，只能假以
时日来得到证实了。

另外还有人认为，正是因为索罗斯等国际游资大量进入香港，它们的
做空机制在发挥作用，才使得我国内地 2010 年的股市表现在全球最差。

一方面是，2010 年在香港获准持有牌照的国际对冲基金迅速增长到
300 多家，比 2007 年次贷危机发生前增长了 60%；2009 年香港投资基金
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 109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2010 年的资产规模
估计超过 10 万亿港元。这说明，这些对冲基金有足够能力做空香港股市
和我国内地股市。另一方面，2010 年 4 月 16 日我国资本市场上推出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从此诞生了沪深期货做空机制。这项机制推出后的三
个月内，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就从 17000 多亿元下跌到 14000 多亿
元，市场蒸发了 3000 多亿元，尤其是房地产、金融、有色金属和钢铁等
行业的暴跌让投资者彻底领略到了做空机制的威力。而半年之后，“空头
司令”索罗斯在香港设立办公室，表明他已经从后台走向前台，决心要在
香港大战一场。

不能不说，索罗斯的这一系列动作与我国国内 A 股市场的暴跌并非完
全没有关系。2010 年 12 月 24 日上证综合指数收盘点位是 2835 点，与当
年第一个交易日 1 月 4 日的收盘点位 3243 点相比，下跌了 12.58%，全年
最大跌幅高达 28%，不但是全球跌幅最大的股票之一，而且与美国道琼斯
指数、香港恒生指数全部收复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前的失地、创出新高相比，
更是不可同日而语。2011 年 10 月 21 日，上证综合指数又继续下跌到当年

的最低点 2317 点，比年初下跌了 18.27%。

按理说，股市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我国经济发展在全球一枝独秀，股市不应该如此暴跌才是，但现在事实又无法解释得通，为什么？原因之一就可能在于有人搅局。

如果把 H 股和 A 股进行一番对比，可能更容易看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在 2010 年我国推出股指期货后，索罗斯和他的老搭档罗杰斯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投资机构，不断唱空我国 A 股经济和房地产泡沫，使得金融地产股的市盈率已不足 10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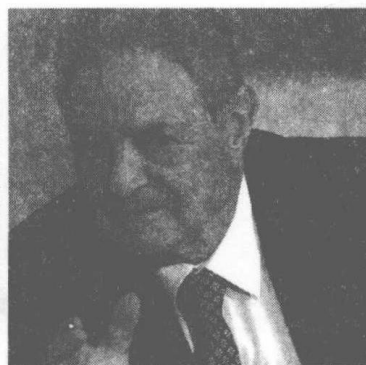
虽然从表面上看，股市下跌也会连累索罗斯的投资遭受损失，可是索罗斯在他最擅长的做空机制下，以后进入 A 股的筹码就大大降低了。就在 2010 年我国 A 股跌跌不休的时候，香港 H 股指数突破了相当于上证指数 3478 点的新高。而从索罗斯个人来看，他在香港龙湖地产上的投资收益已经差不多实现翻番了！

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思是说，在一个地方有所失去，在另一个地方总有所得。索罗斯通过做空机制打压 A 股市场，一方面为以后进入 A 股作准备，另一方面又能在 H 股上捞回来，何乐不为呢？苦则苦了那些只能“失之东隅”不可能“收之桑榆”的股民散户。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索罗斯的第三板斧

永远比对手早平仓



George Soros

索罗斯的第三板斧，在于“逃命要紧”。他不打无准备之仗，每次出手必定追求大获全胜。为了策划大行情，他可以蛰伏三年精心准备，一旦市场判断错误，撒腿就跑，自称拥有“永远比对手早三分钟平仓”的本领，并因此“小输大赢”。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

紧急情况下保命第一

任何投资难免会失利，索罗斯也是如此。对此他的对策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保命是第一选择。这和巴菲特的保存实力原则是一致的。

从索罗斯的投资生涯看，擅长绝处求生、懂得如何放弃，是他的一条成功秘诀。相反，许多投资者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懂得这一点，依然一错再错，到最后连东山再起的本钱也丧失殆尽，实在很愚蠢。

所以，索罗斯在股票投资中不仅注重投资什么样的股票，同样注重自己什么时候会犯错误。例如，索罗斯同样犯过低级错误：在最低点时抛出股票，回过头来又在最高点时追涨买入。可索罗斯与众不同的是，他会很坦率地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因此坏了心态。并且，他会在第二天及时止损离场、保持实力。

再有就是，因为索罗斯的投资规模太大，所以他的这种投资决策一旦有误，所带来的损失也会很大。因此，索罗斯对投资仓位的警惕性很高，总是小心翼翼地谨慎行事，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索罗斯作为顶尖投资大师，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与索罗斯的哲学观念是分不开的。因为索罗斯始终认为，不完美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人总会犯错误，所以他对任何投资失误都会抱有一份平常心，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常常说：做错了事不丢脸，只有在发现错误时不去纠正、死要面子、

强词夺理才丢脸。他不只一次地在众人面前自我表扬说，他比别人更优秀的是，他会比其他人更善于发现自己什么时候做错了。

这样平和的心态对投资来说确实很重要，甚至至关重要。因为谁都不可能一贯正确，谁都有投资失误的时候。每当索罗斯发现市场发展和他所预料的不一樣，就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进一步探讨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错了；然后，要么改正错误，要么被迫放弃。

把镜头推远一点看，这是索罗斯在小时候从他父亲身上学到的优良品质：冒险没有关系，但冒险时不要把全部家当扔进去。索罗斯进一步阐述说，不但冒险时是这样，有钱可赚的时候也是这样。

由此容易想见，当索罗斯有时候看准行情后孤注一掷，实际上这时候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可从来没有这样冒险过。他深深懂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

最典型的是索罗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狙击港元的表现。

1997年7月，索罗斯大量卖空泰铢，使得泰国被迫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在泰国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并且接下来，这场危机很快就波及到其他东南亚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和地区。水落石出，这时候港元就成了亚洲最昂贵的货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接下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联手狙击港元，把港元当做下一个攻击目标。

1997年10月20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黑色星期一”10周年纪念日。就在美国股市焦灼不安地防范着这一天会出现什么乱子的时候，索罗斯选择这一天出击香港股市，可谓是另一种“声东击西”。

从20日开始，香港股市一连4天暴跌。股市下跌从20日启动，21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5点，22日猛跌1200点，迫使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节节上升。一连三天的股市暴跌，使得23日当天的隔夜拆借利率从两天前的7%一下子就暴涨300倍，连累23日股市下跌10.4%。

为了安抚民心，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当天表示，香港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是好的，股市下跌主要是外围投机因素的影响，所以投资者不必恐慌。他表示，“我不认为这是股灾”，香港特区政府无论如何会捍卫港元汇率的。与此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出来发表谈话说，金融管理局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击退了国际投机炒家。

在这样的政府干预下，投资者的信心有了恢复，24日香港恒生指数强劲反弹718点，涨幅高达6.89%。

趁热打铁，曾荫权27日再次发表讲话，重申香港现行联系汇率制度不会改变，国际投机者在这次活动中必将“偷鸡不成蚀把米”，在这场炒作中受损失的只会是那些投机者。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香港股市小范围稳定下来了，可是受外围股市纷纷暴跌的影响，尤其是1997年10月27日美国道琼斯指数出现有史以来最惨烈的跌幅，当天狂跌554点；日本东京股市开盘后就狂跌800多点，香港恒生指数28日也狂泻1400多点，跌幅高达骇人听闻的13.7%。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与索罗斯有关的。因为这场亚洲金融风暴本身就是索罗斯引爆的，现在这一幕出现在香港，只是其中的又一战役。

但索罗斯精明得很，他时刻关注着香港市场上的一举一动和各方表态，判断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归根到底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他必须格外谨慎。

事实上，早在两个月前的1997年8月，索罗斯就已经几次探索性地冲击港元。从尝试性投机开始，“摸着石头过河”是索罗斯的一贯做法。具体地是指8月14日和15日，索罗斯安排一些实力雄厚的对冲基金首先进入香港汇市，通过金融期货手段，利用3个月和6个月的港元期货合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目的是要试探美元兑港元的汇率下跌到1美元兑7.75港元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时香港和全球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事情就像他划好的圆圈一样发展。港元汇率果真到了 7.75，而这时候他看到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通过收紧银根、抬高同业拆借利息予以还击。索罗斯很清楚，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招不但抬高了投机成本，而且还使得自己“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很快就在 8 月 20 日宣告缩手。

可是索罗斯等人对此并不甘心，这才处心积虑选择在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10 周年那天对香港发动攻击。但在香港特区政府及其背后中国政府的周密安排和强大实力下，索罗斯眼看胜利无望，所以不得不偃旗息鼓、保存实力。

索罗斯与香港特区政府打得难解难分，但他考虑欠缺的是，没想到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特区政府连同背后的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应付索罗斯等人的攻击；并且与此同时，又采取大幅度提高利率水平等措施，大大抬高了索罗斯的攻击成本。不用说，最终在香港特区政府强有力入市干预下，以索罗斯一方失败而告终。

平心而论，与其说这是索罗斯的一种失败，不如说是他的一种策略，因为做任何事情总是应当有勇有智、有进有退的嘛。

从长远来看，因为索罗斯自始至终没有忘记“保命”的原则，很好地保存了实力，这是他后来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大赚一把的资本和伏笔。

索罗斯 2005 年末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了他一个幼稚而有趣的问题：“发现自己犯了错怎么办？”索罗斯想也没想就回答说：“抛售、退出。”这就是他一生的底线：活着。

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明知自己投资失误，这时候与其孤注一掷，不如退避三舍、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回顾过去，索罗斯狙击港元为什么会遭到失败呢？原来，他狙击英国英镑、泰国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取得成功，都具备以下必要条件：该国的外汇储备不能支撑本币下跌，所以索罗斯能够用自己手中庞大的资

金规模来对对方发起攻击，该国本币被严重高估，所以索罗斯攻击这种货币具有巨大的获利空间；该国的货币是自由兑换的，所以索罗斯的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该国的股票和外汇市场缺少管制，所以索罗斯的炒作没有法律障碍或者至少也可以钻法律漏洞。

对照上述条件，索罗斯在狙击港元时就没想到其中的第一条。因为单独从港元看，香港的外汇储备规模并不大，可是这时候香港已经回归中国，攻击港元实际上就意味着连同香港背后的人民币也一起受攻击，这当然是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的，也是中国政府有能力抵抗的。

因为与港元相比，人民币的上述四个条件基本上都不符合。所以，索罗斯知道狙击人民币的阴谋无法得逞，所以只好识相地按兵不动，只攻击港元。

可是港元后面有人民币撑腰，你索罗斯有多少港元抛出，我香港特区（中国）政府就吃进多少，最后终于使得索罗斯连喊吃不消了，因为他手中已经没有这么多筹码了。

从这一点引申出来看，索罗斯基金会 1987 年就在我国大陆设立分会，并且以“促进改革开放”之名资助“民主”运动，1989 年“六四”事件后索罗斯见势不妙马上关闭分会，后来就一直再也没有恢复过活动，这时他在政治上也是“保命第一”。

总揽索罗斯的投资风格，他自始至终遵循的是“适时止损”这样一条实实在在的原则。

鳄鱼的吞噬方式是，猎物挣扎得越厉害，它的收获就越多；也就是说，这时候猎物的损失就越大。举个例子来说，如果鳄鱼咬住了你的一条腿，这时候你用手去击打鳄鱼试图挣脱，鳄鱼就一定会咬掉你的手，你越是挣扎便陷得越深。所以索罗斯说：

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腿，务必记住：你唯一的生存机会便是牺牲一只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脚。若以期货市场的语言表达，这项原则就是：当你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时，立刻了结出场！不可再找借口、理由或有所期待，赶紧离场……止损是人类在交易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并非刻意制作，是投资者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反应，市场的不确定性造就了止损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成功的投资者可能有各自不同的交易方式，但止损却是保障他们获取成功的共同特征！

当然，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索罗斯也不例外。在全球投资市场上，每天都有人被扫地出局，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止损，或者无法止损。

为什么会这样呢？索罗斯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侥幸心理在作怪，总希望会发生奇迹，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止损时机；二是价格的频繁波动会让人犹豫不决，经常出现错误性止损决策，从而动摇下一次止损的哪怕是正确的决策；三是止损是一件痛苦的事，意味着你愿赌服输，是对人性弱点的挑战和考验，而这又是许多人很难下决心的。所以索罗斯说：

事实上，每次交易我们都无法确定是正确状态还是错误状态，即便盈利了，我们也难以决定是立即出场还是持有观望，更何况是处于被套状态下。人性贪婪的本能会使每一位投资者不愿意少赢几个点，更不愿意多亏几个点！

那么，索罗斯自己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在全球期货交易中，一般都预先设定止损指令。即预先设定一个价位，当市场价格达到这个价位时止损指令会自动生效。但索罗斯承认，在每一次交易中，实际上他也搞不清该不该止损，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价格波动常常杂乱无章，让人搞不

清方向，在心理上更难以承受止损的痛苦。

但索罗斯的优点在于，他能坦然接受错误的止损。

他深有体会地说，止损时必须具备良好的心态，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所有止损在进场之前就必须设定，如果在亏损出现时再考虑使用什么止损标准就为时已晚了；二是止损要与市场趋势相结合，在市场盘整阶段止损的错误概率最大；三是需要选择交易工具来帮助确定止损点位，如均线、趋势线、形态等，但这些工具一定要适合自己，不能盲目照搬。

一般来说，以下两条“保命原则”在索罗斯看来是最重要的：

一是保命是第一选择

索罗斯认为，投资的第一选择是保命而不是赚钱，投资者懂得如何保存实力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投资与赌博的最大区别。

索罗斯旗下拥有规模庞大的量子资金，所以他始终把保存实力放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高投资杠杆下，获利和亏损都会放大若干倍，这样就更需要提高警惕了，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在这方面，面对一般投资者最难判断的究竟使用多少倍风险杠杆的问题，索罗斯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利用直觉本能，不断检讨自己；一旦发现自己的市场判断有误，不但会勇于承认错误，而且会及时撤退，以免发生更大的损失。这样，实际上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金使用效率，又能在冒险的同时保证自身安全，这样的清醒头脑是理性投资者不可或缺的。

二是绝不孤注一掷

索罗斯认为，任何投资都不能孤注一掷，否则就成了赌博，并且还是最不可取的豪赌。投资必然要承担风险，但这种风险应当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任何情况下都不去孤注一掷，这是他的一条基本原则。

所以在量子集团里，任何一位操作员如果要进行高风险赌博行为都将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会遭到及时制止。这种走钢丝行为在索罗斯看来，并不属于投资，甚至也不属于投机。无论投资或投机，都应当以保存实力为前提。

索罗斯说，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去冒那种能够自我毁灭的风险；当然也不会 在有利可图时，只是游手好闲地站在一旁观战。前者说的是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后者是指要尽可能地多获利。

2

一旦判断错误撒腿就跑

索罗斯之所以会“永远比对手早三分钟平仓”，原因之一在于他看到投资前景不妙时会及时止损、保存实力。这就像老虎出外觅食时也会想好撤退路线，以便在紧要关头撒腿就跑一样；如果这只老虎不懂得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即使再威猛无比，也至多是只“笨老虎”。

例如，1987年索罗斯仔细分析全球经济形势后认为，日本股市必将崩溃。他的理由是，当时日本的债券市场已经崩盘了，而日本股市上的价格高估现象实际上比债券市场更严重。更不用说，债券市场崩盘一定会影响到股市，所以他断定：日本股市会比其他国家的股市更先下挫。结果怎么样呢？没想到他的这种想法与事实背道而驰。由于国际游资纷纷涌入日本股市，反而推高了日本股市。

实事求是地说，类似这样的错误判断，任何投资者都遇到过，而且可以说司空见惯。理性的投资者不是不承认这种错误，而是能想方设法从这种错误中吸取教训，同时保持一种良好心态，这才是更宝贵的。

读者见到的是，这时候的索罗斯见势不妙撒腿就跑。虽然这次投入让他受到了重创，但由于他立刻认赔出场，所以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从全年来看，当年索罗斯基金的投资业绩仍然有14%的盈余。

正因为“火种未灭”，保存了实力，才使得他接下来有实力狙击英镑，最终获得“让英格兰银行破产者”的封号。所以索罗斯常常说，如果要对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他的股市投资实务技巧做个总结，他会选择一个词：存活。

也是在1987年，索罗斯因为估计日本股市即将崩溃，所以用量子基金在日本东京做空股票，然后在美国纽约买入标准普尔期货指数合约，准备大赚一把。

可是没想到，这时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突然爆发的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完全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当天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22.6%（至今仍然是全球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而日本股指却被政府撑住了，这样无疑是从两边夹击索罗斯。索罗斯两头不讨巧，损失惨重。

两年后接管量子基金的德鲁肯米勒回忆说，由于当时索罗斯采用的是杠杆交易，所以这对索罗斯的打击非常大，量子基金甚至出现了生存威胁。正因为索罗斯当时全线撤退，才算保住了实力。

那么，索罗斯是怎样全线撤退的呢？当时索罗斯一见股市大跌，马上就以230点的价格出售5000份期货指数合约，可是没人接盘。于是他继续压低价格，分别以220点、215点、205点、200点的价位抛出，依然乏人问津。所以，他的这些期货指数合约最终是以195点至210点之间的价格抛出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他把手中的这些筹码抛出后，市场上的抛压压力随之消失，当天的期货指数收于244.5点。

可以说，仅此一举就把索罗斯当年的全部利润吞噬掉了。可是索罗斯依然一副非常大度的样子，并没有感到有多大的伤心和懊恼，因为他做了自己这时候该做的事。正如他一贯所说的那样：“在金融市场上，生存有时候意味着及时撤退。”再怎么讲，盈利虽然没有，但本金并没有受到损失，他依然有实力东山再起。

果不其然，仅仅两个星期过去后，索罗斯就重返市场猛烈做空美元，依然采取“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的原则，终于报得一箭之仇。当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全年投资回报率仍然高达14.5%。

这样的事例在索罗斯的投资生涯中一再重复。

据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纳华证券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潘明回忆，1998年7月24日，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约他去香港的办公室会谈。接待他的是量子基金全球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罗德尼·琼斯和分析员本·德索玛。尽管他们对香港市场的看法比较一致，可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前景和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看法却截然不同。

当时，量子基金刚从中国内地考察回来。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面对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效益极其低下等重大问题迟早要崩溃，人民币汇率在近期（一至三个月）内就要贬值。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时候的人民币汇率与亚洲国家的其他货币相比已经严重高估，人民币兑美元的黑市价格在1美元兑换9元人民币左右，已经贬值了8%。

而潘明的看法是，人民币黑市价格并不能代表官方价格，从经济基本面分析，人民币中短期不但没有贬值压力而且还有升值可能。因为当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比重超过40%，出口成本大大降低，所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应该是升值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具备良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充裕的外汇储备，是能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

潘明回忆说，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大约有半个多小时是在“争吵”中度过的，这是他职业生涯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的一次。

最后的结果读者都看到了，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很好地维持了港元汇率，以索罗斯的进攻失败而宣告结束。不过话说回来，因为香港实行的几乎是全球唯一的联系汇率制度，为了维护这种联系汇率，香港特区政府包括其后面的中国政府同样为此付出了高昂的货币代价。

什么是联系汇率呢？固定汇率读者都知道，就是政府把外汇价格固定下来，比如1美元兑换多少元人民币，如果人民币价格升高，政府就通过抛售人民币、买进美元的办法来打压人民币价格，从而使得两者之间的比率得到稳定。而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简单地说就是香港的三家发钞银行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如果要想发行港元，必须先要把相应的美元存入香港金融管理局，然后才能发行港元。

例如，如果港元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7.7766港元，那么某银行存入10000美元就能发行77766港元。从某个角度看，这港元在香港就相当于美元的兑换券。相反，在中国大陆发行人民币就不需要这样做，理论上说想发行多少人民币都是可以的。

从港元是美元兑换券的角度看，索罗斯进攻港元遭到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同一种货币”。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索罗斯也不会傻到去用鸡蛋碰石头的地步。

实际情况是，索罗斯狂抛港元后，香港金融管理局当即决定大量回收港元，减少港元在市场上的流通量，让你索罗斯买不到足够的港元用于还钱，这样索罗斯就违约了、输定了。市场上的港元供不应求，结果必然是港元利率大幅度提高，1997年10月23日这天利率居然上涨了280%。

在利率上涨的同时，伴随着的必然是股市下跌。而索罗斯在狙击港元之前，就已经卖空8万个香港恒生指数合约，就是为了等待将来指数暴跌后以低价买回来。

所以总体来看，索罗斯在这场外汇投机中是亏损的，在卖空股票方面是赚钱的。从指数点位看，当时的香港恒生指数从16673点狂跌到6660点，下跌幅度高达60%。以至于在这以后的9年中，每当恒生指数上涨到16000~17000点时就会出现大幅度震荡，史称“索罗斯震荡”，实在是市场被索罗斯搞怕了。

同样的情形后来又反复出现过。索罗斯在2003年美国股票新一轮上涨行情之前，就因为错估行情而蒙受损失。

具体地说，他当时卖空了纸张及木材制造商Georgia-Pacific以及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股票，总值分别为5520万美元和3670万美元。结果没想到，这两只股票的价格随后很快就上涨了20%以上。

在债券市场上，索罗斯同样有看走眼的时候。2003年7月，美国国债价格迅速下跌，从而使得债券利息上升到20年以来的最高位，可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却对此行情熟视无睹，它和其他大多数宏观对冲基金一样，并不看好债券利率会与利率期货一样。所以，面对1984年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利息攀升到了最高点，却没有参与其中而无法分享获利成果，最终只使得量子基金的回报率上升了0.8%，聊胜于无。

索罗斯的新一次逃顶本领，显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正如他在2009年6月访问中国时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他本来已经宣布自己在2000年就退休的，把更多时间和兴趣放在从事慈善事业上，帮助那些在他眼里“实行经济开放的国家”，直到2007年8月，他预测到全球金融风暴即将来临，所以决定重新出山，以保住自己毕生的资本积累。在完成了这一仗（完全空仓）以后，2009年初他重新恢复到退休状态。

索罗斯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高超本领呢？他在解释这一心路历程时认为：

我对市场的看法与大家公认的看法不同，我的第一个看法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把这叫做易错性；第二个看法是，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并不符合真实情况，我把这叫做反思性。这就是我的两个主要看法。

这就是说，大多数人在判断市场时会产生种种错觉，并不一定符合真实状况，这在索罗斯看来是很正常的。他的言外之意是说，他是具备这种纠错能力的极少数人之一，所以与众不同，往往有先见之明。

3

对冲就是要跑得快

众所周知，索罗斯的杀手锏是对冲基金。按理说对冲基金的数量和规模在全球有很多，并不是唯独索罗斯有。既然如此，索罗斯又是凭什么从中脱颖而出的呢？他的秘诀是精准的双杀对冲。

先来看看对冲基金究竟是干什么的。

对冲基金也叫避险基金或套利基金。顾名思义，对冲基金就是指“风险已经对冲过了”的基金——它首先是一种基金，但又与互惠基金所拥有的安全、收益、增值理念有本质区别，因为它是一种免责市场投资基金。

对冲基金通过把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与金融组织结合起来，采用高风险投机手段来获取利润，所以它注定具有高风险，因为只有高风险才可能带来高获利；而同时它又要想方设法回避风险，因为只有把风险降到最低，这种高获利才能得到确保。

那么具体地说对冲基金采取的这些高风险投机手段有哪些呢？最常见的主要有卖空、杠杆操作、程序交易、互换交易、套利交易、衍生品种等，方式有对冲、换位、套头、套期等。

与传统投资中的防止投资风险、确保投资收益相比，这些手段和手法远远超出前者。并且，设立对冲基金的门槛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对冲基金的投机风险。

所以在国外，证券管理机构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普通投资者介

人对冲基金是有严格限制的。限制介入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个人投资门槛，二是投资人数规模。例如每一位投资者参与对冲基金时，年收入要达到多少，并且最低投资规模不能低于一定标准；每家对冲基金的投资人数不得超过多少，等等。

例如美国证券法规定，投资者如果以个人名义参加对冲基金，最近两年内的个人年收入不得低于 20 万美元；如果以家庭名义参加对冲基金，最近两年内夫妻年收入合计不得低于 30 万美元；如果以机构名义参加对冲基金，该机构净资产不得低于 100 万美元。一只对冲基金加入的投资者人数不得超过 100 人（日本的规定是不得超过 50 人）；1996 年以后扩大到不得超过 500 人，投资者个人拥有的投资证券价值不低于 500 万美元。

所谓的对冲是指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在买入这种股票的同时也卖出这种股票的看跌期权。

投资者买入这种股票，本来是看好这种股票的价格以后会上涨的，但这只是一种愿望，事实上该股票的价格最终究竟是涨是跌谁也说不准。

为了确保这只股票在将来价格下跌时也能有获利，至少是不至于亏损太多，所以就同时也买入这种股票的看跌期权。当这只股票将来的价格跌到投资者设定的期权限价时，持有者就可以把这只股票以期权限定的价格卖出，从而起到止损作用，把投资风险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这就叫对冲。

那么，基金管理人是如何来选定这样的股票呢？

一般来说，首先会确定几种特别看好的股票，买进这个行业中最看好的几只优质股；接下来会以相同比例，卖出该行业中最不看好的几只劣质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好两手准备：将来如果这个行业表现不错，那么所选定的几只优质股票价格涨幅会超过同行业的几只劣质股，从而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如果这个行业表现不佳，那么所选定的几只劣质股票价格跌幅会小于优质股，这样，由于卖空股票所得到的利润也会大于买入

世间再无索罗斯！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优质股票下跌所造成的损失。

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投资策略，但这种保守又是必需的，是为了减少亏损、降低投资风险所必须做出的选择。

研究资料表明，1999年到2002年间普通公共基金平均每年的损失高达11.7%，而对冲基金利用这种双杀对冲手段，同期的年获利率却高达11.2%，优势显而易见。

只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运用这种对冲操作需要有高超的技巧，并不是普通投资者都能轻易驾驭的。不用说，这方面恰是基金操盘手的强项。

为什么说这不是普通投资者所能胜任的呢？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对冲基金可以充分利用杠杆作用来施展影响，普通股票投资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例如，对冲基金的放大作用一般可达20倍到200倍。要知道，对冲基金规模本身非常大，再加上这种放大作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交易价格；而普通投资者由于势单力薄，这种影响作用微乎其微，对股市、汇市所造成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是期权合约购买者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在交割日时如果执行价格不利于期权持有者，期权持有者可以不履行。

这种做法大大降低了期权购买者的风险；当然，与此同时也会诱使投资者进行更大的冒险行为。但不管怎么说，这对期权合约购买者来说，在止损方面就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普通投资者在购买股票、外汇时就没有这种选择权。

三是期权的执行价格越是偏离期权的标的资产现货价格，对冲基金所从事的投机活动就越能带来机会和便利，这是普通投资不具备的。

综上所述，对冲基金和普通投资行为有很大区别，如果市场判断正确将会获得巨大收益；当然，如果判断错误，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正因如此，在全球暴利一族中，有许多就来自于对冲基金的获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冲基金已经从最初的这种原始操作演变为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运作，在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方面有了新发展。

并且，不但投资活动极其复杂，投资杠杆也越来越高（可以利用反复抵押证券资产方式，在原始基金规模基础上扩大几倍、几十倍）。高杠杆率的运用，既扩大了获利空间，也增加了投资风险。

更普遍的是，这些对冲基金大多是私募基金，目的主要是回避法律对公募基金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严格要求，从而操作起来更隐蔽、更灵活。

从索罗斯的投资策略看，他最喜欢也最擅长的是卖空策略。

具体操作是，他首先在几个较大的股票上下大赌注，然后卖空。接下来如果形势发展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股价猛跌，他就可以从中赚大钱。当然，他的这种下跌愿望并不一定会如期出现，所以在别人看来，他的这种卖空风险是很大的；但索罗斯显然不这么看，因为他在此以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对此胸有成竹。

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巨大冒险的行为，到最后十有八九会如愿以偿。也正因如此，索罗斯才会成为金融大鳄，令人惧怕。

举个例子来说，索罗斯量子基金的前身双鹰基金，最早是1969年他和好友罗杰斯共同组建的。一方面是当时的基金规模还很小；另一方面是当时全球所有的对冲基金多不为人所关注，所以在公司成立后的几年间，索罗斯连同他的双鹰基金根本就不为人所知。可是索罗斯依然在认真地做功课，每天都要研究一大堆商业期刊和研究报告，以便从中寻找任何一点适合投资的蛛丝马迹。

1973年机会终于来了。当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侵略以色列，以色列由于武器落后而遭到惨败。索罗斯看到这种局面后马上联想到：美国的武器装备是不是也已经过时了呢？或者说其中有多少已经过时了呢？不管这个比例有多大，美国国防部是一定会花巨资来更新这些已经过时了的军事装备的，所以如果从现在开始我把更多投资用于购买拥有美国国防部订货

合同的公司股票，将来一定会大赚一笔。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索罗斯的合作伙伴罗杰斯还专门去接触美国国防部官员，以及美国军工企业承包商，结果使得他们两人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于是，索罗斯基金大量投资诺斯罗普公司、联合飞机公司、格拉曼公司、洛克洛德公司等拥有美国国防部订货合同的公司股票。

事后证明，索罗斯的这种分析非常正确。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被动挨打，确实引发了以色列和美国重振军备的决心。索罗斯基金投资这些股票后，1974 年中期就取得了丰厚的获利回报。

1974 年时索罗斯拥有大量的日本股票，有一天下午，日本东京的一位股票交易员告诉索罗斯说，日本人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印象并不好。索罗斯当时正在打网球，他听说后马上联想到当时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丑闻，立刻要求手下卖出这些股票。后来，尼克松果然因此下台了。这种敏感的政治态度和眼明手快的操作手法，是许多基金操盘手的基本功。如果是换了其他投资者，说不定还会等等看，至少不会这样果敢。

基金投资中的双杀对冲绝对离不开这样的信息判断和眼明手快。

话说 2000 年索罗斯在日本投资 3 亿美元，建立了一家 Eifuku 对冲基金，当时也曾经取得了不错的业绩，2002 年回报率高达 76%。2003 年初，当其他投资者都在准备暂停投资专心度假时，Eifuku 基金却一反常态地利用借来的股票和资金进行大手笔的杠杆投资。结果由于炒作过度，Eifuku 基金在短短几个交易日内就暴跌 98%，随后不得不宣布清盘。据估计，索罗斯在这家对冲基金身上损失了 1.8 亿美元，即原来的 3 亿美元变成了 1.2 亿美元。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就在索罗斯 1998 年精心指挥投机资金轮番进攻港元时，1998 年 3 月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当时索罗斯也在兴致勃勃地一边收看电视一边喝

茶，当他听到这句话时心中不免一惊，茶杯往地上一掉，他觉得自己麻烦大了。

这则故事虽然无从查考其真实性，但中国对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抱有这种坚定支持的态度，是对索罗斯的巨大震慑。

所以说，索罗斯虽然擅长双杀对冲，但其根基主要还是全球各国的政治经济动态，这是决定他如何双杀对冲的基本依据。

4

残酷无情是资本天性

在全球金融投资界，索罗斯以残酷无情而著称。其实，这个问题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这除了个人性格因素外，主要取决于金融资本本性。就好比说，2008 年在美国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时，最初一些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是美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发展失调、金融创新失控、金融监管缺位，一句话，是由于不适当的金融创新造成的；而实际上呢，这些或许都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真正实质在于资本，这里主要是金融资本的两面性所决定的。

资本的这种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对调节市场、配置资源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会导致经济失衡、破坏金融秩序。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而金融资本是资本的最高形式，更是如此。对此，马克思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对此作了最好的注释。马克思说：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实际上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

资本主义当然离不开“资本”，否则也就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了，但这并不排除在不同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例如，在资本原始积累和初步发展阶段，资本的残酷无情主要表现在榨取工人剩余劳动价值，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进行殖民掠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到了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资本主要以金融资本的面目出现，表现为金融、货币之间的掠夺和战争。从全球看，几乎没有哪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依靠民主制度得到发展强盛的，金融创新才是它们的主要手段和武器。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金融创新手段的某种“失误”造成的，本质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掠夺残酷无情的本性。

更直接地说就是，美国通过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本位币地位，不断促使美元贬值，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浪潮，不断地把别国资产转移到自己手里。

以我国为例，我国的外汇储备高达 3.2 万亿美元，仅此一项每天损失的财富就有 20 多亿美元，如果这还不是残酷无情什么是残酷无情！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以敢于消费闻名于天下：现在敢向未来借钱，还不够就向全球各国借钱，再不够，就向全球各国的未来借钱，还不够怎么办？那就发明各种金融创新产品，通过谁也看不懂的衍生产品销售把全世界的美元都吸收到自己手里来。

对此，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讽刺说华尔街“喝醉了”，推出的一些金融投资工具总是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看不懂。其实，这恰好说明金融资本是异常清醒的——只有凭借这些欺诈手段、浑水摸鱼，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真正的物资和美元都掌握在美国手里，其他国家拿到的只是一把把眼花缭乱的证券。美国既抽走了别国资源，又把风险扔给这些国家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自己捧着。

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美国利用金融霸主地位，残酷无情地剥夺别国财富。美国人所谓“花明天的钱，过今天的日子”实际上是“花全世界的钱，过美国人的日子”，而这又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

索罗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幸灾乐祸地说，亚洲金融危机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唯一的办法是亚洲国家继续加大市场改革力度，让市场做主导，该倒闭的银行就让它倒闭算了。

实际上，这也是金融资本在那里说大话。只要看看 2008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是如何采取一系列“救市”政策的，就可以看出它们完全言行不一，采取的完全是两种态度、两种做法。

资本的残酷无情和索罗斯的残酷无情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几年中，全球外汇市场对索罗斯闻风丧胆。

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外汇交易员如果听到消息说日本中央银行在干预市场，大家会哈哈一笑，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可是如果一听到索罗斯的名字，就都会竖起耳朵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把与索罗斯交易方向相反的头寸全部处理掉。据说当时各国外汇交易员最害怕的是两个：一是美联储，二是索罗斯。

不单交易员是这样，就连一国政府也是如此。

例如，索罗斯狙击英镑取得成功后，在大多数英国人眼中，索罗斯成了英雄，但英国政府显然不这么看，因为英国政府从中遭受的损失比用在海湾战争上的钱还要多得多。

至于索罗斯，当然是不赞成英国政府这种看法的。就在英国称 1992 年 10 月 16 日为“黑色星期三”时，索罗斯称这一天为“光明的一天”。他说：

我相信必然有负面的影响……但我不会考虑这些。如果出于道德良心而退缩，我就不是一名成功的投机商了……我也不会为从英镑贬值中获利

而感到后悔。正如所发生的那样，英镑贬值被证明是有好处的。但我的观点是：我投机英镑并不是帮助英国，也不是在损害英国，我只是在赚钱。

英国媒体批评说，难道索罗斯的这些收益不是英国的损失吗？是索罗斯的捣乱，才使得英国纳税人即每个英国人要多交 12.5 英镑的税。

索罗斯回应说，这样说来倒是真的。因为在通常的交易中，有人获利就必定会有人损失，但你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获利谁在损失。可是在这次狙击英镑的战役中，双方利益是很清楚的，但索罗斯说：“我绝没有负罪感。我想你能相信，如果我不交易，别的人也会。”

同时他提醒大家，作为一种赌博、一种交易，他索罗斯也是可能会赔钱的。并且并不是索罗斯一个人在投机英镑，因为从数量上看，虽然索罗斯投入了 100 亿美元资金，可是与每天外汇市场上高达 1 万亿美元的交易额相比，索罗斯的影响力也只是相对的。只不过是索罗斯的这种联合行动促使他在其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获得了更多而已。

资本的残酷无情与索罗斯的残酷无情配合得天衣无缝，以至于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把投资或投机牢记心间，有时候甚至还不得不进行一番伪装，以免暴露自己的真实企图。

例如在 1996 年末，索罗斯偕妻子去泰国旅游，在泰国皇宫作了短暂停留后，就直接去了泰国旅游胜地芭提雅。说是去旅游，可实际上是会见几个重要密友，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对策，尤其是这时候他迫切需要弄到泰国各大银行的坏账数据，做到知己知彼，这才是他这次旅游的目的。

所以，这时候的索罗斯虽然低调得可以，不想惊动新闻界，但依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来旅游，说穿了是来考察“战场”的。

尤其是索罗斯选择在 12 月份这个泰国雨季来临之前的旅游旺季到此一游，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暗示：在发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亲临前线考察。因为早在 1994 年索罗斯狙击日元时就曾经放言道：“东南亚经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济危机一定会来临，只是时间问题。”而这时，索罗斯认为的最佳时机到来了。

所以说，索罗斯的成功既取决于他个人的性格和恰当操作，也取决于对资本天性的透彻了解和恰当使用，两者不可分离。如果一定要分轻重的话，在资金规模不大时，个人因素可能会显得更重要些；而当资金规模十分庞大时，资本的因素就可能会显得更重要些。

5

在不稳定状态中乱中取胜

索罗斯认为，投资市场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这种不稳定是必然的，又是可以合理利用的，没有什么不好，相反还可以乱中取胜。

所谓不稳定状态，是指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与客观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而当这种偏差达到极端状态时，就会在反作用力的推动下进行自我调整，但这种调整不可能得到完全修复，总是处于动荡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状态呢？索罗斯认为，关键在于投资者的主流意愿与客观现实的强烈对比效应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市场中那些头脑清醒的投资者就会最先进行反省，对这种主流意愿进行挑战，从而使得市场上原有的主导因素减弱，可是这并不能阻挡市场的原有惯性。

从索罗斯的投资经历看，他的成功秘诀之一就在于善于发现这种市场不稳定状态，尤其是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盛衰转换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当然，无论是谁，如果能够在临界点来临之前就发现并抓住机会，不成功也难。

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索罗斯投标竞买某公司的出价，使得该公司的资产被重新进行评估，于是银行就给其他竞买者增加贷款额度，结果导致这些竞价者的出价越来越高，客观上推动投标价格一路飙升。不用说，在这种价格飙升的同时，竞标者的投资风险也就日益显露出来了。

这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在投资领域中更常见。问题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种盛衰转换时机在什么时候出现，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时候往往就是市场主流偏向最强烈的转换时机，杀伤力最大。

也就是说，无论这时候你是买进还是卖出，所得到的盈利和亏损都是最剧烈的。

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形，索罗斯的心态总是非常好，可以说心如止水、若无其事，因为他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哲学观。

正是因为索罗斯早年梦想当一名哲学家，在哲学方面颇有建树，并且努力想搞清楚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基本问题，才使得他对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不稳定状态比别人有更深刻的了解，从而在投资中更加从容不迫。

例如他从哲学起源中发现，哲学要想解决人类最基本的命题“人为什么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人要了解人类为什么“存在”，首先必须能客观地看待人类自身，而这又是几乎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人们无法正确认识人类自身，又怎么可能最终了解人类为什么会存在呢，这本身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索罗斯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人类不可能摆脱自身观点的束缚，不可能获得独立观点来解释市场上的一切。推而广之，人类不可能得到“真理”；真理可以追求，但永远追求不到。也就是说，人们在自身认识过程中总是存在着缺陷，每个人能做的事只能是关注人类对事物的那些有缺陷的认识。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人之所以是“人”，就不会变成“神”。这也是索罗斯金融战略的核心所在。

正是依靠这一点，索罗斯比别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的扭曲和运动规律，在市场不稳定状态中恰到好处地把握时机，比别人早平仓。

为什么在许多人看来没什么用处的哲学，索罗斯却那么痴迷呢？除了个人爱好外，这也同样反映了索罗斯的超越常人之处。不用说，任何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哲学在人的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哲学

的“哲”，原本就是“聪明”的意思；也因此，“哲学”可以解释为“让人变得更聪明的学问”。

据说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名叫泰勒斯，有一次他在抬头观察天象时掉进了一个深坑，于是有人就讽刺他说：“泰勒斯会知道天上的事，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也有人说：“都说泰勒斯很聪明，那他为什么不去赚钱，而是整天研究那些无用的东西呢？”

一开始泰勒斯听过也就算了，但别人说的次数多了，传到他耳朵里觉得总不是滋味，于是他决定用实际行动证明给那些人看看。

泰勒斯根据自己掌握的天象知识，预测第二年橄榄将会大丰收，所以一过了年他就以很低的价格租下当地所有的橄榄榨油机。别人都觉得他这一做法不可思议，但他也不解释。到了夏天当地橄榄果然出现了大丰收，需要用到榨油机榨油了，这时候便只好纷纷到泰勒斯这里来租用榨油机。不用说，这时候轮到泰勒斯狠狠地抬高租金对他们出租榨油机了。

在这里，哲学家泰勒斯用无声的语言证明，如果他想赚钱，将会比其他人赚得更多。

如果说泰勒斯最喜欢研究哲学而不是赚钱的话，那么在索罗斯身上这一点就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索罗斯大学毕业时同样希望自己能成为哲学家，只是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投身金融市场去赚钱，可是没想到歪打正着，自己的哲学功底在这里派上了很好的用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为什么其他投资家的业绩没有他这么骄人？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样的哲学功底。

2008年，索罗斯出版了《金融市场新范例》一书（中文引进版书名为《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仍然是他20年前《金融炼金术》一书的老调重弹，但恰恰是这一点证明了他的观点比别人要超前20年。

在这本书中，索罗斯用自己的反身性理论证明了全球投资市场上对金

融危机爆发成因的偏见和谬误，而他自己则是把它作为生前被人认可为哲学家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就是说，当年 78 岁的索罗斯，直到这时候依然希望别人能把他当做一名哲学家，而不仅仅是投资家、慈善家。

索罗斯从 1985 年 8 月开始坚持写投资日记，他说他要把日记作为测试自己预言证券市场变化能力的依据，同时也作为检验自己理论的历史纪录。幸亏有这些投资日记的存在，使得索罗斯能够很好地把自己的实战经验通过一本本著作呈现给大家，虽然他写的这些很少有人看得懂。

例如，索罗斯把 1985 年 8 月至 1986 年 11 月的观点和投资战略全都收录在 1987 年写成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到现在为止，索罗斯已经出版过差不多 10 部著作，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有中文译本。

例如，1986 年 9 月 8 日（星期一）索罗斯是这样写投资日记的^①：

上周一，受铂市场高涨的影响，黄金突破了 400 美元大关，出现了狂抛债券和股票的风潮。对于抛售，我未加理睬，到了星期四，道琼斯指数创下新高，似乎证明我是对的。但其他指数并未尾追而上。星期五，整个市场又趋于疲软。股市的主导力量也发生了变化，循环性股票和石油股走向前列，而收益丰厚的老牌主流股票则表现不佳。我确信，这是税法在起作用：长期资本收益的税率明年相对提高。与此同时，市场还在关注着通货膨胀。我的战略观点从未改变，只要各国当局能够协调它们的政策，和缓的经济增长将会持续下去。美元的相对稳定鼓舞了我，不过，股票市场看来还要考验股指的下行支撑力度，就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道琼斯指数调整的幅度不会超过 40 点。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削减一半的 S&P 期货头寸，为的是可以保持主动。日本股票与债券市场的回落令基金蒙受了损失，不过对此我是无能为力的。

① 索罗斯：《金融炼金术》[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243，245。

可以说，正是因为索罗斯做了如此扎实的基础工作（写投资日记），才使得他后来很方便地就把它编纂成一本本投资著作，供现在的投资者研究他的操作技巧和心路历程，并且是原汁原味的。

顺便一提的是，索罗斯的《金融炼金术》一书很少有人看得懂。本书作者也曾经试图认真加以研究，但说实话最终还是不甚了了。据说索罗斯准备出版这本著作前，曾经拿着书稿给他最得意的助手，也是他发动英镑狙击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策划者德鲁肯米勒，要他读读其中的五章内容、给点意见，结果德鲁肯米勒回答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读懂！”

索罗斯听了后脸上有点不高兴，因为他知道这是德鲁肯米勒在批评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有问题。索罗斯虽然知道这一点，但他依然充满自信。他说：

令人十分惊喜的是，我发现那些抽象的理论操作起来竟然得心应手。如果说这些理论说明了我成功的原因，或许有些夸张，但毫无疑问是它鼓舞了我！

任何难懂的理论，总会有人懂；而一旦做到这一点，情况就可能会变得很不一样。就在几乎很少有人读懂《金融炼金术》时，偏偏就有人因为读懂了这本书而自愿投奔到索罗斯旗下。乔肯米勒、保罗·琼斯等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全球的投资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保罗·琼斯甚至还坚持认为，任何想要加入索罗斯公司的人，首先必须读懂这本书。

6

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革命导师列宁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索罗斯对此可谓是理解得非常透彻。有道是“不是闲人闲不住，真是闲人非等闲。”这句话用在索罗斯身上最贴切不过。其实，不仅是索罗斯，全球股市大亨都是如此，否则他们手中握有几百上千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还不得整天为投资的事忙得焦头烂额啊？事实恰好相反，无论沃伦·巴菲特还是彼得·林奇、索罗斯他们，无一不是“休闲得很”。他们每天几乎不看股市盘面，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宏观基本面，所谓“功夫在诗外”。

例如，巴菲特特地把自己的公司开在他的家乡小镇，办公室里甚至没有电脑和股票交易终端机。他说，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更好地避免听到小道消息，有助于自己冷静思考。彼得·林奇在掌管全球规模最大的共同基金麦哲伦基金时，工作人员只有两名助手。他说，人一多，彼此之间沟通时间就延长了，纷杂的事物反而会影响自己的思考。

回过头来看索罗斯。他说自己每天都要花三分之一时间用于思考，三分之一时间用于阅读各种资料 and 情报。根据他的理解，思考就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事外，保持一种客观和超然，搞清自己将来要到何处去、世界要往何处去等问题。

索罗斯的“休息”集中体现在两点：一是除了短线投机炒作外也会搞长线投资，以时间换空间；二是当大行情不好时，他会“金盆洗手”。

先说第一点，索罗斯具有极好的耐心，绝对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他是金融投机分子，所以只是擅长于做短差，没有耐心做长线。普通人都懂“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索罗斯又岂能不懂？

比如，1992年索罗斯重创英格兰银行，实际上在此以前他就已经布局了三年。1989年时，索罗斯对狙击英镑还只是一种初步设想，可是就是这种初步设想让他足足准备了三年，你能说他没有耐心吗？要知道，普通投资者在股票买卖时不要说准备三年，就连三天也等不及，多数人今天买入明天就希望它涨停，如果连续一个星期没动静，就要牢骚满腹了。这样的心态是否有助于投资获利，尽人皆知。

补充说明的是，索罗斯所理解的耐心并不仅仅是时间，同样包括空间。也就是说，理性投资者应当具有极佳的耐心，并不是指要耐得住寂寞；只要买卖价格合适，当天买入卖出也并非不可以，尤其是在股票可以做空的背景下，耐心就更不是指股票捂在手中的时间长短了。

再看第二点，即关于索罗斯宣布“退休”的事。

1998年8月5日，索罗斯联合其他几家国际金融巨头，其中主要是美资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联手对香港金融市场发动攻击。这场战役一直延续到8月28日，以索罗斯一方的失败而告终。

然后从1999年开始，索罗斯好像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直到2007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索罗斯才重新一展身手，并且大获成功。

首先是1999年欧元开始启动，索罗斯对此欢欣鼓舞，并且非常看好欧元的发展前景。可是他没想到，欧元币值在短时间内就下跌了24%，索罗斯为此损失了10亿美元。

更要命的是，当时全球股市中的网络股非常火爆，可是索罗斯并不看好网络股，没有参与其中，结果使得1999年7月时量子基金规模缩水了20%。要不是后来迷途知返，赶紧大量买入科技股、卖出传统经济股，量子基金当年的收益率根本不可能达到35%的水平。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可是好景不长，从 2000 年 3 月 15 日开始科技股价格急剧下跌，同样连累到索罗斯基金出现大幅度亏损，短短两个星期内就缩水 20%。

这时候的索罗斯感到自己昏招迭出，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2000 年 6 月，索罗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采访时袒露心迹说：“我想我不久前失去了那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感觉。我就像一个老拳击手，不应该再站在拳击台上。”

这就是为什么读者看到 70 周岁的索罗斯随后宣布退休，不再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慈善方面的原因。

与此相配合，索罗斯把他旗下的量子基金、量子新兴基金合并为量子慈善基金，交给自己 38 岁的儿子罗伯特打理，也顺便锻炼一下他的能力。

随着索罗斯的退休，量子慈善机构调整投资策略，采取比较保守和低风险的投资策略，并且宣布将把所有投资回报用于慈善事业。

当然，事后证明索罗斯是“退而未休”，他又在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大施拳脚，这是后话。并且，即使是索罗斯交出了基金管理大权，因为这种体制改变又重新发挥了新基金的活力，量子基金的业绩回报依然不菲。

以 2001 年为例，当年美国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 13%，可是量子基金的年收益率仍然高达 13.8%，业绩超出 26.8 个百分点。2002 年量子基金变外部人员管理为内部管理，当年的收益率为 -0.5%，比标准普尔指数的表现高出 21 个百分点。一方面这表明索罗斯的外部人员管理政策具有某种优越性；同时也可能表明，索罗斯的“保守”投资策略收到了效果。

2008 年初，本来已经退隐的索罗斯重出江湖，公开声称“全球将经历 60 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事后看到，索罗斯的预言基本上得到了证实，而他也从这种“危”机中及时抓住了“机”遇，狠狠地赚了一笔。

当然不仅是索罗斯，所有喜欢乱中取胜的对冲基金都从中赚了个盆满钵满。

据 2009 年 2 月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阿尔法》披露的信息，尽管

2008 年是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难赚钱的年份，但全球 25 名对冲基金经理人当年还是一共赚了 116 亿美元，是设立这个榜单八年来第三好的赚钱年份。其中，2008 年索罗斯一个人就赚了 11 亿美元，是这 25 人中的第四名，排在他前面的三位分别是：复兴科技公司詹姆斯·西蒙斯，当年赚了 25 亿美元；保尔森公司的约翰·保尔森，20 亿美元；人马座能源公司的约翰·阿诺德，15 亿美元。

有意思的是，即使从全球对冲基金行业看，不仅仅是索罗斯，其他人也都是以“休息”为主：当年全球投资行业中有 26 万人在银行、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失业，仅仅对冲基金行业就有 1 万人失业，就连巴菲特都不得不承认不敢轻举妄动，承认自己“失手”了；全球对冲基金当年有三分之二在赔钱，总亏损额高达 3500 亿美元。

那么，索罗斯等人又是怎样从中赚钱的呢？分析认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主要是依靠自有投资和收取管理费盈利，如果看他们手中的股票投资业绩，同样是令人失望的。

以索罗斯来说，2008 年他的主要赚钱途径，依然是采取当年攻击英镑的那一招。索罗斯靠 1992 年卖空英镑发家，这是他一贯以来最喜欢的操作手法。2008 年是全球对冲基金最悲惨的一年，可是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依然取得 10% 的高回报率，仅次于 2007 年的 32%，就是这一手法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

具体地说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索罗斯依然对英镑发起猛烈进攻，从中大赚了一笔。而在此以前的几年中他就一直警告投资者说超级泡沫随时可能破裂，现在他只不过是兑现了这种警告而已。

在 2009 年 2 月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索罗斯对英镑走势的看法又受到了各方关注。索罗斯说，只有在英镑兑美元的汇率跌破 1.40 后他才不会继续看空英镑。这大概是真正透露了他的底牌。

那么，索罗斯为什么又会和英镑较上劲了呢？2008 年 9 月 16 日他在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或许是注脚：

金融行业是英国经济的重要部分，所以我认为，英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远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更严重……我担心，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在进入风暴的过程中，而非走出风暴。

意思是说，既然英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厉害，并且依然处于这个过程中，那么我索罗斯瞄准英镑进行攻击就是很好理解的。

就好像是为了印证索罗斯所说的这番话，9月17日英国最大的抵押贷款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HBOS）发表声明说，正在与英国第五大商业银行莱斯银行洽谈并购事项。而莱斯银行则在18日宣布已与哈利法克斯达成协议，将以122亿英镑（约合21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后者。因为哈利法克斯银行的性质属于抵押贷款银行，所以这实际上表明，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金融危机已经传到英国，并且来势汹汹。虽然英格兰银行强调并不存在融资问题，但市场并不这么认为，所以哈利法克斯银行的股票价格一下子就暴跌了68.7%！

这一切的一切表明，索罗斯的市场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是他能够成为这次金融危机中五大佼佼者之一的主要原因。

关于这一点，不但索罗斯这样认为，曾经和索罗斯一起创立量子基金的全球著名投资家罗杰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葛海姆（Peter Garnham）2009年1月22日报道说，当时罗杰斯就认为英镑兑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应该继续下跌，英镑没有“支撑”，说穿了就是“英国没有什么东西可卖的”。罗杰斯进一步阐述说，英镑的两大支柱是北海的石油和英国的金融服务实力，尤其是伦敦金融城的角色。当北海油田开始枯竭的时候，伦敦作为一个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就受到了沉重打击。所以罗杰斯认为英国已经不值得投资了，资本家最好把钱投到其他地方去。

如果读者对英国和英镑在这方面的特点还不容易理解的话，那么换成香港和港元也同样适用。

就好比说，香港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农业，没有任何天然资源。香港拿不出任何可以对外出售的实物来，说香港的金融业是百分之百的空壳也不为过，港元的价值在于心理价值而不是实质价值。这也是当初索罗斯瞄准港元进行攻击的原因之一，因为港元和英镑在这方面有共通之处。

7

永远保持一份警惕

有人说研究索罗斯的成功秘诀，难度要比巴菲特大 10 倍，说的是索罗斯信奉“测不准定理”，并且他也确实是在“测不准定理”指导下取得成功的。这就给总结索罗斯的成功秘诀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索罗斯的“测不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吃不准”），基本否定了目前市场分析中常用的各种模型；并且他还不是故弄玄虚，从过去的经历看，他也确实如此，如索罗斯 1999 年做空网络股，2000 年又做多网络股，2003 年开始大量投资“不良贷款资产”，2008 年虽然看空美国金融股是正确的却同时又错误地看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凡此种种，都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可是这样一来就又带来一个问题：既然“测不准”，又怎么把握其中的要点呢？

正因如此，索罗斯解释说 he 基于多年的投资经验，自己有一种“背痛”式直觉。不用说，既然是直觉，那么也就是外人根本学不来的。这里姑且不去讨论索罗斯所说的是真是假或半真半假、真真假假，但我们宁可相信他有这种“直觉”，因为直觉和“测不准”原理是相通的，都让人捉摸不透。

不过在这里，直觉和“测不准”都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时刻对周围环境（投资环境）保持一份高度警惕。从索罗斯的角度看，这种警惕既来源于他建立在对全球政治、经济局势把握基础上的直觉，又受此制约。

有人说，在一轮大牛市行情中，人人都可能是“股神”，但只要大熊市一来，这些“股神”就都一个个不见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最近的一次是在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以前被誉为股神的一个个都鸦雀无声了——美国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公司股票暴跌了 40% 以上，颇受股民质疑；亚洲股神李兆基因为多次看错大市自嘲自己是“冒牌股神”，唯有索罗斯因为准确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来临的时间并成功逃顶，才成为股市中的佼佼者。不用说，索罗斯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曾经多次准确预测到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因而显得难能可贵。

这也被人看做是他 1998 年出版的《开放社会》一书中的观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完美的实验”。

索罗斯在 2000 年经历了网络股泡沫失利后自嘲说：“认识到繁荣之后出现衰退，并不需要金融天才。但是，要预测衰退何时到来却十分困难。”他现在用亲身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索罗斯 2000 年就宣布退休，把更多基金交给组合经理管理了，可是他 2007 年 8 月觉得全球金融危机就要到来时，还是忍不住手痒痒的，果断出手为旗下基金建立了大量的空口仓位，当年就在做空次贷类证券中盈利 29 亿美元，回报率超过 30%。2008 年初，当他再次确定这次金融危机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时，简直欣喜若狂。

索罗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2009 年 10 月他在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演讲时分析说，1929 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6 倍，1932 年是 2.5 倍，2008 年初则是 3.65 倍，这还不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时金融市场上还没有、现在却已得到广泛使用的各种金融衍生品。意思是说，如果包括这些因素在内，这次危机的严重性还要被放大许多倍。

虽然索罗斯的理论体系很少有人看得懂，也很少有人认同，但其实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最重要的还是要拨开迷雾、认清真相。在这里，读者可以从索罗斯的这种对比中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这种警惕和对比都是非常

有道理的，并由此不得不佩服他精准的市场判断能力。

世间再无索罗斯 | 索罗斯成功投资的三板斧

索罗斯曾经说过：“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相和谎言的连续剧。”赚钱的方法就是“认清其假相，投入其中，在假相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当然，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索罗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细细研究可以发现，他最善于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缺陷中寻找规则漏洞，从而从中发现过度失衡的迹象，然后从中牟取暴利。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索罗斯看来就是这样一次好机会。一般认为，金融危机中美国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崩塌，恰好证明索罗斯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索罗斯由此感到，他原来预言的“美国霸权泡沫”破灭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为此他得赶紧利用这次市场产生的恐慌情绪掀起惊涛骇浪。

所以读者看到，索罗斯随后联合各家对冲基金发动了一波石油行情。在索罗斯等人的兴风作浪下，国际原油价格在 2008 年 7 月达到每桶 147.25 美元的最高点，然后很快又下跌到每桶 46 美元以下的最低位。

索罗斯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并且国际对冲基金又纷纷看好索罗斯具有“弹无虚发”的本领，所以只要索罗斯登台一呼，就与众多基金一呼百应；不仅如此，甚至平时还有众多投机资金千方百计打听索罗斯的下一步动作，这使得索罗斯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和放大效应。

在国际原油价格忽上忽下震幅达到两三倍的背景下，全球各国经济无一幸免。并且即使有人指责这是索罗斯所为也查无实据，因为索罗斯只是其中的一员，虽然他总是事先寻找游戏规则漏洞并最先发起攻击，但由于淹没在群起而攻之的激烈战斗中，实在不怎么样容易把责任全部推到索罗斯身上，如果真的有什么责任要追究的话。

换句话说，索罗斯的这种高度警惕实在是出于投资本能，与道德甚至政治无关。所以，如果一定要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索罗斯，是没有道理的，即使美国政府也不这样认为。

2008年11月13日，美国国会为了弄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追查元凶，召集5位久负盛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开会，聆听看法、寻找对策，其中就包括索罗斯。虽然美国媒体报道采用的标题很吓人，例如针对索罗斯的是：“索罗斯，你在危机中干了什么？”用的好像是审问犯人的口气，但他们并没有证据，所谓证据只是这些人在2007年取得了10亿美元以上的获利回报，并没有其他任何“把柄”抓在政府手里。

美国政府的这一微妙态度，实际上从其他报道中也能大致看出来。

2008年10月11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特别会议，虽然强调要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但首先倡导召开这次会议的并不是美国，而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亲自到美国去要求和美国总统布什联合召开的。这表明，至少在这时美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根源在哪里，所以不知道如何救市。美国的救市计划多次进行修改，也正好说明美国政府内部的这种意见分歧。

回想起索罗斯在解释原油价格回跌时是这样说的：全球油价本来按理说应该会涨到每桶165美元，不用说，到了那个时候市场机制一定会崩盘，在高油价下刺激产生各种新产品，同时降低原油需求量，使得价格滑落。可是由于信用市场泡沫化的影响，全球投资者用来炒作原油价格的资金已经大幅度减少，而这时候的美国经济衰退又抑制了对原油的需求，对油价产生了抑制效果。

这种解释显然不具备说服力。真实答案只有两种：要么是索罗斯没有解释清楚，要么就是他故弄玄虚，故意放烟雾弹。

可是谁又能说索罗斯的这番说辞不是他对石油投资市场以及别人对他指责的一种反击呢？毕竟，市场如战场啊！

8

比别人更了解美国

索罗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是铁板钉钉的事。之所以这件事能在索罗斯身上发生并取得成功，其实是他作为美国人更了解美国的所作所为，从而使得他在一次次发动金融危机时有更多的胜算把握。

索罗斯的优势在于，他可以从近距离观察和分析美国入手，来决定什么时候出手什么组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索罗斯永远“比对手早三分钟平仓”的主要秘诀之一。

那么，索罗斯了解到的美国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索罗斯与其他人相比更看清了美国的什么呢？下面就对此来做一分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统一战线”，这个阵营中包括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共同构成了美国经济附属区。

美国的强大经济后盾，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这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短时间内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而正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连带所谓的“东亚模式”引起全球关注。敏感的索罗斯感到，今后这里一定会发生些什么；也就是说，这里将来定会是他的“福地”，是能够让他赚钱的地方。

所以，索罗斯通过关注美国政策的一举一动，来帮助自己思考、寻找投机机会，是一种很聪明的办法，事实上也让他占到了不少便宜。

因为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尤其在冷战结束后更是成为全球超级强国；美国的货币美元是全球本位币，在全球贸易、投资、国家储备中占有绝对优势；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几乎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发行”，这又为美国掌控全球经济、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创造了良好条件。索罗斯要想在全球兴风作浪，一刻也离不开这些有利因素，尤其是美元的固有特性。

所以，就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口经济迅速发展，成为美元在拉丁美洲以外的第二个重要投放基地后，索罗斯感到，这种国际产业的分工和转移，已经形成了对亚洲国家廉价土地和资源的巨大需求，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泡沫，这就像水流急了必然会形成浪花一样。

可以说，索罗斯的这种观点和大多数人并不一样。当时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包括政府领导整天陶醉在“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中，以为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本国在全球的排名就会如何如何，这实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相反，索罗斯能够透过这种现象探求背后的实质，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受美元制约的角度来思考，实在是更胜一筹，这也是他成为全球富豪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比别人看得更远。

具体地说，就在这时候，美国刚刚经历了一段历时 8 年的经济繁荣期，正在陷入经济衰退。这样与亚洲一些国家相对照，亚洲经济的发展就更显突出了。但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家，不可能长期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必定会挑起一些麻烦。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美国从 1979 年下半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油价一下子飙升三倍，从每桶 10 多美元上涨到将近 40 美元，从而迫使经济进入三年低迷时期。这时候美国政府通过不同措施来刺激经济发展，尤其是通过大规模增加军需装备来拉动国内需求，才于 1982 年走出经济危机、

走向经济繁荣，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 IT 经济繁荣。

美国 IT 经济的繁荣造成了大量的获利资本，这些获利资本纷纷进入其他国家寻找新的获利渠道，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是其主渠道之一。

资料表明，1989 年到 1994 年间，美国的长期利率在 2.5% 左右，可是这些亚洲国家的利率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说，这些国际资本仅仅从美国进入亚洲国家，什么都不做，就能坐享其成；当然，实际上，投机资本的本性是要兴风作浪，不可能躺在那里吃利息差价。于是，这其中的金融风险就被索罗斯看到了。

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背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投资银行纷纷开始在东南亚抢占市场。1991 年到 2001 年间，它们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六个开放程度较高的资本市场，基本垄断了金融服务。具体地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发行的金融工具中，绝大部分（超过 50%）是被美国 and 欧洲国家各大投资银行控制的；与此同时，日本机构投资者还占了另外 10% 的比重。

这样一分析就知道，为什么索罗斯后来的一呼百应能够以“一己之力”来对抗一个国家和政府的金融体系了。

实际上，在他个人背后还拥有西方国家强大的投资银行体系，它们本来就在其中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市场，兴风作浪绝对有资格、有资本。

遗憾的是，当时这些亚洲国家根本看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它们陶醉于大力引进外资的所谓“成就感”中。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亚洲国家吸引西方国家的外资越多，对美元形成的依赖性就越强，经济脆弱性就越明显，将来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要命的是，它们为了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纷纷采取本国货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以确保这些外国投资到期后不需承受汇率波动损失。

不仅如此，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可以“贪图便宜”——顺便搭乘美元贬值的顺风车，在美元对全球其他主要货币贬值

的时候，也跟着贬值，这样就能继续保持甚至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了。

问题更严重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贸易盈余，亚洲各国纷纷采取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汇率来盯住美元，“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说穿了就是，想通过货币贬值的办法来取得产品出口优势。

以泰国为例，1984年到1994年间，泰国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8%，制造业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中的比重从原来的36%提高到81%，就与这种盯住美元汇率政策密切相关。

可是殊不知，这种盯住美元制度增加了稳定本国汇率的难度。例如，当美元贬值时这些国家的货币同样可以贬值，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可是如果美元升值呢，这些盯住美元的货币也会随之升值。这是一把双刃剑。

这时候升值了的货币如果能得到国内经济面支撑，当然没问题；可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这种货币汇率就是被人为高估了。货币被高估的后果很严重：20世纪40年代的英镑危机、1983年和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顺便插一句，当时我国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措施：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1980年还是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1985年就贬值到2.80元，1990年末贬值到5.22元，1994年1月1日起大幅度贬值到8.30元左右。

所有这一切，索罗斯可谓看得一清二楚。在索罗斯看来，这些国家深深步入了这样一个陷阱：吸引外资比重越大，亚洲货币对美元的依赖性就越强，就越容易成为美元刀的刀下鬼；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虽然可以对外资增强吸引力，却也容易被国际游资冲击找到软肋之处。可以看出，索罗斯后来正是抓住了这块软肋。

9

吃透美元就吃透未来

总体来看，索罗斯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比别人更了解美国，更了解美元，更了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漏洞，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裂痕。在他看来，谁要是吃透了美元，也就意味着吃透了未来。

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亚洲国家经济虚热的背景下，索罗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国家有什么能力维持住这样的固定汇率呢？如果能够维持得住，那又能坚持多久呢？如果维持不住，那么原来用固定汇率吸引外资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从而会彻底动摇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

事实上，美元兑全球主要货币的汇率从 1995 年开始就从原来的贬值转为升值了。这样一来，也就带动这些盯住美元汇率的亚洲国家的货币也不得不跟随着美元不断走强，这就出现了两种后果：一是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削弱；二是这些国家的货币被人为高估，亟须国内经济面做支撑。但这两者是一对矛盾：出口竞争力削弱了，国内经济就无法支撑得起来。例如泰国 1995 年的出口增长速度高达 24%，1996 年就下降到只有 3%，从而导致 1995 年泰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 162 亿美元，超过 GDP 的 8%。

要知道，经常账户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收支项目。经常项目逆差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要靠借钱过日子了。虽然国家借钱和老百姓民间借贷不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

国家借钱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货币贬值，迫使出口商品成本降

低，从而硬要从中挤出一块出口盈余来，用贸易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但这样一来就会动摇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度，因为政府在用实际行动操纵汇率，所以这是一对矛盾。二是国家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用资本项目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但这样一来需要有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只有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入流出并且流入大于流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对照当时的泰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泰国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所以它根本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调节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剩下来只有采取另一种措施，那就是加快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高利率政策来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

而这样一来，又恰好给索罗斯等国外投机资本进入泰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虽然这些都是投机资金，却是泰国政府同样需要的，因为这也是一种资本流入。

对于索罗斯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投资投机两相宜——用于投资，可以无风险地实现套利，因为泰铢的利率提高了；用于投机，正可以用它来冲击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

而对于泰国政府来说，这无疑是饮鸩止渴——明知这是一种危险选择，还不能不这样做，否则经常账户赤字如此之高，政府就无法运转了。

所以从数据上看，外国私人资本流入流出泰国的数额 1989 年还分别只有 1 千亿泰铢左右，1994 年就分别达到 1.5 万亿泰铢左右，四年中增长了 10 多倍；更要命的是，随着国外资本流入规模的加大、流入速度的加快，其中短期债务余额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996 年末泰国 701 亿美元债务中短期债务所占比重高达 65.2%。

短期债务虽然也是资本流入，但如果比重太高就不见得是好事，要想方设法把它锁定、变成长期资本，才能更好地为本国经济增长服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下，最有效的选择是提高利率，

而这又会造成恶性循环。

就这样，泰国 1996 年末的银行利率高达 13.25%，居亚洲各国之首。

短期债务比重高，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其中的投机资本比重大，投机资本必然是短期资本；二是泰国政府的还债压力大，因为经常有到期的债务需要清偿，容易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而且容易昏招迭出。因为归还短期债务，也就意味着资本要外流，会迫使国内经济增长随之减缓，进而需要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报这“一箭之仇”。

现在回过头来看，索罗斯正是从这一系列分析中得出 1997 年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而在这其中，又以从泰国开刀最合适。

一方面，1996 年泰铢的高利率已经使得泰国经济雪上加霜，具体表现为企业负担加重，纷纷向国外寻求低成本融资；银行不良资产增多；政府对外负债扩大，1997 年泰国外债规模高达 900 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 50%。

另一方面，这时候的美元处于持续升值通道中，美元的升值使得实行盯住美元汇率的泰铢十分尴尬——因为美元利率的上升，会迫使投机资本流出泰国，从而导致泰铢贬值；泰国要想维持住固定汇率，就必须动用外汇储备来接盘。

那么，这时候的泰国政府能不能动用外汇储备来达到效果呢？这就要看它有多少外汇储备了，而这也正是索罗斯所密切关注的。

有了这样的“知己知彼”，索罗斯的“百战不殆”就有了相应保证。后来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正是按照索罗斯所分析的这种货币经济学原理来进行的，最终导致泰铢崩溃、泰铢汇率自由浮动的结果。

至此可以看出，索罗斯的确更善于从全球经济、政治时局来宏观把握形势。他知道，在这其中美国是龙头老大，所以从更透彻地了解美国入手，会有助于他把握这种投机和投资，这是他“苦心钻研”的结果，而不是什么“阴谋论”。其他任何人要想诋毁索罗斯，无论是索罗斯本人

还是别人都不是那么很服气。甚至，在美国政府上层也有不少人公开为他叫冤和辩护。

1997年8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盟会议上严厉谴责索罗斯等人的行径，在场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立刻站起来为索罗斯辩护，气氛一度相当紧张。这就多少能从一个侧面证明，以索罗斯为首的全球金融投机者攻击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美国的利益。

从美国国内来看，索罗斯的这种攻击行为在上层赢得了许多好感，这一点在国外常常被看做是美国政府公然支持的结果，是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发动金融攻击战略的“一部分”，让索罗斯有口难辩。

例如1997年泰国在索罗斯的猛烈攻击下，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紧急援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是国际组织，却是美国一手掌控的，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重大事项决策的一票否决权。而在美元作为全球霸权货币的格局下，任何国家和地区要想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当然首先必须低下高昂的头颅，符合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才行。具体地说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首先要求被援助国彻底放弃资本管制，放弃银行对外资进入限制等条件。

粗懂货币经济学的读者知道，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被援助国放弃“三元悖论”中的货币主权，从而给全球最强势货币（美元）让出一块地盘。

被援助国如果不答应这样的条件，就无法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而如果答应了这样的条件，就会使本国货币成为美元的附属货币，使本国经济成为美元的殖民经济。这样客观上就方便了索罗斯的进出。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因为日本银行决定不再延期对韩国的数百亿美元贷款，韩国不得不向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紧急援助。当时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韩国准备了550亿美元的紧急财务援助，但前提是要韩国承诺实行经济改革。

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后来回忆说，面对这

样的紧急援助要求，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前些年救助墨西哥一样，对韩国的“条件非常硬”。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当时的韩国百姓会纷纷呼吁国家拒绝接受这种“条件非常硬”的援助，纷纷变卖家中的黄金首饰等来支持国家恢复经济了。

可是，这就像一个饿了三天的的人，光靠舔空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有人让他先吃上一碗粥再加几个馒头，你叫他做什么他都会答应。何况这 550 亿美元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紧急财务援助呢？

就这样，1998 年 3 月 31 日，当时位居全球第 11 大经济体的韩国不得不低下头颅，决定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并且从第二天（4 月 1 日）起允许外资进入证券、银行业，从 7 月起全面实行外汇市场自由化。

所以读者能看到，虽然韩国经济发展被看做是亚洲成长的象征，但却是美国的附庸，美国至今在韩国仍然保留大量驻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也正因如此，印度尼西亚总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国主导的一次对新兴国家实施金融战争的阴谋”。而泰国总理他信 2003 年在提前还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120 亿美元贷款后庄严地在泰国国旗下宣誓，以后坚决不向国际银行家们要一分钱“援助”，甚至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剩下的债务。因为他很清楚泰国从这种国际援助中得到的是什麼，仅仅因为要归还债务主动让泰铢贬值所造成的损失，就让泰国苦不堪言。

不用说，他信的这种呼吁不合“国际潮流”。仅仅三年后，他信就在国内政变中被赶下了台。

从中容易看出，在美元本位币的全球货币体系下，美元的过度发行产生了大量的投机资本，而最强势的美国正可以利用资本的逐利性，利用非美元经济体“货币主权、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这一“三元悖论”，来制造金融危机甚至直接推翻一国政府。

但同样显而易见，美国和索罗斯也有“失算”的时候。在这其中，最露骨、

最引人瞩目的是 1997 年 8 月 18 日美国《华尔街日报》集中报道索罗斯等人的“胜利”，然后一连几天发表评论文章对此大加赞赏。

文章兴高采烈地透露索罗斯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香港，称赞索罗斯“他们在星期四打垮了印尼盾之后，星期五就把矛头指向了港元”。这里所说的“星期五”是指 1997 年 8 月 15 日，这时距香港回归中国仅仅只有一个多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发起对港元的攻击，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美国和索罗斯与香港和中国背后的政治利益关系。

结果不用说，索罗斯在这次狙击中遭到了彻底失败。也许索罗斯们没想到，资本主义擅长搞经济，搞政治还显得幼稚了些。

但无论如何，索罗斯善于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及其货币美元出发，来宏观把握全球经济、政治时局，“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杀伤力是绝不容小看的。

| 附录 | Appendix

乔治·索罗斯年谱

1930年8月12日 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律师家庭，匈牙利名叫捷尔吉·施瓦茨（György Schwartz），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他的英文名。

1944年 家乡布达佩斯遭侵略，全家开始逃亡。尤其是当年全家在地窖中躲避纳粹德国空袭的经历，让索罗斯总结出两条求生技巧：一是不要怕冒险，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1947年 只身离开匈牙利，先到瑞士的伯尔尼，然后到达英国伦敦。

1949年 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

1951年 疯狂阅读老师卡尔·波普尔 1945 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从此终生成为一名“开放社会”的追随者。

1952年 取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学士学位。为生计所迫，四处寻找工作，无法继续深造，哲学家梦想因此破灭。

1953年 开始进入金融业，从事黄金等商品和股票的套利活动。

1956年 怀揣 5000 美元独自闯荡美国华尔街。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梅尔公司专门从事黄金和股票套利交易。

1959年 进入美国少数几家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公司之一的维特公

司，继续致力于欧洲证券交易。

1960 年 第一次对国外金融市场投资就旗开得胜，他推荐的阿利安兹公司股价上涨 3 倍，索罗斯因此声名大震。

1961 年 结婚，并成为美国公民。

1963 年 跳槽到美国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担任分析员，主要从事外国证券贸易，很快就脱颖而出。

1967 年 担任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研究部主管。

1968 年 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父亲患腹腔癌去世，享年 76 岁。

1969 年 创立双鹰基金 (Double Eagle)，注册资本 400 万美元。

1971 年 双鹰基金资产达到 1250 万美元，一年后更是增加到 2000 多万美元。

1972 年 从银行招待证券分析师宴会的报道中得到启发，力排众议大量买入银行股，为公司挣得 50% 的投资获利，显露出独特的市场判断力。

1973 年 与助手罗杰斯自立门户，将双鹰基金改组为索罗斯基金，注册资本扩大到 1200 万美元，从此两人在联手合作的 10 年间一直被誉为“华尔街上的最佳黄金搭档”。

1975 年 《华尔街日报》头版重点报道他的事迹，这种浓墨重彩使得他第一次品尝到荣誉的喜悦。

1979 年 索罗斯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标志着索罗斯事业开始真正起步。建立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当年索罗斯在英国股市最高点时全部清仓，然后在最低点补仓，仅此一项获利高达 1 亿美元。

1980 年 索罗斯基金回报率达到创纪录的 102.6% 顶峰，基金规模扩大到 3.81 亿美元，索罗斯进入亿万富翁行列。与元配妻子安娜莉离婚。

1981 年 量子基金第一次出现亏损，基金净值下降 26%。但 1970 年 1 月 1 日至 1980 年 12 月 31 日 11 年间的总利润率仍然高达 33.65 倍，索罗斯本人被 Institutional Investor 杂志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金融管理者”。

1983 年 与第二任妻子苏珊结婚。

1984 年 在匈牙利建立第一个东欧基金会“索罗斯慈善基金会”。

1985 年 开始写投资日记。这些投资日记是他日后测试自己市场预言准确与否的衡量依据，也是他不断出版投资著作的基本素材。

1987 年 成功预测到 1987 年的股市崩盘。建立苏联索罗斯基金会，运作范围遍及 31 个国家和地区。

1988 年 聘请德鲁肯米勒处理日常交易，他自己则专心打理慈善工作，量子基金从此进入德鲁肯米勒时代。德鲁肯米勒是索罗斯聘请的第 10 位、也是最成功的接班人，策划并参与过著名的 1992 年英镑战役和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

1989 年 开始狙击英镑的前期准备，准备期长达 3 年。

1991 年 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草签《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他从中嗅出攻击英镑的机会已经成熟。

1992 年 成功狙击英镑，短短一个月内就赚取 15 亿美元，全年获利 20 亿美元，索罗斯个人当年收入 6.5 亿美元。这样的业绩在美国华尔街金融收益榜中名列榜首，不但创下历史纪录，而且至今无人超越。捐赠 1 亿美元资助苏联科学家及其研究。当年索罗斯基金增长了 67.5%。

1993 年 成立“开放社会研究所”。荣登华尔街“百大富豪”榜首。他当年个人收入 11 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收入超 10 亿美元者。

1994 年 对墨西哥比索发起攻击，造成墨西哥比索和股市崩溃。被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为“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

1995 年 买入 2500 万股海南航空股票，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25%。获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最高荣誉 Laurea Honoris Causa。

1996 年 偕妻子去泰国旅游，名为“旅游”实为考察“战场”。

1997 年 在泰国大量抛售泰铢，使得泰国资本一下子被卷走 40 亿美元，此举被认为是 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索。“金融大鳄”名震全球。

1998 年 带领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联手与香港特区政府在汇市、股市、期货市场上斗法，最终以失败告终。量子基金进入俄罗斯市场，因俄罗斯无力偿还所欠债务，量子基金遭到重创，亏损近 20 亿美元。

1999 年 看好欧元启动的未来前景，因欧元币值在短时间内下跌了 24%，从而造成了 10 亿美元损失。

2000 年 在日本投资 3 亿美元建立 Eifuku 对冲基金。首次宣布退休，把更多资金交给组合经理管理。

2001 年 第一次访问中国。通过猎头公司聘请曾在德盛投资掌管 600 亿美元的比尔·斯戴克担任 CEO。

2002 年 聘请曾在老虎基金和 Maverick Capital 担任主管的毕晓普，任索罗斯基金首席投资主管。当年量子基金亏损 1.7%。

2003 年 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 3 个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的颠覆国家政权的“颜色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4 年 与第二任妻子苏珊离婚。

2007 年 看到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开始重返第一线。当年量子基金回报率高达 32%。

2008 年 当年投资获利 11 亿美元，在全球顶尖投资家中排名第四。

2010 年 量子基金在过去 40 年里的平均回报率高达 20%，超过巴菲特。索罗斯 80 周岁，在全球范围内累计慈善捐款超过 80 亿美元。在香港注册基金管理公司，重点投资中国概念股。11 月 11 日索罗斯公开买卖中国 A 股后引发一系列股市大跌。

2011 年 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 46 位，身家 145 亿美元。7 月 27 日再次宣布退休，结束 40 多年的对冲基金经理生涯，改组旗下 255 亿美元规模的索罗斯基金为纯家族财产。支持“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

乔治·索罗斯最著名的10条投资格言

- 炒作就像动物世界的森林法则，专门攻击弱者，这种做法往往能够百发百中。
- 当有机会获利时，千万不要畏缩不前。当你对一笔交易有把握时就给对方致命一击，即做对还不够，要尽可能多地获取。
- 判断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确时获取了多大利润，错误时承担多大损失。
- 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关心的是市场价值，而不是一个国家的GDP。作为一个公民，我关心的是社会价值，即人类和平、思想自由和环境保护。
- 数学不能控制金融市场，心理因素才是控制市场的关键。更确切地说，只有把握住群众的本能才能控制市场，即必须了解群众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聚在某一种股票、货币或商品周围，投资者才有成功的可能。
- 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对于亚洲金融风暴，即使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
- 承认错误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能承认错误，也就会原谅别人犯错。这是我与他人和谐共事的基础。犯错误并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只有知错不改才是耻辱。
- 人对事物的认识并不完整，并由此影响事物本身的完整性，得出与流行观点相反的看法。流行的偏见和主导的潮流互相强化，直至两者之间距离大到非引起一场大灾难不可，这才是你要特别留意的，也正是这时才极可能发生暴涨暴跌现象。
- 永远不要孤注一掷。
-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绝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George Soros

上架建议：投资理财

ISBN 978-7-5064-8607-1



9 787506 486071 >

定价：29.80元